

昔年擘画兴邦梦 今朝山河入画来

——孙中山与他的《建国方略》



两岸黄埔同源 后代情系青田

黄埔四期生刘志丹的传奇故事

父辈的抗战

特别策划

昔年擘画兴邦梦 今朝山河入画来

——孙中山与他的《建国方略》

- 5 “中国梦”照进现实：《建国方略》的历史镜鉴与当代价值 / 潘珂
 - 12 《建国方略》“知难行易”的哲学内核与近代中国思想启蒙 / 苏昕宇
 - 19 《实业计划》视域下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演进 / 肖辉栋
 - 25 《建国方略》视域下黄埔军校的创办动因与实践探析 / 杨彦立
-

时政

两岸时评

- 31 以“四个坚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行稳致远 / 翁明源 骆婷

黄埔之声

- 35 以法为桥梁 以服务促理解
——黄埔精神引领下的两岸青年交融新路径 / 杨灵统

两岸纵横

- 39 2026 年 4—5 月海峡两岸大事记 / 吴亚明

军事天地

- 43 台陆军前司令李翔宙批台当局引进 M1A2T 是内行话还是外行话？
/ 郑剑

情系黄埔

- 48 两岸黄埔同源 后代情系青田 / 单补生
- 57 中美传统友谊历久弥新
——一床美军军毯的故事 / 耿嘉陵

人物

人物春秋

60 黄埔四期生刘志丹的传奇故事 / 刘永昌

黄埔人生

64 从黄埔讲台到雪峰山密林

——湖南共产党员谢锦涛的抗战人生 / 姚江鸿

我的黄埔前辈

69 父辈的抗战 / 乐策、乐鼎、乐正

历史

黄埔往事

72 天津籍烈士于方舟推荐的黄埔一期学员 / 王伟凯

黄埔研究

77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黄埔师生(上) / 李务起

黄埔日历

84 1926年7月24日,《黄埔潮》周刊创刊号发行 / 李岚

文化

锦绣中华

90 从翠亨村到大湾区: 中山的传承与发展 / 陈希

特别策划 昔年擘画兴邦梦 今朝山河入画来——孙中山与他的《建国方略》

昔年擘画兴邦梦 今朝山河入画来

——孙中山与他的《建国方略》

□ 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



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立志救国救民，矢志探寻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道路，毕生奋斗为中华民族振兴作出了彪炳史册的卓越贡献。传承孙中山先生的思想遗产，尤其是系统阐述其建国宏愿和伟大蓝图的《建国方略》，对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逻辑、凝聚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具有特殊而深远的意义。

《建国方略》成书于1917至1920年间，是孙中山先生在革命屡遭挫折、国家积贫积弱的艰难处境中，对现代国家建设作出的系统性思考。辛亥革命后军阀割据、民生凋敝，孙中山先生深刻反思革命成败，以深邃的战略眼光和科学的规划意识，将救国理想从政治革命拓展至全面建设领域。这部著作不仅是其建国思想的集中体现，更是一份超越时代的现代化蓝图，展现了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对民族复兴的宏大构想。

《建国方略》包含《孙文学说一行易知难（心理建设）》《实业计划（物质建设）》以及《民权初步（社会建设）》三部分，构建了“心理—物质—社会”的完整体系。其中《孙文学说》是孙中山先生的哲学代表作，共分8章，集中讨论了认识论问题，以大量事例理论化论证“行易知难”的观点，

提出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实业计划》是孙中山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战略构想，原稿为英文，后译成中文出版，由自序、篇首、六大计划、结论、附录构成，提出了一个包括交通、农业、矿业等在内的庞大的实业发展计划；《民权初步》是孙中山先生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论著，又名《会议通则》，分为5卷20章，包括结会、动议、修正案、动议之顺序、权宜及秩序等内容，叙述了政府管理和群众在社会生活中应掌握的民主原则、程序和方法。三者相互支撑，既包含对民族复兴的精神启蒙，也涵盖物质建设的宏大规划，更指向社会政治的现代转型，堪称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化的国家发展战略。

然而，受制于时代条件、社会环境与认知水平的影响，这份宏伟蓝图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局限性。彼时中国深陷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困境，主权残缺、军阀割据、国力凋敝，缺乏落地大规模实业建设、民主社会改造的政治根基、经济基础与社会环境。加之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未能精准把握近代中国核心社会矛盾，使其无法彻底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在中国注定行不通。这使得《建国方略》在当时只能是一张画在纸上的美丽蓝图。

跨越百年的时光回望，真正的远见从不因时代的局限而黯淡，反而会

在后继者的接续奋斗中结出硕果。《建国方略》中的前瞻性构想如“三峡大坝”“北方大港”“修建十万英里铁路”等，在百年后多已成为现实。“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不仅实现了他“统一全国、民族独立”的夙愿，更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脱贫攻坚、科技创新、制度完善的诸多成就，在许多方面已远远超越其当年设想，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

本次专题策划聚焦“孙中山与他的《建国方略》”核心主题，围绕《建国方略》的思想本源、实践落地、历史演进与当代赓续，精选四篇专题论文，多维度深挖这部近代建国经典的理论意蕴、实践价值与时代启示。《〈建国方略〉“知难行易”的哲学内核与近代中国思想启蒙》一文，深入剖析孙中山先生哲学思想对传统观念的突破及其在思想启蒙中的独特地位，为理解其建国思想提供了哲学基础；《〈建国方略〉视阈下黄埔军校的创办动因与实践探析》一文，立足革命实践维度，探讨《建国方略》中“军政”思想如何通过黄埔军校的创办得以实践；《〈实业计划〉视域下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演进》一文，系统梳理《实业计划》的构想及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实现与超越，展现了从理论设计到实践成果的历史跨越；《“中国梦”照进现实：〈建国方略〉的历史镜鉴与当代价值》一文，将《建国方略》置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宏大背景下，分析其与“中国梦”的内在关联。通过综合考察不难发现，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率先提出的实现国家富强与现代化的时代课题，为遭受工业文明冲击后要探索主体地位重塑的近代中国提供了极具前瞻性的理论先导。

本次专题策划旨在缅怀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与建国理想，体悟《建国方略》所蕴含的智慧。孙中山先生所开启的早期现代化探索，为后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探寻救国真理积累了不可替代的实践经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其经验，汲取其教训，展开科学的社会革命与制度创新，使百年前的强国构想得以一路传承延续：从《建国方略》勾勒纸上宏图，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再到“十四五”成就盛世图景，“十五五”擘画时代新篇，百年风雨中，中国人民救国兴国的初心始终未变。

如今，孙中山先生毕生追求的民族复兴，在中国共产党的接续奋斗中，已在华夏大地逐步变为现实。孙中山先生的远见卓识与爱国情怀也已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继续激励我们勇毅前行，在推进祖国早日实现完全统一的道路谱写新时代的壮丽篇章。

（杨彦立）

“中国梦”照进现实:《建国方略》 的历史镜鉴与当代价值

□ 潘珂

1918年5月,孙中山在首次护法运动失败后离穗赴沪。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孙中山苦心孤诣,撰成《孙文学说》《实业计划》两本著作。1922年,这两本书与孙中山1917年撰写的《会议通则》(后改名为《民权初步》)被合编为《建国方略》出版,近代中国谋求现代化的首份宏伟蓝图就此现世。历经百余年岁月沉淀,这份勾画“中国梦”雏形的前瞻之作正在从“纸上理想”演变为触手可及的现实,其中蕴含的爱国情怀与思想光辉,在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道路上,仍然是不灭的精神航标。

《建国方略》擘画近代中国的理想蓝图

思想的诞生必定深深扎根于其所处的时代。《建国方略》作为孙中山思想之集大成,是社会历史条件与个人心血的共同产物,其中关于国家建设的宏大构想在当时堪称石破天惊。

《建国方略》的成书背景

自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以后,中国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中华民族陷入空前的总体性危机。为挽救民族危亡,农民阶级、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等各派爱国人士进行了种种尝试。截至孙中山著书之前,中国仍然内忧外患,但已孕育出现代化转型的萌芽:政治方面,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经济方面,一战减轻了列强盘剥中国的压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迎来短暂春天;思想方面,新文化运动持续推进,民主与科学观念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社会方面,新式教育继续发展,市民阶层逐渐崛起。

与近代中国发展的坎坷路途相似,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也屡经波折。1895至1910年间,孙中山谋划发起或参与多次反清武装起义,均告失败。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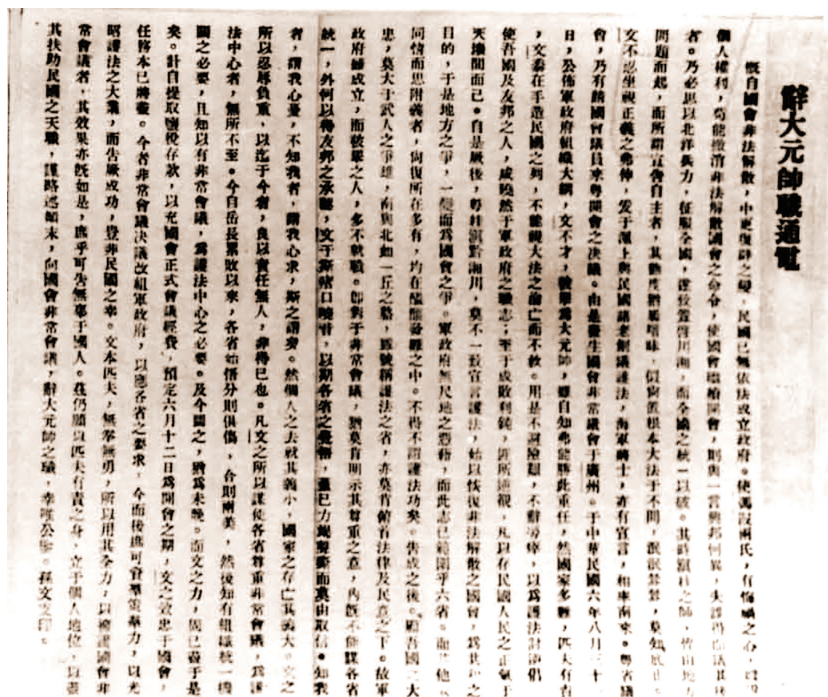
朝统治,但仅仅数月,革命果实就被袁世凯窃取。1913年3月宋教仁遇刺身亡,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遭袁世凯镇压。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重新掌权的段祺瑞政府对外卖国,对内实行独裁统治。孙中山以维护《临时约法》为号召开启“护法”战争,但由于护法军各怀异心,最终革命阵营分裂。1918年5月,孙中山辞去大元帅职务。

正是在护法运动失败的低谷时期,孙中山心怀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担忧,对过往数十年的革命经历进行深刻反思和总结,撰成《建国方略》。

《建国方略》的体系构成

《建国方略》是孙中山三部著作综合而成的丛书,从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三方面擘画国家建设蓝图。

《孙文学说》是孙中山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核心理论是“行易知难”。孙中山认为,民国建立后革命事业受挫“非尽



/1918年5月4日孙中山发表的《辞大元帅职通电》部分内容。

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志也”，这一错误思想正是传统的“知易行难”学说。必须先“破此心理之大敌”，使国人“万众一心、奋起直追”，方能实现“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孙文学说》共8章，前4章以饮食、用钱、作文等为例证明“行之非艰，而知之惟艰”，后4章结合近代科学观念和革命实践对“行易知难”学说进行阐述。

《实业计划》是孙中山经济发展规划的核心，原书用英语写就，后译成中文出版，由自

序、篇首、六大计划、结论、附录构成。六大计划中，前三项计划分别以北方、东方、南方三大港建设为中心，提出区域经济发展规划；第四项计划提出十万英里铁路的具体构想；第五项计划提出食、衣、住、行及印刷业的工业化目标；第六项计划聚焦矿业开发。《实业计划》意图抓住一战带来的发展契机，以全方位的开放姿态完成中国工业化的壮举，其布局之广、规模之大、目标之远，在近代中国的实业发展政策中前所未有的。

《民权初步》体现孙中山的民主政治实践设想，系其参考美国议事规则著作重新编译而

成，重点关注国家政治事务的程序问题。全书共分5卷，阐述集会组织、动议程序、修正案等议事规则，核心理念是保障国民自由平等权利的实现。该书聚焦琐碎的政治程序，目的在于“教吾国民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行稳之后逐步前进，则“民权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对于仍在摸索政治制度革新的近代中国而言，《民权初步》提出了通过增强国民政治意识，推动民主政治建设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渐进路径。

《建国方略》三本书的内在逻辑紧密相连。《孙文学说》是《民权初步》和《实业计划》的思想基础，为民主政治实践和实业建设提供理论指导；《实业计划》是《民权初步》和《孙文学说》的物质基础，为民众解放思想和政治参与提供经济支撑；《民权初步》则是《孙文学说》和《实业计划》的制度基础，为精神和物质建设提供政治保障。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描绘出孙中山理想中国的完整面貌。

《建国方略》实施的现实困境

《建国方略》的宏大规划在当时并未真正落地施行，究其原因，既有客观社会条件的根

本限制，也存在构想本身脱离现实的主观局限。

一是政治环境长期动荡。孙中山一生多次组织建立政党，但由于没有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纲领、缺乏稳定的武装力量以及政党组织松散等问题，未能领导中国革命实现主权独立的目标。辛亥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北洋政府分裂后，中国长期处在军阀割据状态。在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涉下，各派政治势力明争暗斗，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稳定的政权来推行如此庞大的建设规划。即使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执掌全国政权的时期，中央对地方的掌控力也始终不足，无法全面开展国家建设。

二是经济条件严重缺失。在《实业计划》面世之前，孙中山已于1912年提出“十年修筑20万里铁路”计划，估算需资金约六十万万银元，以当时中国的财政状况，需耗费百年以上收入。此时的中国民族经济在外国资本压迫、官僚资本排挤、封建生产关系束缚的共同影响下发展缓慢，远不足以支撑规划建设。而孙中山所寄希望的依靠外资和国际合作也并不现实。在完成《实业计划》后，孙中山

曾誊抄数份致函美、英、法、日多国政府和驻华公使，均遭冷遇。实际上，列强更倾向于扶持愿意出卖核心利权的割据势力，加深对中国的经济掠夺，而不是支持中国独立发展。依靠外资发展本国实业，无异于与虎谋皮。

三是社会动员基础不足。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虽然有所开展，但是大多数劳动群众深陷生存绝境且阶级意识被禁锢，在社会思潮激荡中难以认清历史规律。加上数十年间改革和革命运动失败，各种社会思潮剧烈碰撞，国民意识迟迟没有凝聚为改造社会的巨大能量，《建国方略》中回避社会基本矛盾、过于理想化的规划难以获取广泛社会支持。

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对《建国方略》的呼应与超越

《建国方略》提出后，近代中国曾出现过局部实践的契机，但大部分计划因政治动荡、资金匮乏等缘由被迫搁置。中国共产党人则接续完成了孙中山未竟的民主革命任务，而且将其进一步向前推进，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上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经济上建立起社会

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而为各项建设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凝聚起国家的全部力量，不仅实现了孙中山先生振兴中华的遗志，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以远超当年的规模和速度，将《建国方略》中的宏伟构想变为了现实。

心理建设维度

《孙文学说》以“行易知难”学说为核心，旨在为改造中国提供思想指导。其中包含唯物主义思想，但仍然存在精英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倾向，并未达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高度。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对孙中山的知行观进行了扬弃。一方面，孙中山的知行观暗合了实践决定认识、认识反作用于实践的基本原则，这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有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另一方面，孙中山的知行观将人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类，主张“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割裂了知与行的统一性。而马克思主义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理论必须与实



/ 1912年9月16日，孙中山视察京张铁路。

践相结合，实现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的具体历史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飞跃，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战略思想共同构成，围绕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阶段、动力等重大问题，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思想论断与理论阐释。这

一理论体系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为精髓，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作为党和人民实践经验与集体智慧的结晶，它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根本理论指导。

物质建设维度

《实业计划》中的各大计划如今已在现实中不同程度地落地，部分领域的发展甚至远超目标。

海港建设方面。《实业计划》中的“东方大港”以上海洋山深水港的崛起成为现实；“北方大港”通过唐山港、黄骅港以及秦皇岛港的发展得到一定实现；“南方大港”的规划则体现为广州港、深圳港等多个贸易枢纽。目前，我国已建成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世界级港口群，港口基础设施规模多年保持世界第一，自动化码头规模数量和技术水平稳居世界前列。

铁路建设方面。我国铁路营业里程已达到16.5万公里，其中高铁5.0万公里；全国铁路路网密度171.7公里/万平方公里，电化率76.7%。西部地区铁路营业里程6.7万公里。铁路覆盖了中国99%的20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覆盖了中国96%的50万人口以上城市。

工业化方面。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体系最完整的工业体系，覆盖

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 41 个工业大类、207 个中类、666 个小类，是唯一拥有全门类的国家。高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近年取得快速增长，工业机器人、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步伐不断加快。

能源方面。“十四五”期间，我国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 398 处，14 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资源自主保障能力显著增强；我国矿产品生产与冶炼加工规模稳居全球首位，产业链主导地位持续巩固，11 种矿产产量占全球的 50% 以上，30 余种冶金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

六大计划以外，我国还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自贸区等提升对外开放水平；通过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世界级产业集群优化产业布局和平衡区域经济发展；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公共服务体系增强民生福祉，从而实现《建国方略》物质建设维度的超越。

社会建设维度

《民权初步》体现了孙中山对政治制度的设想，即建设以

民权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当代中国并非简单践行其原有政治建设愿景，而是扬弃、超越其资产阶级民权构想，立足国情走出社会主义民主道路，主要表现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的完善。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强调国家权力源自人民并受人民监督。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制度性界定奠定了实现人民民主的法理基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形成完整民主制度体系：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为支撑，辅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三项基本政治制度，共同保障人民民主落地实践。这一制度体系立足马克思主义人民民主理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本思想，契合我国国情与社会发展规律；对于孙中山提出的“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我们吸收

其中反对专制、主张公权为民的进步价值，同时摒弃其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的内在局限，依靠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全链条渠道保障全体人民参与国家治理，发展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如今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持续提升，人民民主的覆盖范围持续拓展，内容不断丰富，人民的各项合法权益得到越来越切实、牢靠的政治与制度保障。

《建国方略》在新时代的思想价值

近代中国社会在遭遇西方工业文明冲击时发生了结构性断裂，暴露了旧有社会系统的致命缺陷，从而在客观上倒逼中华民族走上探索现代国家建构与主体地位重塑的历史征程。正是在破解这些结构性危机的艰难求索中，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为中国描绘了首个现代化建设蓝图，以破旧立新的气魄率先提出实现国家富强与现代化的时代课题，奠定了民族复兴的历史逻辑起点。如今，《建国方略》蕴含的思想智慧对实现“中国梦”仍具重大借鉴意义。

一脉相承的民族复兴梦想

民族复兴的理想自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以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接续奋斗中得以赓续传承。李大钊在筹备建党之时指出，中国要建立的政党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是为“中华国家之再造，中华民族之复活”而奋斗。1925年，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写道，“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解放战争全面胜利前夕，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建立新中国，“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邓小平在1987年总结改革开放经验时提出“振兴中华民族”的表述。江泽民在2001年庆祝建党80周年讲话中首先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称谓。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并将其比喻为“中国梦”。从此，“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成为同义语，逐渐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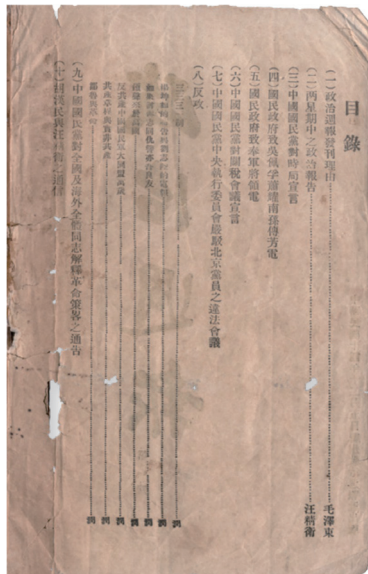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目标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



/《政治周报》。

兴、人民幸福。这与《建国方略》“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的愿景高度一致。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精神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国力量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这与《建国方略》主张通过重塑国民心理、唤醒民族自觉来推动社会变革的实践路径也高度契合。

在继承《建国方略》思想内核的基础上，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梦想在目标、路径与价值维度均实现全面升华。

从目标定位看，《建国方略》是近代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困境中对国家现代化的初步探索，其目标是摆脱列强控制、实现民族独立与经济自强；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则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核心，不仅要完成现代化建设，更要推动中华文明的全面复兴，展现出更宏大的历史格局。

从实践路径看，《建国方略》基于有限资源，提出依赖外资与技术引进的方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则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相结合，以新发展

理念引领高质量发展，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科技创新、促进共同富裕等系统性举措，破解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从价值追求看，《建国方略》以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本质上是少数阶层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则以人民为中心，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终极奋斗目标，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建国方略》的当代价值

如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在重要战略机遇与严峻复杂挑战并存的当下，《建国方略》的借鉴价值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是全局思维。孙中山的战略眼光在《建国方略》中主要通过《实业计划》体现。《实业计划》将中国经济发展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工业建设规划。这种兼具前瞻性和系统性的战略思维启示我们应当立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统筹推进产业协同发展、

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外，《建国方略》的全面建设规划也暗含着对坚强领导力量的需求，这启示我们必须坚持加强党的领导，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其二是开放胸怀。孙中山的开放视野与其丰富的海外经历密不可分。中外历史和现实的差距让孙中山认识到，国家和民族只有采取对外开放的姿态才能实现发展进步。这种思想在《建国方略》中表现为对国际合作的全面开放态度，以及重视与中国周边区域协同的建设规划。目前中国的对外开放已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格局。与此同时，全球保守主义回潮，地缘冲突频发，世界格局加速演变，多极化进程在动荡中推进。《建国方略》的开放主义启示我们应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心怀世界，在对外合作中积极作为，抢占先机赢得国际较量中的主动权，推动国际秩序的良性演进。

其三是以人为本。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包括“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纲领，在

《建国方略》中主要表现为通过实业建设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通过关键产业调控和制度调节，保障社会公平。此外，《建国方略》关于提升民众政治素养的主张，以及“造林于北部与中部”等涉及生态保护的规划内容，也体现出对公民权利和民生福祉的深切关怀。当前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建国方略》中的民生主义思想启示我们要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全面增进人民福祉，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如今，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重新审视《建国方略》的思想价值，既是为了从中汲取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智慧，更是为了进一步凝聚民族复兴的精神力量，开启新时代的奋斗篇章。

《建国方略》“知难行易”的哲学内核 与近代中国思想启蒙

□ 苏昕宇

“知难行易”说在孙中山思想体系中占据特殊地位，被其视为“最珍视的理论发明”。然而长期以来，相较于《实业计划》与《民权初步》，作为《建国方略》之首的“心理建设”部分所受关注相对有限。虽然学界围绕“知难行易”提出了诸多富有深意的追问：它构建了怎样的知行关系命题？它如何在批判传统“知易行难”观念与王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同时，回应近代中国思想启蒙的时代需求？又何能以“心理建设”之名，发挥破除愚昧、凝聚民心的启蒙功能？对此，学界也已有诸多讨论，或从认识论角度阐释其科学知识观，或分析其理论内部的含混与创见，或从启蒙策略的精英化局限入手提出批评，但是依然缺乏从整体视角阐述其真正的价值。事实上，孙中山正是通过提出并回答这一认识论命题，从哲学层面科学诊断了辛亥革命后革命屡遭挫败的深层原因，并从国民心理层面入手建立了具体的改变路径，

方才为救国图强开辟了新的道路。基于此，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从生成语境、哲学内核、启蒙路径三个层面展开论述，力求呈现“知难行易”说的完整理论图景及其在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进程中的真正地位。

“知难行易”的生成语境与文本结构

“知难行易”说的提出，直接源于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后革命屡遭挫败的哲学追问。1918年5月，孙中山由广州护法军政府返沪，闭户著书，反思“经历次失败消息”。他在《孙文学说》自序中痛切指出，革命建国之挫折，根本原因在于“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更关键的是，孙中山将这一政治失败追溯至认识论根源——“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怠志也”。所谓“思想错误”，即数千年来“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之传统观念。孙中山断言：

“此说者予生平之最大敌也，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在他看来，满清仅为外部敌人，而“知易行难”观念则深植国人心理结构，形成根本性的认知惰性。正是基于这一诊断，孙中山决心从认识论入手，“出国人之思想于迷津”，使“知难行易”成为“救中国必由之道”。学界对此亦有讨论。有论者指出，将革命失败悉归因于一种认识论观念，无疑有所简化；亦有学者认为，应以政治哲学策略视之——孙中山意在为涣散之革命力量重新奠定信念基础。

《孙文学说》撰成于1918年12月，次年出版，后编为《建国方略》第一部分“心理建设”。全书八章，前四章以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十事反复论证“知难行易”。十事例证皆取自日常生活与社会实践，论证逻辑一致：人类行之数千年而不知其理，至近代科学始获真知，由此证明“行之非艰，知之惟艰”。孙成尧指出，十



/孙中山先生手书“知难行易”（上海孙中山故居旧藏文物）。

事论证将知行关系从抽象哲理拉到日常经验层面，“运用当时的比较前沿的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阐述‘知难行易’”。第五章“知行总论”推倒古说与阳明说，正面确立“行易知难为宇宙间之真理”。第六、七章分别论证“能知必能行”与“不知亦能行”，一正一反构成破立结合的结构。蔡志栋分析指出，《孙文学说》实际上同时包含了“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与“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两个维度。就其在《建国方略》整体架构中之位置而言，孙中山将“心理建设”冠于全部方略之首，居《实业计划》与《民权初步》之先。孙氏深信，建国须从国民心理建设入手。黎琳亦指出，“行易”说要义在鼓励国人解放思想、敢于实践，“知难”说要义在号召尊重科学知识、走科教兴国之路。正是这一破立相生的论证结构，使《孙文学

说》从哲学论著转化为政治行动的信念基础，为其后的哲学展开与心理建设铺设了逻辑轨道。

“知难行易”的哲学内核

“知难行易”之说非仅颠倒古人“知易行难”的难易次序，其哲学内核含四个相互关联之层面：“行”之优先性的重建、“知”之内涵的科学化转释、“知行合一”之说的批判性超越，以及人类知行进化三阶段的历史化建构。四者共同铸成一套近代中国前所未有之认识论方案。

“行”的优先性：打破“先知后行”的思维定式

孙中山颠覆传统知行观之首要举措，在于论证“行”处于人类认识发生之源头。据其观点：“不知而行”不仅为人类自草昧步入文明之必经门径，亦为文明持续演进之原初动力。人类“行之已久，而莫明其理者，不

可胜数”；“行”在先而“知”在后，行动无须以完备知识为先决条件，此即铁证。尤具理论穿透力者，在其将“习练”“试验”“探索”“冒险”四者共举为“文明之动机”。四者非静态运思，而皆为带有试错意味之实践行动，共同构成文明演进之内在驱动力。由此，孙中山彻底瓦解了“求知而后行”的传统认知模式——在进化论的视野中，不是先知后行，而是先行后知，甚至不行亦不知。此举要义在于直接为行动“松绑”：既然“不知亦能行”，国人便无须等到知识完备再图行动，这正为其革命方略的推行扫清了心理学上的主要障碍。

“知”的科学化：从道德性良知到实证性知识

倘若仅强调实践的基础性地位而未对认知范畴作出新的界定，孙中山“知难行易”学说便难以与中国传统经验主义



/《孙文学说》(上海孙中山故居旧藏文物)。

知行观形成本质区别。其学说的理论创新性，集中体现为对“知”的内涵予以近代化重构。孙中山明确提出：“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这一论断意味着，其理论体系中的“知”，已跳出传统心性论框架下以道德自觉、伦理践行为核心的认知范畴，转而指向以实证方法为支撑、具有体系化特征的近代科学认知。相较于传统知行学说将认知限定于德性修养领域的路径，孙中山将认知问题置于近代认识论视野之下，完成了知行范畴由传统伦理形态向近代科学形态的重要转换。

由此可明“知难”之真义：获

得科学意义上的真正知识，远比付诸行动更为艰难。饮食，人类“行之数千年而不自知其理”，至近代生理学、营养学发明确切原理，“始恍然悟其所以然”；“知”姗姗来迟，“行”则早已实现。建屋亦然，“上古之人架木为巢，后世圣人教以宫室，其所以蔽风雨者，亦行之数千年矣”，而建筑学原理“至近代而始发明”。“行之惟易，知之惟艰”，此之谓也。然一旦获得科学真知，行动便有了高效指导：“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知其知，则行之无所难。”孙中山之“知”，已然脱胎换骨。

“分知分行”：对阳明“知行合一”的批判性推进

孙中山对传统知行观的省思，远不止于否定“知易行难”一义，更进而在正面意义上对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清算。他直言阳明学说“不合于实践之科学”理由何在？在科学昌明之时代，“一人之知行相去愈远，不独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即同为一知一行，其中亦各有分事焉”。此即“分知分行”之核心要义。以建屋为例，“凡所以设计画式、计算材料者，为知者也；凡所以架屋、砌墙、盖瓦、粉壁

者，为行者也”：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二者分工协作，共成一事。

孙中山据此将人按智能差异分为三类：“有先知先觉者，有后知后觉者，有不知不觉者。”“先知先觉者”精于创造发明，“后知后觉者”贵在仿效推行，“不知不觉者”则竭力乐成。这是一种社会化、分工式的知行关系构想，突破了以往局限于个体修身层面的知行讨论框架，将认识论拓展为社会运作机制问题。有学者认为，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扩大了阳明哲学中“知”的范围，更强调“行”的作用，主张行在先、知在后，是对阳明知行合一学说的重要发展。另有学者分析指出，孙中山的认识论思想实际上是含混而充满创见的：它既包含“行先知后”的强调，又包含“知为行导”的指导意义，甚至可以从“默会知识”的维度加以解读，这正是其理论活力的来源。亦有学者认为孙中山这一学说从根本上触及了中华民族古老的认知与行动关系信念的要害，是在科学时代对知行关系的全新认识。

人类知行进化的三阶段框架

在对知行关系的多重维度进行系统梳理之后，孙中山进

一步将其理论置于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脉络之中，构建起具有历史哲学意蕴的知行发展模式。他将人类认识与实践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依次递进的三个阶段：“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而后，为知而后行之时期。”这一阶段划分，不只是对文明发展历程的客观概括，更包含着鲜明的价值指向与实践导向：“不知而行”构成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初始动力；“行而后知”彰显实践对认识的孕育与提升作用；“知而后行”则以近代科学知识为引领，追求更为自觉高效的社会实践。孙中山同时指出，三个阶段“各时期之先后，虽为自然之进化，然亦各时期之中，常有此三种作用并行不悖”。通过这一理论建构，孙中山将传统知行讨论所聚焦的个体道德修养问题，拓展至社会历史发展的宏观层面，使知行统一由静态的伦理追求，转变为与人类文明进程相伴而生的动态历史过程。

概言之，“知难行易”学说的哲学内核，可凝练为四项彼此贯通、层层深化的理论支柱：一是确立“行”的优先地位，突破传统“先知后行”的认知惯性；



/ 孙中山著《孙文学说序》墨迹锌板（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二是推动“知”的内涵向近代科学转型，完成知行范畴的现代重构；三是以“分知分行”超越阳明心学的个体知行框架，提出契合近代社会分工的知行协作模式；四是以三阶段历史进化模型，将知行关系纳入文明演进的整体视野加以把握。有学者指出，“知难行易”说是孙中山最为看重的理论创见，其意义在于以近代科学精神重塑国人的认知与实践关系，因而“知难行易”说成为孙先生“自己最珍视的理论发明”。上述四个层面有机结合、相互支撑，共同形成了具有鲜明的近代启蒙特质与中国本土问题意识的认识论体系。

心理建设与思想启蒙：破愚昧、聚民心、救国图强

“心理建设”之为近代中国

思想启蒙的独特路径，正在于孙中山不以外部制度改造为直接起点，而将“攻心”置于一切建设之先。他深信，“建国之基，当发端于心理”；政治成败系于人心振靡。据此，他将其知难行易学说冠于《建国方略》之首，以认识论批判转化为社会心理改造，从国民意识的深层着手为国家重建奠定心理地基。孙中山痛切指出，革命党人“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而其所以然，并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怠也”。这一论断，将政治失败的深层原因引向一个看似微小却影响深远的命题：数千年来深植国人观念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才是革命建设的“心理之大敌”。孙中山断定，此说威力“当万倍于满清”，满清不



/ 孙中山著述《建国方略》原址：上海莫利爱路寓所书房。

过为外部统治，而“知易行难”观念则内化为根本性的认知惰性。因此《建国方略》的“心理建设方略”其要义，亦即“解放思想，号召国人从思想上进行改革”，其目的在于转变畏难的社会心理，摒弃思想中陈腐的观念，以利亲身实践建国方略

和心理准备。有学者指出，心理建设是孙中山救国、建国思想的重要内容，被他放在《建国方略》的首位。另有论者认为，孙先生的心理建设实为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反思，又“对中华传统认识论总问题以及中华民族心理结构的深沉反射”。

对传统“知易行难”观念的批判，构成了孙中山启蒙工程的第一道突破口。他判定这一观念所导致的心理后果极为严重——畏难苟安、空谈误国。国人因“知之非艰，行之惟艰”而“以不能求知为无足轻重”，遂放弃对科学认识的追寻。孙中

山以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琐事为例，论证了“行之非艰，知之惟艰”：饮食、建屋皆行于数千年之前，至近代生理学和建筑学才能“始恍然悟其所以然”，以此证明“知”之难于“行”。“行易知难”的命题逐步得以确立。有学者将此厘定为两种在启蒙语境下相辅相成的心理建设内涵：一是通过“行易”观彰显国民解放思想，勇于实践正确的革命理论；二是通过“知难”号召人们尊重科学知识，走科教兴国之路。在此意义上，孙中山以科学知识向大众认知注入“祛魅”的理性因子，试图根除传统蒙昧对行动的束缚，属于将“科学精神植入国民意识的一次哲学化尝试”。就其批判重心而言，孙中山所清除的并非仅理论陈说，更是数千年来养成的人性中“坠落、陷溺、懈怠”等因素的消极心理依托，由此为心理建设铺就了一条“破中求立”的思想路径。

在破旧之后，心理建设的另一要害在于“立新”——确立“乐行”“敢行”的国民心理，以凝聚民心为救国图强的根本保障。孙中山通过论证“不知亦能行”，主动抹去了“知而后行”的思维束缚，使“行”无所畏惧。饮食、建屋、造船、筑城

诸例皆证：人类在不知其理之时已行之数千年；其意义在于消解行动的心理负担。他进而构建“能知必能行”的命题，赋予行动以强烈的实践信念。孙中山依照知能差异将人分为“先知先觉者、后知后觉者、不知不觉者”，同时确认三者于社会协作中各自有分：“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这是社会化分工体系中的知行平等的重要论述。其深刻之处在于，它冲破了宋明以来将知行问题局限于个体道德践履的封闭格局，将其升华为一种社会化的协作方式。在这一“心理建设”理念的指引下，民众不仅走出了“一片散沙”的困境，更消除了对变革的畏惧之心，使得各项事业得以顺理成章地推进，最终实现可期可成的目标。历史地看，心理建设的实践效能并不仅限于文字，其更深刻的影响在于将其哲学信念转化为政治行动。日后黄埔军校“爱国、革命”精神的勃发，正与“知难行易”培养的数代实干者的心理底色存在潜在关联。孙中山明言，“予之所以不憚其烦，连篇累牍以求发明‘行易知难’之理者，盖以此为救中国必由之道也”。这表明，他晚年不仅倾力推进实业建设，更致力于夯实民权基础，这对中国

“坐而论道”的传统形成了全面的认识论挑战，使得源自哲学革命的心理动能得以初步汇入救亡图存的时代洪流。

然而这一精英主导的启蒙路径，存在着深刻且难以回避的历史局限。武吉庆在解析《孙文学说——知难行易（心理建设）》时指出，孙中山将自身的主义与理想视为符合科学理性、必须遵从的信条，其启蒙模式呈现明显的自上而下特质：先知先觉的领袖提供思想内核，革命政党负责阐释、落实并向民众灌输，普通民众在整个过程中仅为被动接受者，缺乏独立思考、自主判断与主动参与的空间。这种设计忽视了民众作为思想主体的能动性，将启蒙简化为单向的观念输送，难以真正实现国民意识的自觉觉醒。同时，该学说缺乏对权力的警惕与约束意识，过度倚重领袖与政党的引领作用，却未对掌权者构建有效的制度防范机制，也轻视了广大民众自治能力的系统培育，使得心理建设始终停留在观念改造层面，难以与制度建设形成良性互动。

从历史实践与理论逻辑来看，“知难行易”学说的局限性还体现在归因简化、认知偏差与现实脱离等方面。该学说将辛

辛亥革命后革命屡次失败的根本原因，单一归结为传统“知易行难”观念造成的思想惰性，过度放大认识论偏差的影响，却弱化了封建势力顽固抵抗、帝国主义强力干涉、社会经济基础薄弱、革命阵营内部分歧等现实关键因素，呈现出明显的片面性。其“分知分行”理论与三类人群划分，虽贴合近代社会分工需求，却暗含对普通民众认知与实践能力的低估，固化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认知层级差异，不利于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此外，“知易行难”学说以科学知识为“知”的核心定义，在近代中国科学教育匮乏、民众智识水平整体不高的背景下，这一标准脱离基层社会现实，缺乏可落地的普及路径，导致心理建设难以转化为普遍的社会行动，最终限制了其启蒙效力的充分释放。

结语

孙中山“知难行易”学说，在近代中国思想转型过程中形成了三项重要理论：一是颠倒传统知行关系，突出实践的优先位置，破除长久以来“先知后行”的思维束缚；二是更新认知的内涵与标准，用实证科学知识替代传统德性之知，推动

知行范畴走向近代化；三是超越宋明理学专注个体修身的局限，以“分知分行”回应近代社会分工现实，并以三阶段进化史观拓展知行问题的历史视野。以此为学理支撑，“心理建设”以批判旧有知行观念为起点，承担起思想启蒙的现实功能：既破除“知易行难”带来的畏难苟安、空谈无实的社会心理，把科学精神引入国民观念之中；又以“不知亦能行”“能知必能行”强化实践自信，为涣散的人心重建勇于任事、笃行实干的精神根基，把哲学上的革新转化为救亡建国的心理动力。不过，这一学说亦有其历史局限。以“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为分层的启蒙路径，偏向精英主导，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民众的自主意识与自治能力，对权力运行的制度约束亦着墨不多。从近代思想启蒙的整体脉络看，“知难行易”是一套以实践为导向的认识论方案，它以思想上的革新为近代中国破旧立新、谋求变革拓展了行动空间，其理论意义与历史遗产，至今仍值得我们深入挖掘与借鉴。

参考文献：

1. 孙中山《建国方略·孙文

学说》，《孙中山全集》第6卷，2011年。

2. 武吉庆《孙中山启蒙策略的局限与“幽暗意识”的淡薄》，《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

3. 谢阳举《“中山先生之痛”及其反思：孙中山知行关系学说再评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4. 孙成尧《孙中山〈建国方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共北京市委党校，2013年。

5. 蔡志栋《含混与创见：孙中山认识论思想新探》，《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6. 黎琳《“孙文学说”新解》，民革中央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6年。

7. 陈真波《孙中山知行学说对“知行合一”的发展》，《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8. 张启承、郭先坤编《孙中山社会科学思想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

9. 朱小玲《孙中山国民心理建设思想初探》，《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10. 黄明同《孙中山建设哲学——中国现代系统思维的开启及运用》，2006年。

《实业计划》视域下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演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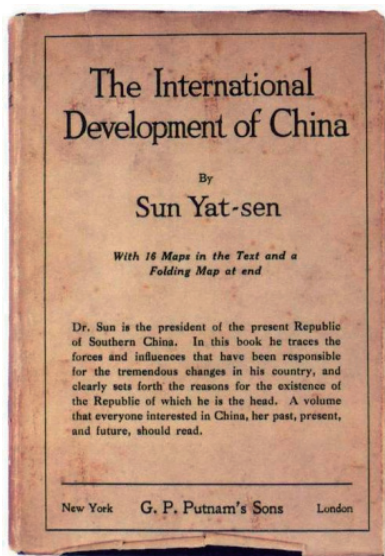
□ 肖辉栋

在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中，革命绝非只是斗争与破坏，而是为建设而生，表示“建设为革命之唯一目的”，“建设告竣之时，而革命收功之日”。因此，孙中山在其颠沛流离的革命生涯中，也不断思考中国未来的国家建设应当何去何从，并逐渐形成理论体系。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孙中山“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洞察到战后欧美国家面临经济重建，而中国则迎来发展实业的历史机遇。他基于多年海外考察与实践积累，在通读大量国内外经济学著作的基础上，于1919年初的上海寓所完成《实业计划》（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英文原稿，系统规划了中国近代化经济建设蓝图。后由朱执信、廖仲恺等人译为中文，最终编入《建国方略》第二部分“物质建设”。

孙中山《实业计划》的现代化图景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的发展目标如下：



/ 英文原版《实业计划》。

首先，《实业计划》将全国划分为“北、中、南三大经济区”，并对应提出建设三大世界级港口的战略构想。孙中山将北方大港定位在直隶湾唐山青河与滦河之间，旨在建成如纽约港规模的国际枢纽；东方大港规划在上海，通过开凿运河连接长江流域；南方大港则以广州为中心，向西南延伸。这三大港口不仅是交通节点，更是连接国内外市场、推动工业化的重要支点。

其次，《实业计划》将铁路

建设置于核心地位，提出修建十万里（约16万公里）铁路网的宏大目标，包括中央、东南、东北、西北、西南、高原六大铁路系统。孙中山深刻认识到“交通乃实业之母，铁路又为交通之母”，甚至提出：“修筑铁路，实为目前唯一之急务，民国之生死存亡，系于此举。”由此，他将铁路视为打破中国地域分割、促进资源流通的关键。此外，孙中山规划修建100万英里（约160万公里）公路，并改良长江、黄河等内河水道，开凿运河，构建综合交通体系。

其三，孙中山提出了同时稳步发展本部工业（包括粮食加工、纺织、建筑、印刷、汽车等轻工业）与根本工业（包括矿业、钢铁、机械、冶金等重工业）的主张，在交通网络初具规模的基础上，形成全国性的工业体系。

在制定实业发展计划的同时，孙中山还在《实业计划》中提出了他对于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包括：“公私并举，以国家经营为主体”的经济发展模

式，节制资本，避免扩大社会不公；关注民生，提出“建设之首要在民生”的理念；强调区域协调联动，促进沿海、内陆、边疆等地区平衡发展；主张对外开放与维护主权并举，既要引进外资、技术和人才，但同时也强调“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实业计划》虽在国内外享有赞誉，但它未能真正揭示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任何实业救国的构想都缺乏现实的政治根基。历史的印证是残酷的：曾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称其计划“宏伟精深”，认为能“使世界原料与资本生一密切之关系”，美国商务总长刘飞尔也书面表示支持，称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尚理想必将实现”，但当孙中山试图向美国申请贷款时，美方以“财政连利息都难以支付”为由拒绝实质合作。胡适虽赞赏孙中山的宏观视野，但直言“计划宏大却无实施步骤”。

由于战乱频仍，国家未能统一，《实业计划》自提出到孙中山逝世，一直未能在政策层面上得到落实。



/ 1919年孙中山在上海寓所与章太炎、胡汉民等人合影。

国民政府时期：制度框架的建立与局部的实践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将《建国方略》确立为官方意识形态核心，其中《实业计划》则作为国家建设的施政纲领，国民政府在1928年的《训政时期施政宣言》中宣称：“训政时期之开展，不仅在于《建国大纲》之实施，而尤在于《实业计划》之推行。”学术界亦在20世纪30—40年代掀起过研究《实业计划》的热潮。为了实现《实业计划》的宏大愿景，国民政府在制度框架上进行了初步尝试，从1927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的“十年建设时期”，中国的实业发展取得了有限的成果。

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国民政府重点推进了铁路建设。铁路建设完成了浙赣、粤汉等干线铁路的部分路段，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截至1937年底，加上当时已经沦陷的东北地区，全国铁路里程约为2.2万公里，与孙中山的十万英里（16.5万公里）铁路的目标相差甚远。而三大深水港的构想更是只停留在规划阶段，北方大港唐山仅建立了筹备处而未有经费支持，东方大港上海的新港建设推进缓慢，南方大港广州进展亦十分有限，均远未达到世界级港口的标准。

在工业建设方面，国民政府虽先后启动了一系列建设项目，但大多未能完全落实。工

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总值的比重仅有十分之一左右，而其中又以纺织、面粉等轻工业为主，重工业生产能力孱弱。1937年，全国钢产量除却被日本控制的东北地区，仅4至6万吨，远低于日本同期的500万—600万吨，电力、煤炭等能源产量虽有增长，但整体规模仍十分有限。

由此，直至南京国民政府覆灭，其距离实现《实业计划》的构想依旧遥遥无期，此间的原因十分多样，包括内部体制的严重缺陷导致腐败盛行、官僚资本的垄断扩张挤压了民族工业的生存空间、列强与外国资本攫取了过多利权等等。当然，最直接的原因还是在于国际环境的恶化以及战争的破坏。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使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工业基地和资源。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导致原有的建设计划被迫中断。多年的战乱，也使得大量资源被投入到了军事领域而非经济建设中。

这一时期的实践表明，在民族危机深重、内部腐败严重与技术条件尚未成熟的环境下，仅靠在意识形态与政策框架上树立崇高地位，而只开展有限的局部建设，难以实现孙中山《实业计划》的宏大愿景。

这深刻揭示了当时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根本困境：脱离国家主权独立与社会制度变革，仅以技术引进和外资利用等手段开展国家建设，终将受制于外部势力与内在结构的双重掣肘。孙中山的构想虽具前瞻性，却缺乏其所必需的政治前提与组织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基与《实业计划》的部分落实

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揭示并解决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改变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为生产力发展扫清了制度障碍。在此基础上，党领导人民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从而在制度与物质双重层面上，真正实现了孙中山先生《实业计划》宏伟愿景的历史性突破。尤其是在“一五”计划期间，各项指标大幅度地超额完成，形成中国近代以来引进规模最大、效果最好、作用最大的工业化浪潮。在此部分列举“一五”计划期间所取得的经济成就。

在工业生产方面，1957年，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比1952年增长296%，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的5.8倍；原煤产量达到1.31亿吨，比1952年增长98.5%，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的2.1倍；发电量达到193亿度，比1952年增长164%，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最高年发电量的3.2倍；金属切削机床达到2.8万台，比1952年增长1.04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最高年产量的5.2倍。

交通运输方面，在1957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2.67万公里（1949年中国铁路里程约2.18万公里且一半处于瘫痪状态），全国公路里程达到25.46万公里，内河航道、空运航线等都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初步实现了孙中山建设全国性路网系统的部分构想。

在国际关系和利用外资方面。“一五”计划通过《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配套的经济援助协定，苏联援建了156个重点项目，占工业投资的47%，为“一五”计划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持与资金支持。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不依赖外援的原则，对于来自苏联的贷款，从1955年起就开始通过出口矿产品和农产品来逐步偿还。在落实苏联援建项目的过程中，始终重视加强工人、技术人员对先进技术



/《实业计划》中的《中国铁路全图》。

设备的学习与掌握，培养自己的人才队伍。1956年，中央进一步明确提出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方针，落实了孙中山“发展之权操之在我”的主张。

在社会主义改造与工业建设高歌猛进的同时，我国的农

业、教育、科学、文艺、医疗、卫生等领域也取得了长足发展，这更是对孙中山“节制资本”、发展民生等思想主张的有力体现。

总体而言，“一五”计划时期，中国在自主发展与苏联援助下初步实现了对孙中山《实业

计划》的部分构想，但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和国际环境，主要集中在重工业和基础设施领域，且区域发展仍以沿海为主，未能完全实现孙中山规划的区域均衡发展，许多具体的建设目标也暂时未能达到。因此，真正全面实现与超越孙中山的

实业愿景，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

改革开放后：孙中山实业愿景的实现与超越

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不断探索、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外资政策和技术引进方面实现了对孙中山“开放主义”的创新性发展，同时通过制度创新，不断地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为实现《实业计划》的完整蓝图创造了条件。

早在2016年11月11日，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今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顽强奋斗下，孙中山先生当年描绘的这个蓝图早已实现，中国人民创造的许多成就远远超出了孙中山先生的设想。”在那之后，又经过近十年的建设，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了更为全球瞩目的成绩，以显著优势保持着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的地位并持续进步。当下来看，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的许多愿景都得到了实现乃至大幅超越，以下将从港口、铁路、工业体系的建设以及对外开放、区域协调发展等5个领域展开论述。

在港口建设领域，中国三大港口群已建成世界级枢纽。北方大港唐山港2025年货物吞吐量约8.84亿吨，居全球第2位；东方大港上海港2025年集装箱吞吐量超5500万标准箱，连续14年位居世界第1；南方大港广州港在2025年完成货物吞吐量超6.96亿吨，集装箱吞吐量突破2800万标准箱，稳居全球港口前6位。同时，还有宁波舟山港、深圳港、青岛港、天津港、香港港等世界级港口。中国港口不仅规模宏大，港口货物吞吐量与集装箱吞吐量均稳居世界第一，而且技术水平先进，成为连接国内外市场的关键枢纽。

在铁路建设领域，改革开放后中国铁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统计公报》，到2025年，全国铁路总里程已达16.5万公里，其中高铁5.0万公里，达到了孙中山建设10万英里（约16万公里）铁路的构想。当前，高铁网络对全国绝大多数地级市及主要经济区域实现了广泛覆盖，其中的一些高难度工程，如青藏铁路、成昆铁路的成功修建验证了孙中山对于高原铁路系统与西南铁路系统的构想。相比上世纪20年代

普遍20—50公里每小时的铁路速度，当前高铁平均速度可达300—350公里每小时，技术高度与承载量等更是民国时期不可与同日而语的，质量上远超过孙中山的原始构想。此外，根据《2024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24年中国公路里程达549.04万公里（高速公路里程19.07万公里），这同样也在数量与质量上大大超越了孙中山设想的100万英里（160万公里）碎石路。

在工业建设领域，中国已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建立了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41个工业大类，成为全球唯一全产业链国家，制造业规模连续十余年居于全球第一，实现了孙中山全面工业化的愿景，并且在部分领域实现了领跑。在实现庞大生产能力、创造巨量社会财富的同时，中国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引导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使全面工业化的成果惠及广大民众，这即是中国共产党对实现孙中山“公私并举”发展实业、“建设之要首在民生”思想的有力注脚。

在对外关系领域，改革开放后，中国创造性地实践了孙中山“发展之权操之在我”的开放主义思想。通过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技术，同时坚持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拒绝如晚清、国民政府时期列强那附带一系列主权让渡条款的投资条约，主张平等互惠，共同发展。孙中山曾言：“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这一说法亦毫无疑问在中国当下的外交理念中得到了印证，而“一带一路”倡议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的提出，更是将孙中山的开放主义思想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在实现了与世界经济的深度融合乃至发挥引领作用的同时，又有力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孙中山亦曾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指出：“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

在区域协调发展领域，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践行孙中山的区域协调思想，通过因地制宜差异化政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以解决我国发

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力图通过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与优势互补，最终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均衡以及人民生活保障水平趋同。在这种区域协调发展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先后推进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等战略，并拓展至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重大区域布局。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发布的“新中国75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显示，我国当前已在缩小区域经济相对差距、增强区域协调发展性以及发挥重大区域战略引领带动作用等领域取得了明显成效。综上所述，已有效实现了孙中山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区域“彼此互相倚靠”，统筹协调，相互补充，共同繁盛的构想。

结语

当然，在此梳理中国的实业发展历程，绝非只是简单地比照孙中山在当年所立下的若干经济指标，而是要从这一份跨越百年的工业化蓝图中，读懂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对民族复兴的不懈追求，读懂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接过历史的接力棒，

带领中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成就，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孙中山的实业建设思想将获得更丰富的理论阐释和更广泛的实践应用。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中国对孙中山诸多伟大构想的实现，也验证了孙中山的实业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借鉴意义，提供了许多原则性、方向性的指导意见。正如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在2025年“孙中山与《实业计划》学术研讨会”中指出：“新时代的坐标下，深刻理解《实业计划》的前瞻价值与现实启示，对我们继承孙中山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精神，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践，具有很强的时代价值。”

中国百年的实业发展历程深刻证明，只有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国家的崛起。孙中山在国家危难之际，以超越时代的远见勾勒出实业救国的宏伟蓝图，至今依然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行，积极投身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现代化建设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奋斗。

《建国方略》视域下黄埔军校的 创办动因与实践探析

□杨彦立

1917年至1920年间，孙中山先生相继撰写并发表了《孙文学说》《实业计划》与《民权初步》，三者共同构成了近代中国极具前瞻性的建国蓝图——《建国方略》。该方略以“心理建设”为精神内核，“物质建设”为经济基础，“社会建设”为制度保障，清晰勾勒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革命建国程序的演进逻辑和目标形态。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这一宏伟构想在落地实践中面临诸多现实困境，其中一个就是缺乏一支专属的、具备坚定革命信仰且能够坚决贯彻建国纲领的革命武装力量。痛定思痛，孙中山先生在深刻总结历次革命受挫的教训后，顺应时代潮流，在中国共产党与苏俄的积极协助下，于1924年在广州长洲岛创办了黄埔军校，开启了“以党建军、以军救国”的全新革命实践。

基于此，本文通过系统梳理《建国方略》的革命建国和军政建设思想，结合孙中山因缺

乏革命武装导致宏大蓝图落地受阻的历史教训，深入剖析黄埔军校的创办动因和办学特色，进而揭示《建国方略》如何为军校铸就了“以党建军”的理念内核，并为其指明了“捍卫国家统一与实业蓝图”的实践方向，最终挖掘其在推动中国军事现代化、实现国家统一以及传承革命精神等方面的历史价值与时代启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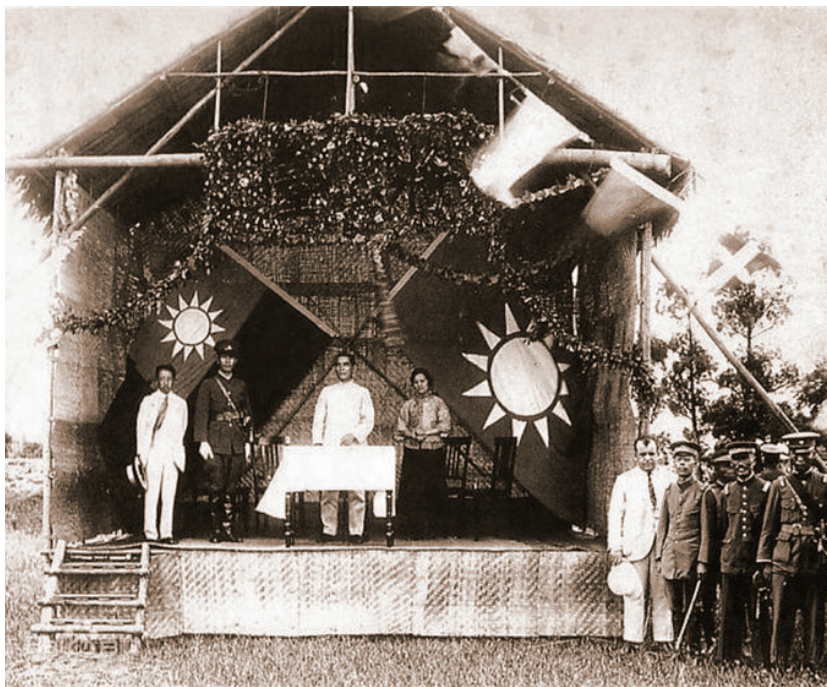
《建国方略》的军政内核与黄埔 军校的创办动因

对于“革命进行之期”的时段和任务，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有明确阐释：“予之于革命建设也，本世界进化之潮流，循各国已行之先例，鉴其利弊得失，思之稔熟，筹之有素，而后订为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军政时期，第二、训政时期，第三、宪政时期。”他进而将这三期分别界定为“破坏时期”“过渡时期”“建设完成时期”。第一步的军政时期即为破坏时期，

拟在此时期内施行军法，以革命军担任打破满清之专制、扫除官僚之腐败、改革风俗之恶习、解脱奴婢之不平、洗净鸦片之流毒、破灭风水之迷信、废去厘卡之阻碍等事。第二步训政时期为过渡时期，拟在此时期内施行约法（非现行者），建设地方自治，促进民权发达；第三步宪政时期为建设完成时期，拟在此时期始施行宪政，此时一县之自治团体，当实行直接民权。而三个时期的关系为：“夫革命之有破坏，与革命之有建设，固相因而至、相辅而行者也。”可见，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既有顺序上的先后性，军政时期是实现训政、宪政的基础，需先“破”而后“立”，又有相辅而行的共时性，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犹人之两足、鸟之双翼也”。

军政时期作为孙中山“革命程序论”的第一阶段，其本质是“以军领政”。“革命军”是顺利完成军政时期的根本保障。不可否认，孙中山和资产阶级

革命派是重视武装斗争的。早在兴中会成立伊始，孙中山就考虑举办军事训练班，培训起义所需要的军事人才，也曾多次筹备创办军事学校。而从其革命实践来看，从“借会党暴动为可靠”到“取得新军，方可成事”，武装斗争取得了积极成效，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辛亥革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性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攫取革命果实，旧的统治秩序又迅速在新形势下恢复，北洋军阀凭借武力割据一方，共和制度徒有其表，正如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所言：“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为了捍卫共和成果，孙中山先后发动“二次革命”、护法运动、护国运动等一系列革命斗争，但是，孙中山所依靠的武装力量本质上都是地方军阀，革命活动屡遭失败。屡经挫折的孙中山深刻反思，认识到“中国的革命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这是中国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传统军阀武装缺乏革命信仰、只为个人私利服务，“没有经过革命的训练，没有革命



/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发表讲话。

的基础”，“都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也必然无法承担起推翻封建军阀、实现国家统一、落实建国理想的历史重任。那怎样才算是革命军呢，怎么样建立革命军呢？孙中山认为，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军队，就是要革命的主义（三民主义），要为国家、为民众而奋斗的牺牲精神，要拿先烈做模范，要学革命党，要学革命党的奋斗。有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军队，才叫革命军。

此外，革命人才的匮乏也成为《建国方略》落地的重要阻碍。《建国方略》的实施，需要大批兼具军政素养、革命信仰

与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既要能够领导革命武装开展斗争，又要能够推动物质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开展。但在民国初年，由于传统教育体系的落后，以及革命形势的动荡，这类人才极度匮乏，导致《建国方略》中的许多规划无法找到合适的人才去落实，进一步加剧了建国蓝图的落地困境。

在深刻认识到革命武装缺失与人才匮乏的困境后，孙中山下定决心要创办一所专属的革命军校，培育具有坚定革命信仰、兼具军政素养的革命人才，建立一支专属的革命军，将培养革命军人作为推进革命的关键

一步,从而为建国理想的落地实施提供坚实的武装保障与人才支撑。黄埔军校的创办,正是孙中山这一革命策略的重要体现。在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上,孙中山明确指出了军校的办学宗旨:“今天在这里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这一办学宗旨,与《建国方略》中“肃清军阀、实现国家统一、振兴中华”的核心目标高度契合,彰显了黄埔军校“以军救国”的革命使命。

“知难行易”学说影响下的黄埔军校办学实践

《建国方略》中的《孙文学说》作为“心理建设”的核心载体,提出了“知难行易”的哲学命题,打破了中国传统“知易行难”的思想桎梏,为革命事业的推进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孙中山认为,民国成立以后,革命建设之所以无成,国事之所以日非,虽然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原因是“吾党之士,于革命宗旨、革命方略亦难免有信仰不笃、奉行不力之咎也。而其所以然者,非尽关乎功成利达而移心,实多以思想错误而懈怠也”。思想错误是指什么呢?这就是几千年来的传统说

法——“知之非艰,行之惟艰”思想在心中作祟。孙中山千方百计要破除的就是“知易行难”说这一心理障碍,他要树立的是与之相对立的另一种思想与观念——知难行易。孙中山希望通过新思想锻造新国民,重塑国民的革命信仰,树立正确的知行观,并依照其设想的革命程序进行建设,最终实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把中国建成“民有、民治、民享”的共和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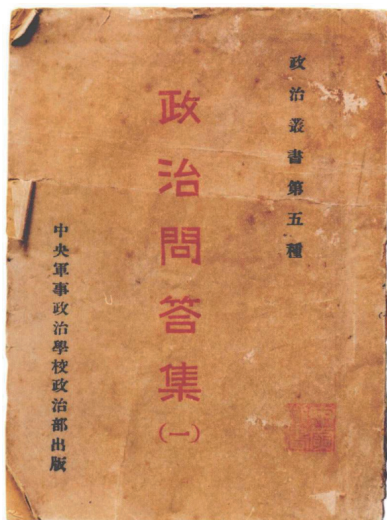
1924年,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办了黄埔军校,在其学校教育中,也深入贯彻了《孙文学说》中“知难行易”思想所要树立的两个重要观念:一是“能知必能行”,二是“有志竟成”。孙中山认为,革命的“知”即革命的信仰、纲领与目标,是革命成功的前提;革命的“行”即革命的实践、行动与斗争,是实现革命目标的关键。只有先明确革命的“知”,才能更好地指导革命的“行”,革命军队必须具备坚定的革命信仰。他勉励黄埔学生:“要从今天起,重新做革命的基础,另外成立一种思想上的革命军。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国救民的事业。”只有拥有坚定信仰的军队,才能始终坚守革命初心,坚决

贯彻革命纲领,为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而奋勇前进。

黄埔军校将孙中山“知难行易”学说内化为办学实践,同时学习苏联红军“以党领军”“军政并重”的建军思想和经验,极力强调政治工作的重要性,构建起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并重的教育模式,彻底摒弃旧式军事学堂“重术轻道”“只练军事不问主义”的弊端。军校的核心使命即为培养“明主义、有信仰、能战斗”的革命军人,而政治教育正是实现这一使命的关键。特别在周恩来就任政治部主任后,军校的思想政治工作焕然一新。周恩来在《国民革命军事政治工作》中明确政治教育目标:“要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众晓得党的理论、主义、政策”,“晓得革命军的使命”。军校颁布的《政治教育大纲草案》中规定: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之一是使学生彻底了解军事学术和军事锻炼,对于革命意义上之重要,又学生文弱藐视军事学术之观念,仍力求洗刷干净。必须有军事知识,而且身体强健,方能担负将来军队中为革命工作之责任,而且方能了解而随时应付军队中的一切问题。军校政治部主导政治教学,起初开8门政治课程,后增至18

门，之后多达 26 门，每门课程少则 4 次 8 小时，多则达 32 小时，并系统开设《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概要》《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建国方略纲要》《总理学说》等核心课程，系统讲授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建国构想，确保从思想根源上理解“为何革命、为谁革命”。除了课程讲授外，政治报告会也是政治教学的一种形式，国民党人如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谭延闿、李烈钧等，共产党人如毛泽东、刘少奇、张太雷、邓中夏、恽代英等革命领袖与进步学者定期到校讲演，阐释革命形势、鼓舞革命斗志。军校还设置了“政治问答箱”，编成《政治问答集》，创办血花剧社，让学员在耳濡目染与沉浸体验中坚定革命信仰。

为强化“知”的内化与“行”的自觉，黄埔军校构建起多维度、全方位的精神教育与政治教化体系，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建国理念融入校园文化、制度规范与日常训练中。其一，以校训、训词铸魂。军校校训“亲爱精诚”由蒋介石拟定、孙中山核定，“亲爱”倡导革命同志相亲相爱、团结一心，“精”为精益求精、苦练本领，“诚”为诚心诚意、矢志革命，成为黄



/《政治问答集》。

埔精神的核心内核。校门口悬挂“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的对联，横批“革命者来”，直白宣示军校的革命宗旨，筛选并塑造纯粹的革命军人。其二，以制度与仪式强化认同。军校实行党代表制度，廖仲恺任首任党代表，后明确为“在军校及军队中，一切命令须经党代表副署方为有效”，确保革命主义在军校教育与军队建设中落地生根，杜绝旧式军队“私兵化”弊端。在孙中山逝世后，军校每周举行一次“总理纪念周”活动，诵读孙中山遗嘱、重温革命誓言，强化“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责任担当，将个人理想融入救国建国的革命洪流。

黄埔军校践行“知难行易”

学说的另一重要实践，是开创了“课堂—操场—战场”三位一体，“以战场为课堂”的实战化教育模式，将军事训练与革命战争紧密结合，让学员在实战中检验“知”的成效、锤炼“行”的能力，诠释“有志竟成”的革命信念。军校军事课程分为“学科”与“术科”两大类：学科涵盖步兵操典、射击教范、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等军事理论，培养学员的军事素养与指挥思维；术科包括制式教练、战斗教练、野外演习、实弹射击等实操训练，夯实学员的军事技能。与旧式军校“课堂与战场脱节”不同，黄埔军校坚持“寓学于战、学练结合”，从建校初期便将实战作为重要教学环节。1924 年秋，广州商团叛乱，军校第 1 期学员入校不足半年，便以主力身份投入平叛战斗，在实战中践行所学、锤炼勇气。此后，东征陈炯明、北伐战争等历次战役中，黄埔师生皆冲锋在前，教官随队出征、利用战斗间隙教学，学员边作战边学习，将课堂所学战术理论直接应用于战场实践，实现“学用结合、知行合一”，这种“战场即课堂”的教育模式，不仅快速提升了学员的实战能力，更让他们在血与火的



/ 黄埔军校学生在北伐前线。

考验中坚定革命信仰、强化使命担当，真正成长为孙中山所期望的“为主义奋斗、为国民牺牲”的革命军战士。

综上，黄埔军校通过系统的政治教学、浓郁的革命文化、严格的制度规范与实战化的训练模式，将孙中山的军政构想与革命思想深度融入办学实践，培养出大批信仰坚定、能征善战的革命军官，为实现军政时期的目标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与武力保障。

黄埔师生的革命实践与时代价值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构想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建国蓝图，其核心在于通过革命武装打破旧秩序，进而以政治信仰凝聚建国力量。黄埔军校作为这一方略的实践载体

之一，培育出大批兼具革命信仰、军事素养与家国担当的优秀人才。其毕业生走出校园后，不仅在军事战场上完成军政时期“扫除国内障碍、促进国家统一”的核心任务，更在民族救亡、国家建设等多元领域践行建国理念，成为推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国家重建的重要力量。

在军政时期的统一战争中，黄埔毕业生成为东征、北伐的中坚力量。1925年第一次东征，黄埔学生军作为主力，展现了旧式军队从未有过的勇武精神，黄埔1期生蒋先云曾提到第一次东征中攻打淡水城的情况：“同学身先士卒，扒城先登，不知道什么是生死。同学李青，头打伤了，用自己的手裹着血头，仍奋勇登城。同学蔡光举，

他打穿了肚子，我奉校长命去扶他，他只说：‘先云！赶快为我医治，逆贼正待我们痛杀！’”这种精神就是平日主义训练的结晶。正如棉湖战役大胜后，蒋介石在战后总结中指出：“此役之胜利，全在学生军之奋不顾身。”经过东征南讨，国民政府肃清广东地方割据势力，彻底稳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实现了孙中山“一省底定、军政告成”的阶段性的建国目标。1926年北伐战争全面爆发后，黄埔学生作为北伐军基层指挥骨干，转战湘、鄂、赣、闽等多地，接连击溃吴佩孚、孙传芳等北洋军阀势力，打破了民初以来军阀割据的分裂格局，极大推进了全国统一进程。与追求派系私利的旧式军队截然不同，黄埔官兵始终以革命建国为初心，

军纪严明、民心所向，为军政秩序的全面建立筑牢了军事根基。

在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进程中，黄埔师生跨越派系分歧，以民族大义为先，再次成为民族救亡的中流砥柱。黄埔毕业生徐向前、左权、林彪、杜聿明、宋希濂等国共将领，分别在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协同作战，参与淞沪会战、太原会战、百团大战等诸多关键战役，以武装抗争抵御外侮、捍卫国家主权。正如黄埔一期生、时任第36师师长的宋希濂在淞沪会战中发出“日寇犯我中华，国土寸寸沦陷，我36师将士，不驱日寇，誓不还乡！纵是粉身碎骨，绝不后退一步！”的钢铁誓言，数以万计的黄埔军校师生血洒抗日战场，展现了敢于牺牲、团结担当的黄埔精神，为国家存续与民族复兴奠定了安全根基。

除军事领域外，黄埔军校突破了传统军事学堂单一育才的局限，为国家后续建设储备了政治、宣传、基层治理工作等多元人才。诸多黄埔学生在毕业后投身地方治理、民众动员、社会改造工作，为训政时期地方自治建设积累了实践经验。如黄埔4期生卢子英，长期扎

根重庆北碚地区，1927—1949年先后担任“江巴璧合”四县峡防团务局有关职务，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实验区署副区长、区长、北碚管理局局长，参与其胞兄、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开拓的事业，致力于乡村实验区建设。使北碚成为民国时期中国乡村建设的三大典范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卢子英邀请和帮助了大批内迁的企业、学校和文教机构落地北碚，为支持抗战和发展北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黄埔师生始终是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力量，国共两党黄埔学子秉持孙中山革命遗志，在不同历史阶段携手合作、共御外侮，彰显了建国方略中团结国民、共建国家的核心精神。

从东征北伐的枪林弹雨到抗战救国的烽火硝烟，从军事将领的浴血奋战到建国人才的多元培育，黄埔毕业生以“知行合一”的实践，将《建国方略》从理论蓝图转化为历史进程。正如民国史专家唐德刚所言：“没有黄埔军校就没有北伐，没有北伐就没有国民党的政权，没有国民党的政权，抗战期间中国就没有政府。国共两党的高层人士都和黄埔军校有关系，可以说没有黄埔军校就没有现

代中国，整个一部中国近代史，逃不掉黄埔的影子。黄埔军校诞生于中国的军阀时代，它的诞生统一了中国的革命军，打到了军阀，开启了中国的一个新时代。”整体而言，黄埔毕业生的革命实践，既以武力完成军政时期统一治乱的核心任务，守护了国家重建的基础，又以多元人才力量支撑国家长远建设，延续了孙中山循序渐进的建国理想，充分印证了黄埔军校作为军政构想实践载体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

百年回望，黄埔军校的创办与发展，是孙中山《建国方略》从理论构想走向革命实践的重要载体，是其“以军救国”思想的生动诠释。黄埔军校破解了中国革命初期无强军的现实困境，将心理建设的精神内核、军政建设的实践路径深度融合，由其孕育的信仰至上、知行合一、为国担当的革命精神，践行了孙中山《建国方略》中描绘的宏伟蓝图与革命理想，更为近现代中国摆脱战乱、走向新生筑牢根基。立足新时代的强国建设，我们仍需坚守初心，凝聚共识，锻造忠诚担当的建设力量，在传承百年革命精神中赋能民族复兴，在强国建设实践中续写新的华章。

以“四个坚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行稳致远

□ 翁明源 骆婷

2026年4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这是国共两党领导人时隔10年后的再次会面。会见中，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从历史逻辑、现实需要与未来愿景出发，深刻阐明两岸关系的本质属性与发展路径，提出“坚持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坚持以和平发展守护共同家园，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坚持以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四个坚持”。这一重要论述内涵丰富、逻辑严密，既立足当下两岸关系的现实问题，又着眼民族复兴的长远目标，构建起新时代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根本遵循与行动框架。

“四个坚持”引领两岸关系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

当前，两岸关系形势复杂多变，但同根同源的历史文化与不可分割的民族情感，始终是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坚实基础。坚持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旨在以共同历史文化与民族认同为纽带，夯实两岸关系的思想根基；坚持以和平发展守护共同家园，着眼于在复杂国际形势下通过对话协商与合作互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通过多层次、多领域的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两岸利益联结与情感融合；坚持以团结奋斗实现民族复兴，则凸显两岸同胞共同参与民族复兴进程、共享发展机遇与历史使命的价值指向。

一、坚持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是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思想基础。

首先，正确认同是两岸关系发展的前提条件，

是一切问题得以解决的思想起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相连，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一家人相处，只要有话好好说、有事多商量，就没有化解不了的矛盾分歧。社会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借口。”两岸关系不是简单的政治关系，而是建立在深厚历史、文化与情感基础之上的特殊关系。只有在认同层面形成共识，明确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血脉联系，两岸关系的发展才具备稳定而持久的内在支撑，这是两岸关系最深厚的根基，决定了两岸关系不可能被人为割裂或长期对立。

其次，正确认同的核心在于民族、国家与文化认同，这种认同深植于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与现实生活中。正如总书记在讲话中所强调的，两岸同胞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也铸就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引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在台湾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语言使用，还是节庆习俗，亦或饮食结构、宗族礼俗等，都与东南沿海地区的传统文化呈现出显著的历史延续性与文化同源性。这种在日常生活方式与文化实践层面的高度一致，使两岸民众在长期交往过程中更容易形成情感认同与文化共鸣，也正是“两岸一家亲”的真实写照。

最后，“正确认同”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是反击“台独”分裂行径、实现“心灵契合”的关键支撑。在当前复杂形势下，部分分裂势力试图通过歪

曲历史与割裂文化认同来削弱一个中国的认知，这严重损害了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因此，国共两党强调反对“台独”，是维护台海和平、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的正义之举，也是对岛内扭曲“九二共识”杂音的拨乱反正。“心灵契合”是两岸融合发展的最高境界，只有筑牢正确的身份认同，才能从根源上铲除“台独”生存的土壤，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祖国统一夯实最坚实的人心基础。

二、坚持以和平发展守护共同家园，是两岸关系健康交流往来的根本保障。

首先，和平发展顺应时代潮流，是两岸关系必须把握的大方向。当今世界正处于深刻变革之中，地区冲突此起彼伏，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无论是伊朗、乌克兰还是加沙地带的硝烟，都让全世界更加深切地体会到和平与安定的弥足珍贵。在这样的背景下，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共同追求。台海局势的稳定与否不仅关系两岸同胞福祉，也直接影响地区安全与世界和平。因此，和平发展不仅是两岸关系的内在要求，也是顺应国际大势的必然选择。

其次，以和平发展守护共同家园是实现民族复兴与民生福祉的现实路径。两岸同胞都期盼和平安宁与美好生活，这构成了两党携手合作、推动两岸关系改善与发展的动力。坚持和平发展方向，通过交流对话化解分歧、累积互信，不仅有助于扩大两岸共同利益，更能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避免两岸同胞沦为外部势力的工具。两岸同胞应紧密团结，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共创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为守护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奠定最坚实的基础。只有牢牢把握这一政治前提，两岸关系才能在复杂环境中保持定力，在风险挑战中实现稳步发展。

最后，坚持和平发展是排除外部干扰、牢牢把

握两岸关系主导权的战略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这一重要论断深刻说明，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势力插手，两岸事务本质上属于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也应由两岸中国人依靠自身的智慧与能力加以解决。两岸同胞作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台湾的前途命运从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统一进程，而不是外部势力的干预，更不是“台独”分裂势力所能左右，任何企图借台湾问题遏制中国发展、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外部干涉行为，都注定会失败。因此，只有坚持和平发展，才能有效压缩“台独”分裂和外部干涉的操作空间，增强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动性、稳定性和可控性，确保两岸关系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发展，为最终实现祖国统一创造有利条件。

三、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是两岸关系不断深化的实践路径。

首先，交流融合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与两岸民众心灵契合的切实举措。两岸关系的稳定在于民间的往来与深度融合，这种融合不仅是经贸的交流，更是情感的交织与命运的交汇。在日常互动中，无论是两岸青年共同参与乡村振兴项目，还是基层民众在民俗文化活动中的共鸣，都是“两岸一家亲”最真实的展现。这种从点滴细节中累积的互动，能够跨越隔阂，让两岸同胞在共同奋斗中增进对彼此的了解。交流融合的深度决定了两岸关系的厚度，通过这种全方位、多层次的交流，不断拉近两岸同胞的心灵距离，为实现两岸关系的最高境界——“心灵契合”提供最切实的实践支撑和动力源泉。

其次，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不仅具有现实紧迫性，更具有长远战略意义。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明确表示：“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欢迎台湾农渔产品、优质商品进入大陆千家万户。”“愿同广大台

湾同胞共享发展机遇和成果、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通过不断扩大交流、深化合作，可以在更大范围内拓展共同利益，使两岸关系在现实利益与情感认同的双重支撑下持续向前发展。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同胞福祉系于民族复兴。因此，交流融合是深化两岸关系、实现心灵契合的重要方式，也是推动两岸关系行稳致远、把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的重要支点。

最后，交流融合已经在多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为两岸同胞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多年来的融合实践已结出累累硕果。在民生保障方面，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累计供水量已超过4600万吨，解决了金门乡亲的用水难题，这一“以水为桥”的壮举，增进了两岸同胞亲情福祉。在青年发展领域，大批台湾青年在大陆的乡建乡创工作中找到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他们在参与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前沿产业的过程中，真切感受到了祖国大陆日新月异的变化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机遇，从而增强了民族自豪感。此外，广大台商长期在大陆投资兴业，利用大陆广阔的市场空间实现了事业飞跃。这些生动案例充分证明，交流融合能在两岸之间架起互利共赢的桥梁，使台湾同胞在参与共同家园的建设中，切实获得幸福感与安全感。

四、坚持以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两岸关系共赢发展的目标指向。

首先，两岸关系的发展必须置于民族复兴的历史宏观进程中加以把握。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阐释了新形势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大政方针。两岸关系不再是孤立的议题，而是关乎国家未来发展的命题。在此基础上，通过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优势互补与协同发展，两岸同胞不仅能够实现互利共赢，

更能在共同奋斗中融入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其次，推动国家统一与民族振兴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使命与现实责任。孙中山先生当年提出的振兴中华、国家统一的理想，在新时代背景下仍是凝聚两岸同胞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一历史使命要求两岸同胞立足民族大义，超越分歧、增进理解。只有在团结中汇聚力量，在奋斗中实现发展，两岸关系才能在复杂环境中保持前进动力，最终实现国家统一、民族复兴。

最后，团结奋斗的目标需通过具体实践落实，在携手共创未来的进程中实现共享繁荣。这种奋斗具体落实为两岸同胞在就业、创业、文化交流等各领域的实际行动。例如，积极欢迎台湾青年来大陆交流发展，为其提供更广阔的逐梦舞台，通过青年一代的互学互鉴，为民族复兴注入青春力量。两岸同胞同心同行，不断拓宽发展空间，进而在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实现共同繁荣，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

以“四个坚持”为指引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走深走实

“四个坚持”的生命力，最终体现在具体实践之中。这一重要论述不仅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供了原则遵循，也指明了可操作、可落实的发展路径。只有将这些原则性要求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安排与行动方案，才能真正把顶层设计落到实处，使两岸关系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稳定发展，并不断积累前行的动力。

一是要持续巩固政治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两岸同胞要守护好、建设好这个共同家园，根本在于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核心是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历史反复证明，承认“九二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关系就能改善发展，台湾同胞就能受益。只有始终坚持这一

共同政治基础，旗帜鲜明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才能确保两岸关系不偏航、不 disorder，在复杂多变的形势中保持稳定发展。

二是要不断深化交流合作。在实践中要不断拓展两岸交流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不断扩大经贸往来、深化产业对接、加强人文交流，通过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使两岸同胞在交流交往交融中不断增进理解、凝聚共识，从而为两岸关系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2026年4月，中央台办受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聚焦台湾同胞实际需求，涵盖政党交流、青年发展、经贸合作、民生便利与文化互动等多个领域，为两岸交流合作向更高水平迈进提供了重要制度支撑。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应坚持以民生福祉为落脚点，通过扩大交往领域、提升合作质量，并辅之以相关政策支持，在持续互动中积累共识、增进认同，从而为两岸关系长期稳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现实条件。

三是要持续强化民意沟通。当前，两岸信息传播渠道与舆论环境存在差异，不同社会群体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容易形成理解偏差与认知落差，进而影响判断的准确性。因此，有必要从信息传播与认知引导层面入手，增强沟通的针对性与有效性。在具体方式上，应更加注重信息的真实性与多源性呈现，通过更客观、全面的事实传递，提升社会认知的准确度。同时，可以借助媒体平台与新兴传播渠道，加强对交流动态与相关信息及时、透明的呈现，消减误读与误解。此外，还可通过更具对话性与灵活性的沟通机制，回应社会关切，增进不同群体之间在事实层面的理解与共识，从而为两岸关系的稳定发展营造更为理性的舆论环境。

四是要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与安全底线。在外部环境与台海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两岸关系的发展不仅取决于内部互动的深化，也受到外部因

素的持续影响。因此，要提高防范和化解各类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一方面，应坚定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核心立场，持续巩固反对“台独”与外部势力干涉的共同认知与行动基础，避免两岸关系被少数政治力量或外部因素所裹挟，确保其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另一方面，要增强风险预判与应对能力，完善对突发事件与舆情变化的协调处置机制，在复杂局面中保持政策连续性与稳定性。同时，应通过更具前瞻性的制度设计与政策供给，提升两岸互动的韧性与可持续性，使各领域交流合作在可控、安全、稳定的环境中持续推进，从而在整体上增强两岸关系发展的内生动力与抗风险能力。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创两岸关系新局面

展望未来，两岸关系具有清晰而稳定的发展趋势。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无论国际形势、台海局势如何变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趋势不会改变，两岸同胞走亲走近、走到一起的大潮流不会改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趋势决定了两岸关系发展的总体方向。随着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国家综合实力持续增强，两岸关系的发展将越来越多地融入民族复兴的整体进程之中，两岸同胞共享发展机遇、共同壮大民族经济的空间将不断拓展，从而为两岸关系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与发展动力。两岸同胞走近走亲的历史潮流决定了交流融合的必然性。两岸同胞都期盼和平安宁、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这种深厚民意基础构成了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支撑。随着交流合作不断深化，两岸在经济、文化与社会层面的联系将更加紧密，彼此理解与认同也将不断增强，进而推动出现两岸关系更加稳定、更加深入发展的新局面。

（作者翁明源为四川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骆婷为四川行政学院政治学专业硕士生）

以法为桥梁 以服务促理解

——黄埔精神引领下的两岸青年交融新路径

□ 杨灵统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内忧外患，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以热血与生命开创民族独立与国家复兴之路，黄埔军校所孕育之青年群体，尤为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自1924年建校以来，黄埔同学秉持“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投身东征北伐，转战抗日疆场，在民族危亡之际，以青春赴国难，以热血写忠诚，成就了一段以青年为主体的壮阔历史。可以说，黄埔的历史，本质上就是一部青年为民族奋斗、为国家牺牲的历史。

进入新时代，国家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两岸关系亦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随着全球格局深刻变化与两岸交流形态不断演进，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延续历史精神、回应时代命题，已成为摆在青年一代面前的重要课题。尤其是在当前两岸关系背景下，深化两岸交流、增进同胞情谊，不仅关乎现实发展，更关乎民族未来。

作为黄埔后代，同时也是一名司法工作者，笔者在日常工作与交流实践中，深切感受到两岸青年之间既存在天然亲近的一面，也面临认知差异与制度理解上的现实挑战。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立足实务经验，结合历史脉络与时代背景，从青年交流、身份使命与法治保障等层面出发，探讨在新时代如何以黄埔精神为纽带，推动两岸青年在交流中增进理解，在合作中凝聚共识，进而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添新力量。

青年一代是深化两岸交流的关键力量

在两岸关系交流中，青年一代正逐步成为影响未来走向的关键变量。从历史经验来看，每一个重大时代转折，往往都伴随着青年群体的参与和推动。从现实情况来看，随着社会结构变化与传播方式革新，青年群体在价值塑造与舆论生成中的作用亦日益凸显。在此背景下，如何凝聚青年力量，引导青年参与，已成为深化两岸交流、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七次会员代表会议提出要发现和培养新生代黄埔亲属力量，强化两岸交流的青年基础。这不仅体现了对历史传承的重视，更反映出对未来的前瞻性布局。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归根结蒂并不取决于制度安排或短期互动，而是深植于青年一代的情感认同与价值选择之中。换言之，谁能在青年群体中建立理解、信任与共鸣，谁就能在未来两岸关系中掌握更大的主动权。

因为天然的亲近感与共同话题，当代两岸青年具备开展交流交往的良好基础。成长于数字化与全球化背景下的青年一代，在信息接收方式、消费习惯与生活方式上呈现出高度相似性。无论是对流行文化的关注，还是对科技创新与个人发展的重视，两岸青年之间往往能迅速建立共同话题与情感联接。这种文化隔阂最小、沟通成本最低的特点，使得两岸青年能够成为交流交往中最易接通的一环。相较于历经特殊历史阶段的上一代人，青年群

体较少受到既有叙事的束缚，更倾向于以开放、务实的态度看待彼此差异，这种特质使其在交流过程中具有更低的心理门坎与更高的互动效率。

然而，在当前信息环境下，部分台湾青年受限于特定媒体叙事与信息结构，对大陆社会的认知仍存在一定偏差，甚至形成刻板印象与心理距离。在此情况下，单向的信息传递往往难以产生实质效果，反而容易加深误解。因此，推动两岸青年交流，关键不在于“说什么”，而在于“如何让对方亲身感受”。唯有透过真实、具体、持续的交流互动，让青年在实际接触中形成直观体验，方能逐步消解既有认知隔阂，这种“以交流促理解”的效果尤为明显。

举个例子，笔者工作在司法第一线，台湾青年朋友常常会来咨询大陆法律问题，通过深入浅出的解疑答惑，不绕弯子不乱说话，因此让台湾青年觉得笔者值得信任、有安全感，愿意交这样的朋友。就是通过这样一点一滴的相处，自然而然让台湾同胞对大陆产生了向心力。笔者在与台湾青年交流过程中发现，多数青年在面对面接触时，往往并不拘泥于抽象立场，而更关注具体问题与真实感受。在应对法律咨询时，只要能以清晰、诚恳且专业的方式进行沟通，往往能迅速建立基本信任。这种信任并非源于宣传，而是来自于具体互动中的可感知经验。当这种经验透过个人分享在其社交圈中扩散时，便会形成具有说服力的“次级传播”，对改善整体认知环境产生长远影响。

青年交流的价值，不仅在于当下互动，更在于长期记忆的累积。当两岸青年在求学、实习、就业与创业等人生关键阶段产生交集，这些共同经历将转化为深层的情感联结与集体记忆，进而影响其未来的价值判断与行动选择。从这个意义上看，深化两岸青年交流，本质上是一项面向未来的基础性工

程，其成效或许不会立即显现，但将在长期发展中逐步释放影响力。因此，以青年为着力点推动两岸交流，既是历史经验的自然延续，也是现实条件下的理性选择。通过搭建更多元、更稳定、更具吸引力的交流平台，引导青年在互动中建立理解、在合作中形成认同，将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奠定更为坚实的社会基础。

促进两岸交融是青年一代黄埔亲属的时代使命

时代不同，使命相同。两岸关系的未来，取决于青年一代的价值选择与情感归属。在此背景下，作为黄埔精神的承继者，青年一代黄埔亲属不仅承载着历史记忆，更肩负着赓续先辈爱国之志的时代责任。如何将历史所赋予的精神资源，转化为推动两岸交流合作的现实动力，如何在新的时代环境中，以更具包容性与建设性的方式促进两岸青年交往交融，已成为青年一代黄埔亲属亟需深入思考的重要议题。

回望近现代中国历史进程，黄埔军校不仅是一段军事教育史，更是一种跨越时代的精神象征。自建校以来，黄埔军校以“爱国、革命”为核心价值，培养出大批投身民族解放与国家建设的青年力量，形成了以理想信念为引领、以实际行动为支撑的精神体系。这一精神，在历史长河中历经淬炼，早已超越特定历史阶段，成为联结不同世代的重要文化纽带。进入新时代，历史条件与时代任务虽已发生深刻变化，但黄埔精神所蕴含的价值内核并未改变。对青年一代黄埔亲属而言，所继承的不仅是家族记忆与历史荣光，更是一份在当代重新诠释与实践的责任。这种责任，不再体现在战场上的生死抉择，而是体现在和平发展环境中对国家、民族、社会的现实担当。

如今，青年一代黄埔亲属早已在各行各业之中

各展所长：有服务于公共治理体系的公职人员，有深耕教育与学术领域的知识分子，有维护公平正义的司法工作者，更有活跃于市场经济前沿的企业经营者与创新创业群体。他们纷纷把先辈的爱国之志化作实干担当的行动自觉，在各自领域发光发热，在和平建设中以专业诠释担当。不仅如此，青年一代黄埔亲属还积极参与抗战纪念、史料整理，推动教育、投身公益，构成了黄埔精神在新时代的多元呈现方式。也正因如此，青年一代黄埔亲属不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现实社会运行的重要参与者，是“历史和现实之间的桥梁”。

在深化两岸交流中，黄埔亲属这一身份具有特殊意义。一方面，黄埔历史本身即为两岸共同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天然的情感联结基础；另一方面，黄埔亲属在价值认知与文化背景上，往往同时具备历史理解能力与现实沟通能力，能够在不同叙事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相较于单一立场的表达，这种兼具历史厚度与现实经验的身份，更容易在交流中建立信任与共识。因此，青年一代黄埔亲属的时代使命就是做深化两岸青年交流的主力军，让台湾青年亲身感知、亲眼见证祖国大陆的发展进步，共同弘扬传承中华文化，在双向互动中增进理解、消除认知隔阂，为构建两岸青年共同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凝聚坚实基础，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添新力量。

当前，部分台湾青年在历史认知与文化认同上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特别是在特定政治与媒体环境下，一些片面叙事逐渐固化，影响青年群体对历史与现实的判断。在此背景下单纯的理念宣讲往往难以产生实质效果，反而需要透过具体行动与长期互动，逐步建立更为全面与立体的认知框架。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青年一代黄埔亲属的时代使命愈发凸显，其核心不在于简单传递既有观点，而

在于以自身经历与专业实践为基础，在交流互动中提供更多可感知、可验证的真实经验。无论是在历史文化遗产、公共服务实践，还是在教育、法律、产业合作等具体领域，黄埔亲属都可以通过实际参与，成为联结两岸青年、促进相互理解的纽带。

这种“以人为桥”的联结方式，相较于单一制度安排或短期活动，更具持续性与渗透力。当交流不再停留于表层接触，而是转化为长期合作与共同成长的过程时，原本抽象的认同问题，亦将在实践中逐步转化为具体而稳定的情感联结。因此，青年一代黄埔亲属的使命，既是历史的延续，也是现实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唯有将黄埔精神内化为专业能力与行动自觉，在各自领域中持续发挥影响力，方能在两岸交流交融的过程中，真正承担起“联结者”与“促进者”的角色，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文支撑。

以法为桥梁构建两岸青年交融的法治路径

当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去思考和解决两岸交流中遇到的问题。在两岸融合发展逐步深化的过程中，如何在交流互动之外建立稳定、可预期的制度保障，已成为影响青年跨域流动的重要因素。其中，法治作为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不仅承担着维护公平正义的基本功能，更在不同制度环境之间发挥信任衔接的重要作用。对于初次接触大陆社会的台湾青年而言，其关注焦点往往并不局限于发展机会本身，而更集中于对法律规则、权益保障的理解与判断。如何有效回应这一关切，成为推动两岸青年深入交流的关键环节。依法保障两岸青年在文化、经济领域互动交往中的合法权益，是两岸青年交融的基础。

部分台湾青年在进入大陆学习、就业或创业

过程中，对相关法律制度存在陌生感，由此心理上产生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既来自于制度差异本身，也来自于信息来源的不完整与理解上的偏差。在缺乏认知的情况下，即便具备发展意愿，亦可能因风险顾虑而降低实际参与程度。因此，如何透过制度化安排降低认知门坎、提升制度透明度，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基于此，有必要以法治为抓手，探索构建促进两岸青年交融的长效机制。具体而言，可在现有工作基础上，推动设立“黄埔青年法律服务中心”，整合司法资源与社会力量，尤其是凝聚青年一代黄埔亲属的力量，打造面向台湾青年的专业化法律服务平台。该平台可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形成覆盖事前咨询、事中支持与事后救助的全流程服务体系。在事前阶段，通过开设法律知识讲座、发布通俗化法律解读内容、提供在线咨询服务等形式，帮助台湾青年理解大陆法律制度的基本架构与运作逻辑，降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理解成本。在事中阶段，针对台湾青年在实习、就业、创业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合同纠纷、劳动权益、知识产权等问题，提供专业指导与必要支持，提升其依法维权的能力与信心。在事后阶段，通过法律援助与纠纷调解机制，确保相关权益争议能够得到公正、及时的处理，进一步增强制度运行的可预期性。

除提供具体服务功能外，该平台还可推动各地出台完善保障两岸青年同等待遇的政策法规，明确台湾青年在大陆实习、就业和创业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推动组织两岸青年开展“黄埔足迹寻访”“法律文化沙龙”等活动，在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法律文化交流中，增进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透过公开透明的司法实践、典型案例的规范解读，以及跨区域法律协作机制的逐步建立，使台湾青年在实际接触中感知制度的稳定性与公正性。当法治不再

是抽象概念，而是可被体验与验证的现实存在时，其所带来的信任效应，将远超单向宣传介绍所能达到的效果。

通过法律服务保障两岸青年交流，当双方能够在共同遵循的规则框架下开展合作，原有的制度差异将逐步转化为可理解、可适应的现实条件，而非阻碍互动的障碍。透过规则认同，进一步带动情感认同，最终形成更加稳定的交流基础。作为一名司法工作者，笔者深感法治在两岸交流中具有独特价值。关注台湾青年在大陆生活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为台湾青年消除“法治隔阂”，让其感受到大陆法治的公平和温度，打通其在大陆生活、创业的“法治最后一公里”，才能真正让台湾青年在大陆“此心安处是吾乡”。

展望未来，两岸青年作为时代的亲历者与参与者，必将在交流交融中书写新的历史篇章。唯有在不断深化互动中凝聚共识，在共同发展中实现价值契合，方能推动两岸关系行稳致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持续而深厚的青春力量。以法治为支撑的制度保障，将为两岸青年交流提供更加稳定与可预期的发展环境，使两岸青年在跨域发展过程中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与制度温度，进一步由“接触”走向“融合”，由“理解”走向“认同”。

黄埔军校所承载的历史和精神，将持续发挥其独特价值。它不仅是一段历史的记录，更是一种跨越时代的精神财富，为当代青年提供方向指引与价值参照。笔者愿持续秉持专业精神与责任意识，立足本职岗位，积极回应两岸青年在交流过程中的实际需求，以法治守护权益、以服务促进理解，在平凡实践中积累信任基础，使法治真正成为连接两岸青年、促进理解互信的重要桥梁。

（作者为浙江省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黄埔军校4期生秦友庸之外孙。）

2026年4—5月 海峡两岸大事记

□ 吴亚明

2026年4月

在台隐蔽战线牺牲者魂归故里，国台办：人民和历史不会忘记

经过两岸双方多年共同努力，清明节前，又有在台湾隐蔽战线上的牺牲者骨灰回到大陆，魂归故里。国台办发言人张晗1日就此答问表示，仁人志士的英勇事迹，人民不会忘记，历史不会忘记。

丙午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在陕西黄陵举行

5日，丙午（2026）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在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举行。今年的公祭活动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奋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为主题，围绕公祭活动举办“文脉永续与复兴之路”黄陵寻根活动、海峡两岸文化艺术展、2026“我心中的黄帝陵”青少年书画活动等5项活动，形成“主典礼+系列活动”的文化传播矩阵。

台湾社会热议“张雪机车”夺冠

大陆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双回合正赛中夺冠，创造奇迹，在有着“机车之岛”之称的台湾引发热议。

郑丽文率团抵达大陆开始参访行程

应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邀请，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7日率国民党访问团经上海抵达南京，开始大陆参访行程。

解放军反分裂反干涉手段越来越丰富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9日答问时表示，台

湾是中国的台湾。没有人比我们更珍视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但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解放军反分裂反干涉的手段会越来越丰富，坚决粉碎“台独”分裂妄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10日上午在北京会见了郑丽文主席率领的中国国民党访问团。习近平就两岸关系发展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正确认同促进心灵契合。第二，坚持以和平发展守护共同家园。第三，坚持以交流融合增进民生福祉。第四，坚持以团结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激励两岸同胞共创民族复兴伟业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会见郑丽文主席率领的中国国民党访问团并发表重要讲话，受到海内外高度关注。受访的两岸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立意高远、饱含深情。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中提出的4点意见，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指引，必将激励两岸同胞勠力同心，把两岸关系的未来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

中央台办受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

应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邀请，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率团于7日至12日来大陆参访。习近平总书记会见郑丽文主席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党和两岸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进同胞亲情

福祉，经商有关部门，中共中央台办12日受权发布十项政策措施。

两岸专家：十项涉台新政充满诚意善意，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中共中央台办12日受权发布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多名涉台研究学者表示，十项涉台新政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增进同胞亲情福祉的具体行动，体现了祖国大陆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以满满的诚意和善意回应广大台胞关切，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厦门推出“首来台胞厦门服务包”

13日，厦门正式向首次来大陆且从厦门口岸入境的台湾同胞推出集“交通出行、旅游观光、住宿优惠”于一体的“首来台胞厦门服务包”。

台湾文旅业界参访宁夏，共促两岸文旅交流融合

来自台湾的35名文旅业界代表应邀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开展了为期8天的“两岸情·塞上行”参访交流活动，实地探访宁夏特色文旅资源，体验黄河文化、丝路文明与民俗风情，共商宁台两地文旅合作新路径。

宝岛好物“上新”消博会，台商寻觅大陆市场新机遇

在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上，首次设立的台湾特色展区成为全场焦点。一件件宝岛好物跨海而来，集中展示台湾特色产业与品牌形象，也为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增添了新的活力。

海峡两岸（厦门）民俗文化节启幕

15日，2026海峡两岸（厦门）民俗文化节在厦门海沧青礁慈济祖宫广场举办开幕式。

“友好湖南”发出邀约：欢迎台青来湘逐梦

16日，以“友好湖南，青春‘湘’约”为主题的

2026海峡两岸（湖南）青年交流发展大会在湖南长沙举办。正全力打造“年轻人友好省份”的湖南，向广大台湾青年发出邀约，欢迎台青来湘学习、生活、就业、创业。

2026年闽台青少年民族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州启动

17日，“青春相约·融通未来”2026年闽台青少年民族文化交流活动在福州华侨中学启动。包括30余名台湾少数民族青少年在内的300余名两岸青少年，在福州开展为期6天的交流活动。

台湾举行丙午年恭拜轩辕黄帝大典

农历三月初三相传是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的诞辰。19日，丙午年恭拜轩辕黄帝大典在位于台湾新北市的淡水黄帝神宫隆重举办，以传承千年文明，弘扬两岸同根同祖同源的精神。

桂台同胞欢度“广西三月三”共话交流合作

500余名桂台同胞齐聚广西南宁，在《大地飞歌》的欢快旋律中共话交流合作，欢度“广西三月三”。自2016年首次邀请台湾同胞共度佳节以来，已经有160多个台湾团组、4000多位乡亲跨海赴桂，走亲叙情。

第18届西湖·日月潭“两湖论坛”在台举办

第18届西湖·日月潭“两湖论坛”22日在台湾南投日月潭举办。本届论坛以“湖光延无限，携手拓新程”为主题，强调南投、杭州情谊永续。

福建多地构建台胞住房保障体系

福建省福州、平潭等地率先构建台胞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实现了台胞台青来闽就业创业“拎包入住”。

台湾各界人士举办研讨会呼吁直面统一

由“三阁论坛”主办的“2026台湾生存战略研讨会”25日在台北举办，近300位岛内各界人士参加活动，围绕两岸交流与和平统一等议题展开讨论。

上海居民4月29日起可赴金门、马祖旅游

29日起，上海居民可通过上海市、福建省具备相关资质的旅行社报名赴金门、马祖团队游和个人游，并按规定向上述两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申请办理赴金门、马祖旅游签注。

2026年5月

台湾政党团体举行“五一”大游行，呼吁提高劳工待遇

1日，劳动节当天，台湾劳动党、劳动人权协会等岛内政党团体，在台当局领导人办公场所门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举行劳工大游行，呼吁当局重视劳工权益，提高劳工待遇。

台企荣炭科技：解除刘世芳亲属颜文群全部职务

江西省上高县荣炭科技有限公司5日发表声明宣布，自7日起，已解除“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亲属颜文群在台湾荣炭科技有限公司及上高县荣炭科技有限公司等大陆子公司的全部职务。

台湾团体举办圆桌会探讨两岸关系发展方向

“三閣论坛之新党圆桌会”7日在台北举行，围绕台湾前景与和平统一等两岸议题展开讨论。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际工作会议在京举行

中共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会同48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8日在北京召开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部省际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贯彻落实情况，研究下一步重点工作，支持福建在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上迈出更大步伐，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蓉汇青春·共创未来”两岸新媒体人联合采风

活动在蓉启动

“蓉汇青春·共创未来”两岸新媒体人联合采风活动9日在成都启动，约30名来自两岸的媒体工作者即日起在成都开展联合采风活动。

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京开幕

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11日在北京举办，两岸文化领域等各界代表人士800余人出席。

外交部：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

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1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台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为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捍卫联合国大会及世卫大会相关决议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中方决定不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今年世卫大会。

台湾方面再次无法参加世卫大会，国台办：这一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

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1日就台湾方面再次无法参加世卫大会答问时表示，这一局面完全是民进党当局造成的，是其在台湾地区参与今年世卫大会问题上进行政治操弄、是“以卫谋独”的失败，再次证明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格局不可撼动。

2026两岸海洋文化交流平台主场活动在福建平潭举办

以“越山向海·潮汇一脉”为主题的2026两岸海洋文化交流平台主场活动12日在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举办。来自两岸约300名少数民族代表、专家学者及各界人士会聚一堂，聚焦南岛语族文明根脉、海洋文化传承与两岸融合发展，共溯文明之源、共话融合之路、共筑同心之约。

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北京举行

以“AI时代两岸媒体的选择与合作”为主题的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12日在北京举行，两岸100余名媒体负责人、传媒学者、新闻界代表等参加。

“根脉同源·艺彩同辉——台湾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活动”在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举办

“根脉同源·艺彩同辉——台湾少数民族文化交流活动”13日在位于福建泉州的中国闽台缘博物馆举办。

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文学论坛在京举行

以“山河盛景·文韵飘香”为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文学论坛13日在北京举行，两岸60余名作家、学者等参加。

岛内举办论坛探寻台湾左翼抗日运动史

以“台湾共产党：台湾左翼抗日运动史的探寻与再现”为主题的论坛17日在台北举行，聚焦台湾共产党的革命事迹，旨在还原历史真相、夯实两岸共同的历史记忆。

台湾青年现场观礼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发射

24日23时08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搭载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F遥二十三运载火箭点火发射，中国航天向着星辰大海又一次壮丽出征。发射场内，欢呼声与掌声久久回荡，一群来自台湾的青年仰望苍穹，共同庆祝这一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全体中国人的荣耀时刻，用炽热的目光丈量梦想的高度。

国台办：大陆海警在金门附近海域开展执法巡查合理合法

福建海警26日位于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当天表示，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有利于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对此坚决支持。

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走进河南

“相约中原·豫见精彩”2026年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活动27日在郑州启动。来自两岸暨香港的40多名记者和特邀台青自媒体人一周时间内深入郑州、洛阳、开封等地采访企业、文博机构等，实地感受中原大地的厚重文化底蕴和蓬勃发展活力。

台湾政党团体集会反对对美军购，呼吁两岸和平

台湾劳动党、台湾社会共好连线、两岸和平发展论坛等多个政党团体代表27日在台民意机构前举行集会，抗议民进党当局持续“倚美谋独”“以武拒统”，反对对美军购，呼吁加强两岸对话、共享和平红利。

海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在京召开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第四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27日在京召开。会议围绕落实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分析当前台海形势，总结一年来海协会工作并对下一阶段工作作出规划。

国防部：美方应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28日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七”公报规定，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对中方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两岸新锐聚漳州，共话闽南文化赋能融合发展

31日，“台胞视野中的闽南文化：闽南文化新锐谈（漳州场）”活动在福建漳州举行。活动立足闽台深厚的文化同源根基，邀请在大陆发展的台湾同胞、专家学者、企业及金融界知名人士齐聚一堂，以多元新锐视角解读闽南文化、共叙闽台情缘、共商融合发展。

台陆军前司令李翔宙批台当局引进 M1A2T 是内行话还是外行话？

□ 郑剑

4月27日，台陆军从美国引进的108辆M1A2T主战坦克中的最后一批28辆抵台，随即进入驻新竹县湖口乡的装甲兵训练指挥部进行最后检验与换装训练。

台军新一代坦克军购案是民进党蔡英文执政时期的2018年7月拍板的，代号“锐捷专案”。美国特朗普首次执政时期的2019年7月8日批准出售，价值12.8亿美元。2024年12月16日，首批38辆M1A2T坦克抵台，其中28辆于2025年10月31日在同驻湖口乡的台陆军第6军团装甲第584旅联兵3营成军，10辆列装装甲兵训练指挥部。2025年7月28日，第二批42辆抵台，2026年4月10日列装第584旅联兵1营、2营。至于这最后一批28辆，其中14辆将列装驻桃园市杨梅区的第6军团机步第269旅所属联兵营1个战车连，其余14辆列装584旅联兵2营，最快在年底完成。如此一来，第584旅将列装84辆，实现全旅整体换装，成为台军最强装甲旅。

与108辆M1A2T同步引进的还有14辆M88A2装甲救济车、16辆M1070A1重型拖车头与16辆M1000重型半挂式拖车等配套保障装备。按照台军说法，108辆M1A2T坦克将成“卫戍行政中枢”的打击核心力量，象征台军装甲部队迈入世代交替的关键阶段。

尽管台军的新坦克阵容“颇为壮观”，但“锐捷专案”从启动开始就在台军内部和台湾社会争议不断。争议的核心不是台军的M60A3、CM-11、

CM-12系列老旧主战坦克是否需要淘汰，而是如何换装、换装什么、主战坦克是否应该走入历史等大问题。背后则是对主战坦克换装案的政治需要与军事适用性之间矛盾的争议。近来，随着最后一批M1A2T抵台，关于该坦克的争议再掀高潮，其中台陆军前司令李翔宙5月9日在网络节目专访的说法极其引人瞩目，毕竟他曾担任台陆军的“大管家”，说的当然是内行话，其任内可能也处理过该问题。在专访中，他强烈抨击采购M1A2T坦克的决策，评价其为“近数十年来最荒谬的军购案例”，质疑“我们现在台湾有多少的桥梁适合承载M1A2T战车？”

李翔宙2011年8月16日至2014年1月15日任陆军司令，2014年1月15日至5月4日升任负责武器采购在内的台湾当局防务部门“军备副部长”，对台湾陆军是否应该装备M1A2T这样的坦克是有足够发言权的。以李翔宙为代表的反对声音，其质疑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基于一套系统的军事逻辑与成本效益分析。所以，李翔宙的言论，究竟是卸任将领基于军事专业的“内行话”，还是出于对民进党当局反感、脱离台军变化实际的“外行话”，是不言自明的。

M1A2T 采购案的来龙去脉

新坦克换装旧坦克原本天经地义，各军队基本如此，即便有争论，多是战术技术性能需求、可维护性、后勤保障等方面相对细枝末节的问题，

不是台军所争论的根本性问题。但是，台军主战坦克换装，从提出到落实的过程充满曲折，这本身就说明最终的换装决策值得质疑。

早在民进党第一次上台的2000年，面对1999年10月1日隆隆驶过天安门广场的98式坦克（99式坦克前身）、96式坦克，倍感压力的时任台陆军总司令陈镇湘就以“战备急需”为由，正式向台湾当局提出向美国采购1个战车营约40余辆M1坦克的方案。自此，台陆军主战坦克换装案正式浮上台面，命名为“捷豹计划”。2001年4月24日，台军方在一年一度的“台美军售会议”上正式向美方提出采购M1A2坦克的需求。当时的小布什政府亦一度同意出售。但是，由于台军相关预算被挪去购买“爱国者-3”防空导弹和“阿帕奇”（AH-64E）武装直升机。更重要的是，美军内部亦有“台湾地形不适合重坦克”的评估，故该案被搁置。

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后，台军多次重启M1坦克采购案研究。论证初期提出购买200辆新造M1A2坦克，编4个战车营。后缩减为优先采购108辆美军淘汰的二手M1A1坦克，预算198亿新台币。但是，由于军费总量所限、台军内部对究竟优先换装M1这样的履带式重坦克，还是优先装备轮式突击炮的问题争论不休，导致高层举棋不定，故未正式立项。

到2012年，随着美军从伊拉克撤军，大量二手M1A2开始在国际军售市场上“甩卖”。台军遂派人赴美考察、商洽。考察发现，由于这批坦克是从战场上下来的，普遍存在车况差、维护贵、太重不适合台湾道路等问题。评估后放弃采购。

但是，一方面是坦克更新案迟迟不决，另一方面是台军坦克老旧、与解放军坦克质量差距拉大问题的日益严重，到2015年，台陆军再次提出坦克换装动议。在比较了M60A3延寿/升级与采

购M1A2坦克两个方案后发现，二代坦克的底子无法升级到三代水平，故换装案正式转向两个方案并举的方向，计划采购M1A2型坦克。

2016年民进党重新上台后，时任台陆军司令邱国正正式行文美方，提出购买M1A2的“报价与需求信函”。但时任防务部门负责人冯世宽紧急喊停，要求先完成“整体防卫战略”与“履带/轮式选型评估”，再做决定。到2017年，台军完成评估，确立优先采购M1A2方向。同时，编列预算预案，代号“锐捷专案”。

2018年2月至6月，台美军方密集会谈，美方态度从“不支持”转为“同意出售”M1A2坦克。2018年7月，民进党蔡英文当局正式拍板采购108辆M1A2T。历时长达18年的坦克换装案终于结束论证，进入军购执行阶段。6年后，首批台军专用的阉割版M1A2T运抵台湾。

这批坦克将悉数部署在台湾本岛北部所谓“北台湾防卫圈”，主要任务是作为预备队进行抗登陆和保卫“大台北”作战。台军企图利用M1A2T坦克的厚装甲、重火力和快速机动能力，实施机动作战，快打快撤，反击和歼灭从近岸、滩岸到城镇以及空降之“攻击军”。根据台军防御想定与实际部署，在抗滩岸登陆阶段，M1A2T坦克将避免担负滩岸一线海岸炮角色，而是隐蔽部署在战役战术纵深地区，在“攻击军”半渡以及登陆立足未稳之际实施反冲击，将对手歼灭或赶下海。在城镇战阶段，M1A2T坦克将披挂城镇战套件，预先部署在坚固工事、便于发扬火力的街区及其他复杂地形地物中，消耗、阻击、反击“攻击军”，达成“战略持久、战术速决”之目的。

M1A2T 采购案反对派的四大诘问

理想很丰满，M1A2T坦克阵容也不能说不壮

观，但现实却是骨感的。把 M1A2T 这种超重型坦克放在台湾岛这样特定的战场上，争议始终此起彼伏。综合台湾有关方面对装备 M1A2T“艾布拉姆斯”（Abrams）坦克的争议，反对者的观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水土不服。这也是批评最多的方面。认为台湾复杂的地理环境与 M1A2T 最高达 73 吨的战斗全重之间根本不兼容。台湾岛内山峦起伏，湿地、水稻田、河川和松软河滩星罗棋布，桥梁隧道纵横交错。M1A2T 坦克地面压力巨大，一旦离开硬质路面，极易陷车。全岛约 2.9 万座桥梁中，40% 建于 1980 年前，设计承重多在 30 至 50 吨，台军现役 52 吨的 M60A3 等已面临桥梁承重限制，M1A2T 可通行桥梁更少。台军方声称 M1A2T 战斗全重约 63 吨非 73 吨，还在新竹市旧港大桥进行了“选择性”通行测试，但仍无法改变远超绝大多数桥梁承重设计标准、可能直接压垮桥梁的事实。这意味着在实战中，这些坦克的机动范围将被限制在极少数的主要干道上，极易被发现、伏击或因道路损毁而陷入瘫痪。台湾高度城镇化，道路、街道狭窄，障碍物多。M1A2T 坦克体积过大，庞大的车体在巷战中转向困难，动力系统排放的废气和噪音极大，难以实现隐蔽伏击。况且 M1A2T 这种长于正面装甲对决、需要开阔地形发挥机动与火力的重型平台，在预设的城镇战、街巷战中，优势将大打折扣，反而可能因目标庞大、侧后薄弱，极易成为单兵反坦克武器、无人机、炮火精确打击的标靶。

第二，自相矛盾。即认为有悖于不对称作战这一台军秉承的核心理念，是“资源错配的昂贵玩具”。台湾防务预算有限，各军种争夺激烈，将如此巨额资金“押注”于区区百辆翻新坦克，挤压

了反舰导弹、防空系统、无人装备、网络电子战及后勤保障等更契合不对称作战理念的领域。这些年来，面对解放军碾压式的实力优势，台军转向重点进行不对称作战准备。2005 年新版“国防报告书”强调“持续加强不对称作战能力”，“置重点于‘远距、精准、机动、致命及人工智能（AI）’之不对称战力为优先建置项目”。M1A2T 的反对者指出，引进这种坦克是“二战思维”，在战争形态向无人化、智能化转变的今天，“早已不合时宜”。近年来，在俄乌冲突、阿以冲突等战争中更证明，在解放军拥有绝对制空权和远程火力优势的背景下，M1A2T 这种大型地面目标在卫星和无人机的监视下无所遁形。他们认为，战时台军 M1A2T 恐怕尚未接触到解放军登陆部队，就已经在集结地被解放军远程导弹、武装直升机摧毁；在正面对抗中，M1A2T 根本无法面对解放军蜂拥而至的廉价的自杀式无人机、巡飞弹、远程反坦克导弹打击。他们主张，与其花费重金采购 M1A2T，不如将更多资金投入反坦克导弹、无人机蜂群、地面防空系统更有效。还有人指出，购买 M1A2T 还有功能重叠、重复投资的问题。称台军“云豹”轮式装甲突击炮已足以应付被阻击火力削弱的登陆先头部队，将决战希望寄托在 M1A2T 坦克的“最后肉搏”，是一种过时的、一厢情愿的想法。

第三，保障“黑洞”。即认为 M1A2T 坦克需要极其复杂和昂贵的后勤装备供应链和基础设施支撑，势必成为台军财政和管理的噩梦。如 M1A2T 的 AGT1500 燃气涡轮发动机虽动力强劲，但油耗极高，公路百公里油耗高达 380 升，越野则升至 500 至 600 升，在李翔宙所言的极端情况下甚至接近 900 升，是妥妥的“油老虎”。这样的装备不仅会极大推高日常训练维持费用，挤压台军本

已紧张的燃油供应，战时对油料保障的要求更惊人。他们质问：面对解放军对台军燃料储存、生产、运输系统的高强度打击，如何确保 108 辆“油老虎”的油箱充盈？再者，燃气轮机的维修技术复杂，台军基层连队的维护水平是否能长期维持这种精密机器的妥善率令人怀疑；为了配套这 108 辆坦克，台军必须额外采购昂贵的 M88A2 装甲救济车等配套车辆，这些保障车辆同样面临重量过大、易受攻击的问题。此外，还要按照 M1A2T 的要求，对台军现有坦克库房、训练场、模拟器教室以及维修工厂等进行翻修和扩建，耗资又耗时；M1A2T 坦克训练周期更长，从接装到形成战斗力需要数年时间。考虑到两岸关系的紧张局势和可能的冲突窗口期，“远水救不了近火”的传统武器平台不应是优先选项。这将是一笔长期且巨大的隐性成本。

第四，“政治军购”。即对重金购买大而无用的 M1A2T 动机的质疑。这也是各方面批评火力的集中点位。认为这项军购案根本不是从台军作战的实际需要出发，而是为了向美国交保护费、迎合台军中保守势力。美军方从军事角度评估，也长期反对台军引进这种坦克。后突然转为支持，必定是受了美国军工利益集团政治运作的影响。108 辆 M1A2T 翻新坦克耗资 12.8 亿美元，单价 1185 万美元，远超美国常态外销新坦克价格，是美国为了平衡对台贸易、维护国内军工复合体利益的产物。蔡英文当局最后拍板引进 M1A2T 坦克的 2018 年 7 月，是特朗普第一次执政时期，民进党需要“联美谋独”，特朗普企图“以台制华”。时任台湾当局“国防部长”严德发，陆军出身，当过陆军司令、装甲学校校长，必定从陆军利益出发。这种“政治坦克”只有向民众展示“台美关系紧密”的效应，军事上既无法威慑对手，更无法改变战

场力量对比。

M1A2T 采购案支持者的四大辩解

面对质疑，台湾军方及支持采购的声音主要从装备升级换代、政治心理攻防、体系作战理念以及军种自身特点等方面为这一决策进行辩护。其辩护词明显避重就轻、自说自话、自欺欺人。

第一，他们称 M1A2T 是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的必然要求。强调 M1A2T 相较于台军现役老旧的 M60A3 和 CM-11、CM-12 等，“是全面的代际跨越”。其 120 毫米滑膛炮威力远超后者的 105 毫米线膛炮；先进的猎-歼火控系统、二代热成像仪大幅提升了首发命中率和全天候作战能力；强化后的复合装甲提供了更强的生存力。在关键的滩头反击或要地防守中，少量技术先进的 M1A2T 坦克可以形成“战力支点”，对解放军两栖装甲车辆和早期登陆的坦克形成质量优势，达成某种形式的“不对称”效果。

这种辩护词的问题在于，M1A2T 的反对派不是反对坦克部队装备更新，反对的是更新的装备。支持者脱离战场实际、为更新而更新的辩解、贬低解放军的新装备，属于逻辑上的偷换概念和掩耳盗铃。

第二，他们强调 M1A2T 的心理威慑和政治象征效应。认为台军装备 M1A2T 具有强烈的政治和心战意义。该坦克是美军现役坦克的衍生型号，入列台军意味着美台军事安全合作的程度深化，可以向大陆和地区国家展示美对台的安全承诺“坚如磐石”；M1A2T 虽贵，但是“地表最强战车”，可以对内提振士气，对外展示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

这种辩护词的问题在于，等于他们不打自招地承认了其动机不良。即不是为了打仗，而是为了政

治和想象中的心理威慑，尽管这种威慑效应根本被对手蔑视。

第三，他们认为 M1A2T 无需全岛机动、打遍全岛。这是针对反对派“桥梁承重论”而言的。称 M1A2T 战时将部署在适合其机动的预设的“红色滩头”后方的掩体中，作为“机动反击力量”，在敌方登陆初期、立足未稳时，从隐蔽处冲出进行决战。其机动范围是局部的且经过精确计算，并不需要通过所有桥梁的能力。况且台湾主要干道和战术要道的桥梁承载力已在提升，且 M1A2T 的履带接地面积大，单位压强并不像想象中那样会瞬间压垮。还特别强调，M1A2T 重量没有超过 70 吨，只有 66 吨。

这种辩护词的问题在于，一厢情愿设定战场状况和对手战法。一个简单的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你设定的承重桥、机动道路、隐蔽位置不会被早发现、早摧毁？

第四，他们宣称离开坦克无法收复“失地”。这是针对“对称作战武器论”提出的。称导弹和无人机等虽然能消耗对手，但无法“夺回”或“固守”阵地。如果解放军的登岛部队成功上岸，台军步兵仅靠反坦克导弹等很难把对方赶下海。只有具备强大防护力和火力的 M1A2T 才能进行“物理清除”终结登陆企图。他们强调，M1A2T 具备先进的数字化战场管理系统，可以依托体系抗击无人机、巡飞弹等打击；可以发射 M830A1 多用途破甲弹，不仅能打坦克，还能打击低空飞行的武装直升机和无人机；AGT1500 燃气轮机虽然耗油，但冷启动速度极快，加速性能优异，可以躲避远程火力覆盖，战场生存能力远高于现有的老旧坦克。

这种辩护词的问题在于，没有讲清楚台军 M1A2T 部队能否撑到滩岸决战阶段、采用“云豹”这样的轮式突击炮是否也能执行同样任务。没有

对比怎么会有可信的结论！

M1A2T 采购案实为“倚美谋独”的政治交易

一个 108 辆坦克的采购案，折射出的是台湾当局和台湾军队的一系列弊端，包括政治挂帅、“倚美谋独”、保守思维等等。台湾当局不惜巨资，强行推动此项争议巨大的军购，其动机深植于政治与体制土壤之中。巨额对美军购，本质是向美国支付的“保护费”，是维系美台准军事同盟关系、捆绑美国介入台海事务的重要纽带。购买 M1A2T 这样的大型进攻性装备，象征意义巨大，是美国军工复合体与台湾当局部分政治势力利益交换的体现。这笔生意不仅是军事交易，更是政治交易。同时，民进党当局为了“以武谋独”，需要心理慰藉与宣传工具。其不断制造“武备强大”的幻象，意在欺骗台湾民众，营造“有能力抗拒统一”的假象。将 M1A2T 包装成“地表最强战车”，属于“走夜路吹口哨”。李翔宙等对 M1A2T 的批评，绝非简单的“外行话”。它揭示了一个资深军事从业者对台湾防务资源错配、战略脱离实际、政治干预军事的忧虑。

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才是台海地区安全稳定的根本保障。坚持“九二共识”，维护一个中国原则，推动两岸融合发展，才是保障台湾同胞福祉和台海长治久安的唯一正道。任何企图“以武拒统”的举动，任何幻想用“地表最强”武器就能抗拒统一大势的想法，都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政治表演和劳民伤财的徒劳之举。真正的安全，来自于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国家的统一，而不是将台湾变成堆砌昂贵武器的火药库，这才是审视 M1A2T 采购案乃至所有台湾防务问题时应有的最高视角和历史智慧。

（作者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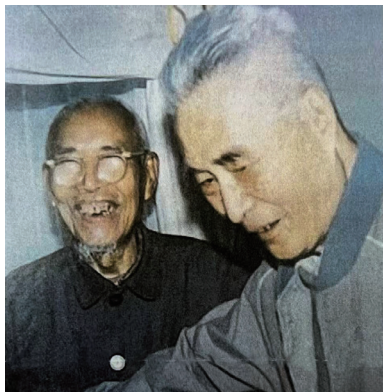
两岸黄埔同源 后代情系青田

□ 单补生

2026年5月18日至20日，应青田县台胞台属联谊会邀请，台湾黄埔军校同学后代联谊会会长丘智贤、黄埔1期黄维之女黄慧南、黄埔5期邱行湘之子邱晓辉等12位两岸黄埔后代齐聚青田，一同追寻先辈足迹，沉浸式感受黄埔袍泽“亲爱精诚”的深厚情谊与“爱国、革命”的家国情怀。

参访缘起

1984年6月16日，来自海内外数百名黄埔校友齐聚祖国首都北京，在人民大会堂共同纪念母校建校60周年，并见证黄埔军校同学会正式成立。他们精神焕发，畅叙友谊，展望未来。黄埔1期生、全国政协常委黄维当选为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黄埔2期生、江苏省政协常委邱行湘为会员。同年12月，《黄埔军校建校六十周年纪念册（1924—1984）》出版，当年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夫人、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序言中写道：“……历史和人民是公正的，谁为人民做了一点好



1987年4月，黄维探望吴泽民（左）。

事，历史都会给予公正的评说。即使后来离开了革命的一些人，他们在东征，北伐和抗日战争中建立的功勋，人民也不会忘记；他们当年为革命牺牲奋斗的精神，仍将为后人传颂。……我们希望海外黄埔同学都来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继续发扬黄埔精神，在推动第三次国共合作，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中，发挥骨干、带头、桥梁作用，为列祖列宗争光，为子孙后代造福。……我们还希望黄埔同学的子孙后代，能从纪念册中找到自己的‘根’，了解自己的先辈当年‘爱国家，爱百姓，不要钱，不要命’的高风亮节，知我

中华，爱我中华，在振兴中华的史页上续写新的光辉篇章。”

1987年4月，为准备赴台与黄埔校友交流，黄维与邱行湘结伴来到老长官陈诚的故里——浙江青田参观考察。彼时，陈诚已辞世20余年，黄维与邱行湘亦从当年的青年将校，变为年逾八旬的老者。在县领导陪同下，他们参观了高市陈诚故居、高市学校，看望了陈诚的亲属，并前往陈诚父亲陈式文的墓前拜祭。他们还参观了陈诚旧居石门山庄及静者居等。

时隔40年，他们的后代也来到青田，追寻先辈足迹。

陈诚故居展览

浙江省青田县全境多山，大部分为丘陵低山地貌，是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县。高市村位于青田县城西北部，坐落瓯江南岸与高市源汇合处，隔江北岸系330国道线，距县城25公里，离石门洞风景区1.5公里。高市村历史悠久，形成于明代，清代属十三都，民国

时期属高市乡，为乡公所驻地。1949年以后属高市乡（人民公社），为乡人民政府所在地。高市村由外村、底村两个行政村组成，两村以山坡为界。高市村虽地处偏僻却闻名遐迩，是因为出了个国民党军政要人陈诚的缘故。

陈诚故居位于高市乡外村养正街45号，1999年9月被列为青田县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该建筑由陈诚的祖父陈锦芝与五叔公陈一鹏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合建，为五开间带夹屋的四合院式二层木结构建筑，具有鲜明的清代建筑风格。故居占地面积约1080平方米，门前立有光绪年间所设的旗杆石一对，门台为砖砌牌楼式，门额上书“颍川旧家”四字。1932年，为改善母亲的居住条件，陈诚在西厢北侧增建了一座三开间二层砖木结构的西洋风格小洋房。自保定军校毕业后，陈诚仅于1924年5月父亲病故时、1932年1月与谭祥新婚之际、以及1937年3月三次回乡探亲。

1950年初，大陆进行土地改革，这座老宅除保留陈一鹏的孙子陈祖略、陈祖荫两户外，其余部分被分给本村15户农民居住。1986年6月，为落实对去台上层人士的相关政策，浙



/ 1987年4月，黄维（左二）、邱行湘（左三）拜祭陈式文墓。

江省政府决定将陈诚故居等三处房产的所有权归还其在台湾的亲属，并拨款30万元作为清退补偿与修缮资金。

1987年4月，陈诚旧部黄维、邱行湘前往青田。在参观陈诚故居时，他们看到老长官陈诚虽曾身居高位，却从未在家乡大兴土木、修建豪宅大院。黄维不禁感慨道：“辞公（指陈诚）生活俭朴、为官清廉，这是历史事实啊！”

故居内有图文展板与实物展品，系统展示陈诚生平事迹。陈诚出生地右厢房及书房等原状呈现。关于展陈史料的来源，青田台联会会长陈海民介绍说：2010年8月，县里委派他带队首次赴台湾进行文化交流，在

陈诚长子陈履安的陪同下，他们找到了大量关于陈诚的珍贵史料。这不仅使故居的展陈内容更加丰富翔实，也为专家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便利。

故居中每一件泛黄的档案、旧照、手稿，都是过往历史的生动再现，富有浓郁的时代特色，令人印象深刻。

陈诚，字辞修，别号石叟，1898年1月4日出生于高市外村。其先祖系河南颍川郡人，明嘉靖年间（1522—1566）迁居青田。父亲陈应麟，字式文，1924年5月病故。母亲洪氏，青田船寮滩头人，1953年卒于台北。

陈诚自保定军校第8期炮科毕业后，曾任黄埔军校教官、校务委员、分校主任等职。抗

战时期，他参与指挥淞沪会战（当时黄维任18军67师师长，邱行湘任18军67师201旅副旅长），督理武汉防务，坐镇陪都门户，并在昆明策定远征方案。后历任军政部长、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东北行辕主任等职。

1948年5月，陈诚因胃病复发，加之主持东北战局失利等原因，辞去参谋总长及本兼各职。6月入住上海国防医学院。10月，经蒋介石批准，赴台湾草山疗养。

1948年12月29日，陈诚接到蒋介石紧急电令，接替魏道明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由此复出，开启了长达十余年治理台湾的历程。在此期间，陈诚兼任的主要职位包括：台湾警备司令、行政管理机构负责人、台湾当局副领导人、国民党副总裁等。1965年3月5日，陈诚在台北病逝，享年67岁。

陈诚到台湾后，坚持民族大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台独”，坚决反对搞“两个中国”。对于任何妄想改变“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事实的图谋，陈诚都予以拒绝，不留任何余地。

1949年春，美国方面曾派密使到台，想以每年拨付经济



/ 陈海民（左一）、邱晓辉（左二）、丘智贤（右一）、黄惠南（右二）在陈诚故居合影。

援助等条件，换取台湾自立自治，为时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所拒绝。

1961年6月，陈诚主持“阳明山会议”，在《总结》中谴责了“现在国际间酝酿‘两个中国’的阴谋”，并郑重表示：“决不会接受这种解决的办法”。

1961年8月，美国邀请陈诚访美，企图在“是否从金门、马祖撤退”一事上离间其与蒋氏父子的关系，实现搞“两个中国”的目的，陈诚没有就范。为了讨好陈诚，在这次访问时，美国还主动让陈诚看1955年以来中美大使级谈判的记录，事后陈诚对人说：“中共拒绝美国

一切建议，而坚持美舰队及武装力量退出台湾的作法，不受奸诈，不图近利，是泱泱大国风度。”

在这次“访问”中，经过努力，陈诚成功阻止美国给“台独”首领廖文毅发放签证，并终获美国政府永远搁置“两个中国”计划的口头承诺，维护了民族的利益。

《党史博览》2008年第12期窦应泰所著《周恩来和陈诚的黄埔情》提到，1965年，周恩来前往上海迎接从海外归来的李宗仁时，在虹桥机场候机厅休息室里，面对陈毅、叶剑英以及上海市市委的陈丕显、曹

获秋和一些著名民主人士，讲到了几个月前在台湾病逝的陈诚。周恩来动情地说：“陈辞修是爱国的人，他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可惜他身体不好。”周恩来的一句“陈辞修是爱国的人”，为他们的黄埔情作出了圆满的注解。

1996年、2007年、2017年、2019年陈诚长子陈履安多次返乡祭祖。陈诚故居逐渐成为两岸同胞追思先贤，共话乡情的文化场所。

高市乡中心学校

青田县高市乡中心学校位于高市乡高市村，坐落于秀丽的瓯江之畔，毗邻石门洞风景区，学校前身为养正小学堂，由清贡生陈一鹏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创办，秉承“童蒙养正，少年养志”理念，恪守“养浩然之气，正做人之本”校训，是青田县百年乡校之一。

1908年，陈诚的五叔公陈一鹏正式创办高市“养正小学堂”。陈诚9岁入堂学习，毕业后考入丽水省立第十一中学。

1931年，陈诚捐赠一万银元，买地12亩，用于兴建高市小学，建造了一座三层教学楼和宿舍楼，同时在学校旁修建了一幢自住别墅“陈诚公馆”。



/ 1987年4月，黄维、邱行湘一行参观高市乡中心学校。

1934年，陈诚捐赠款物，为学校修筑堤坝、建造操场，并赠《小学生文库》一套。

1940年，陈诚将其自住别墅捐给学校作为办公室。

1956年，政府拨款将学校改建为青田第二中学。

1974年，因高中部迁至船寮，学校正式更名为高市乡中心学校。

1987年4月，陈诚旧部黄维、邱行湘参观高市乡中心学校。

1996年，陈诚长子陈履安返乡祭祖之际，专程到高市乡中心学校捐款12万元人民币，设立师生奖教奖学金。

2010年9月27日，台北县辞修中学与高市乡中心学校结

为友好学校，并捐赠陈诚半身铜像一座。学校现占地12亩，建筑面积4215平方米，绿化率达35%以上。

2012年，高市乡中心学校人员应邀赴台湾新北市私立辞修高级中学学习考察。

2015年，陈诚长子陈履安应邀回乡参加世界青田人大会，其间专程前往高市乡中心学校慰问师生。

综上所述，陈诚家族与高市乡校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充分体现了其家族对家乡人民及教育事业的赤子之心与桑梓之情，情牵陈家三代，百年不止。

校史展室中，有一张1987年4月黄维、邱行湘来校参观

的照片，两人边走边聊，兴致很高。这张照片令黄埔后代们驻足细品，引发无限遐想，纷纷在照片前留影，使追寻父辈足迹又多了一层更加深刻的意义。

黄镇村陈诚祖墓

黄镇村（亦称黄镇古村），距高市乡陈诚故居5公里，距县城37公里，区域面积3.2平方公里，不仅是浙南乡土古村的鲜活遗存，更是陈诚故里文化集群的重要延伸。

该村坐拥“三面环山，一面临江”的绝佳生态，村口百年古树浓荫蔽日，村内28幢清末至民国的夯土木结构老屋错落有致，卵石铺就的古道串联起小桥、池塘与农家院落，完整保留着青田山区传统民居的质朴风貌。山上留存着陈诚父亲陈式文的墓葬。墓葬为牌坊式，当年按照本地习俗建造，坐西朝东，依山而建，气势庄重。门台、栏杆、纸炉等雕刻细腻，尽显古人匠心。配套设施，用温州青石和本地花岗岩砌成，非常壮观。

陈诚的父亲陈式文是晚清贡生，毕业于浙江省立师范学校，曾任青田县教育科科长及县立高等小学校校长等职，为



/ 2026年5月19日，黄惠南（右）、邱晓辉（左）参观高市乡中心学校。

人端方谨严，热心教育。陈诚回忆：“1924年5月，余任黄埔军校上尉特别官佐，正在军校群力支撑，备极艰难之际，先父在浙以病闻。余虽亟思归省，囊中不名一文，无法筹措路费。告贷于人，生平未曾尝试，未能成行。立三（严重，别号立三，湖北麻城人，保定军校5期工科毕业。时任黄埔军校中校战术教官）知之，借余百金。始星夜就道。途次闻耗，先父已溘然长逝，未能亲奉汤药，敬承遗训，抱恨终身。”陈诚在料理父亲后事时，特地请严重写了“陈式文先生之墓”几个字，镌刻于墓碑之上。

1986年前后，省、县政府曾先后两次出资对陈式文墓进行修缮。

1987年的青田，交通远不如今日便利。仅以拜祭陈式文之墓一事而言，就需从陈诚故居先乘小船，再步行10华里山路才能抵达黄镇村。彼时，黄维已83岁，邱行湘80岁，两位老人虽年事已高，却精神矍铄，拄着手杖上山，最终在墓前鞠躬致敬，了却了一桩心愿。

寻根溯源，认祖归宗，慎终追远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两岸开放交流之后，1996年，陈诚长子陈履安回到大陆祭祖，拜谒陈氏祖墓。对陈家的后人

而言，故乡终于从照片中的影像，变成了可以亲手触摸的现实——这本身，就是一个时代进步的注脚。

如今通往墓地的山道已拓宽，并铺上了柏油路，可乘中巴车直达黄镇村。为重温当年先辈们沿着山道而行、前往陈式文墓前拜祭的情景，黄埔后代们手持鲜花，在墓前肃立默哀，鞠躬致敬，随后将鲜花轻轻摆放在墓座上，然后缓缓离去。

陈诚旧居石门山庄

石门山庄，坐落于青田县城西北 30 公里的瓯江南岸石门洞风景区。自南北朝（公元 423 年）永嘉太守谢灵运发现石门洞以来，已有 1600 多年的历史，素有“世外桃源，洞天仙境”的美誉，为道教三十六洞天之一。唐代李白曾到访此地，并作《石门留题诗》：“何年霹雳惊，云散苍崖裂；直上泻银河，万古流不竭。”

石门洞紧邻大溪，两座山峰如刀削般对峙而立，形似大门，因此得名“石门”。进入洞中左转，沿着一条小涧深入百余步，便可望见千仞高的飞瀑。瀑布随风飘洒，像一匹白色的绸缎垂挂天地之间，无论冬夏，从未干涸。瀑布下方有一块形



/ 2026 年 5 月 19 日，黄惠南（左）、邱晓辉（右）拜祭陈式文墓。

如圆球的巨石，水流击打在上面，激起漫天水花，宛如散落的珍珠碎玉，汇聚成一口深潭。洞内幽深开阔，足以容纳千余人。洞穴右侧建有一座寺庙，周围有数十亩梯田，可以耕种。明朝诚意伯刘基（刘伯温）曾在这里读书。此地离陈诚故居高市乡，只有大约 3 里路。陈诚童年时常在瀑布下玩耍，每每流连忘返。听长辈们讲述刘伯

温辅佐明太祖朱元璋驱逐鞑虏、光复华夏的故事，内心充满敬仰与向往。有感于此，又因青田盛产美石，陈诚遂取“石叟”为号。

石门山庄，原名“亦桃源”。山庄为一幢三间平房，前后带花园，系民国时期青田县县长郑迈（浙江乐清人）于 1935 年为方便陈诚回乡度假而建。建成后，陈诚曾于 1937 年 3 月回乡

游览石门洞时，前来察看并在此休憩。1987年4月，黄维、邱行湘曾来此参观。如今，山庄经修缮后辟为历史名人题咏的展示场所。陈诚长子陈履安2010年10月回乡探亲时在此寻访父亲旧踪，他感慨万千，情不自禁挥毫写下“顽石点头”四个大字，这一题字寄托了陈履安对家乡的思念之情，以及对当地政府热情款待的感激之意。如今黄埔后代追寻至此，观赏“顽石点头”字画之时，亦感慨颇多。

陈诚旧宅静者居

静者居坐落于青田鹤城镇新寺巷20号，坐东朝西，虽常被称为陈诚旧宅，但实则是其原配夫人吴舜莲的寓所。吴舜莲（1896—1978），出生于浙江省北山区鹤云乡乌云村，系陈诚师范同学吴子漪胞妹。1920年与陈诚成婚，婚后资助陈诚求学，并照料其父母。1931年，陈诚与吴舜莲离婚。1932年1月1日，经宋美龄介绍，陈诚在上海与谭延闿女儿谭祥结婚。

1942年，陈诚为其原配夫人吴舜莲修建了这处宅院。建筑为砖木结构，占地面积307平方米，由天井北侧门台、主宅及



/ 2026年5月20日，黄维之女黄惠南（右）与吴泽民之子吴靖年（左）于静者居合影。

后厢房共同组成。主楼面阔三间，通面阔11.15米，进深10.17米，采用四庑顶形制，前后上下均设有檐廊，屋面铺设小青瓦，墙面为青砖勾缝，整体风格素雅。厢房与主楼之间设有楼梯，厢房面阔二间、高二层，为硬山顶结构。整座宅院体现了民

国时期小洋房的建筑风格，前后配有花园，布局小巧而精致。大门上方门额刻有“静者居”三字，为陈诚特请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题写，寓意居住者能够远离尘嚣，在此静心度日，安享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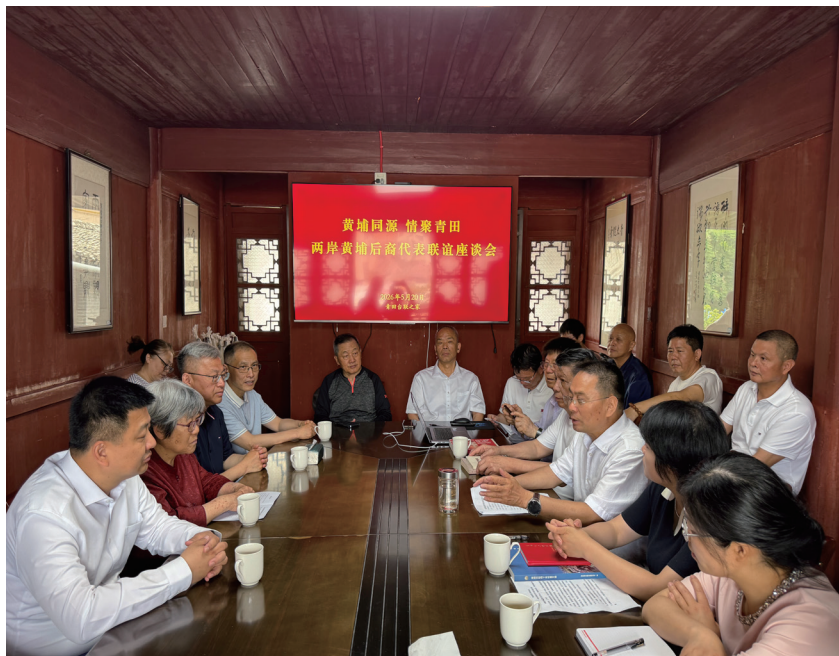
吴舜莲在此居住数年后，

于1949年赴台，寓居三哥吴子漪家中。陈诚去世后，由其妻谭祥负责照料吴舜莲。吴舜莲终身未再婚。1950年以后，静者居曾作为城区卫生所使用，如今又成为县台联会的办公场所。这似乎是一种宿命般的安排——建房者与居住者最终都去了台湾，使这所房子与台湾结下了不解之缘。

座谈会上叙情缘

20日上午，座谈会在台联会（静者居）召开，首先由陈海民会长介绍了青台两地交流概况及青田籍黄埔军校师生相关史料。台湾黄埔军校同学后代联谊会会长丘智贤率先发言，他谈及此行重逢多位旧识，追忆两岸黄埔先辈同心御侮、捍卫民族尊严的峥嵘岁月。他表示，黄埔精神是跨越海峡的精神纽带，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与家国担当。亲临青田，真切感受到侨乡浓厚的家国情怀与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血脉联结，深刻体会到两岸同胞割不断的骨肉亲情。他期盼两岸黄埔后代持续搭建交流桥梁，传承先辈爱国精神，推动两岸青年深化往来，让黄埔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

青田吴泽民之子吴靖年发



/ 座谈会现场。

言：“当年淞沪抗战中，在第15集团军（左翼军）总司令陈诚的指挥下，黄维师长率18军67师官兵在罗店与日军浴血奋战，伤亡惨重，史称‘血肉磨坊’，先后补充兵员五次之多。我父亲吴泽民时任18军67师军医处长、军医院院长及卫生队队长，亲临战场负责抢救67师伤员工作，经军医院包扎后转送后方医院的伤兵达万余名。黄维将军性格刚毅，为人耿直，关怀伤员如子弟，与我父亲情投意合，两人在战地时常一同商讨抗日救亡形势，我父亲的观点深受黄师长赞赏，二人遂成挚友，情同手足。1987年4月，

黄维将军在青田参访期间，得知我父亲健在，非常兴奋，随即由县政协领导陪同，前往城镇东门的家中探望。两人自淞沪战场一别，已有51年未曾谋面。重逢之际，万分激动，紧紧相拥，笑容满面，互致问候不断。摄影师定格下了这一令人动容的历史瞬间。”吴靖年举着照片动情地向大家说：“这张黄维将军和我父亲的合影，非常珍贵。父辈重逢时隔51年，我们后代时隔40年才初次见面相识，所以我特意请黄维女儿黄惠南一同合影，父辈的友情，要代代相传下去。”

吴泽民（1902—1992），原

名玉村，字瑾，青田湖云村人。其父吴景龄为陈诚原配夫人吴舜莲的二哥。1920年，考入处州（今丽水）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1924年，考入浙江省立医药专门学校。1928年7月，经陈诚介绍，赴汉口国民革命军第4集团军后方医院工作，任上尉军医。1931年，任第14师军医处少校军医，后任18军副官处少校军医。次年10月，任第11师中校军医，第67师中校军医处长兼军医院院长。1937年，参加淞沪会战，负责战时伤员的抢救与转运工作。次年，任第67师军医处上校处长。1940年，任第86军军医处少将处长。1943年6月，因其父吴景龄病危，遂请长假回乡，开业行医，为百姓治病。1952年，任青田县人民医院医疗股股长、主治医师。1983年退休。吴泽民于1946年任青田县参议会参议员。1949年被推选为青田县各界人民代表。1962年起任青田县第五届、第六届人大代表。1981年至1986年任人民政协青田县委员会第一届、第二届副主席。1992年12月24日，在青田县鹤城镇逝世，享年91岁。著有《医案选录》《九十自述》等。



/ 两岸黄埔后代合影。

黄慧南、邱晓辉等交流团成员相继结合父辈抗战事迹分享心得。他们谈到，黄埔先辈无论身在何方，始终心怀家国、坚守民族大义，这份赤诚是留给后人最珍贵的精神财富。青田作为著名侨乡，广大侨胞跨越山海、心系故土、报效桑梓的情怀，与黄埔精神爱国爱乡的核心内涵高度契合。希望两岸黄埔后代铭记先辈嘱托，以史为鉴、珍惜亲情，常来常往、深化交流，消解隔阂、增进互信，共同守护两岸和平。

座谈会现场气氛热烈，情谊真挚。活动尾声，交流团全体成员向县台联会致以衷心感谢，陈会长起身鞠躬答谢，座谈会在欢声笑语中圆满结束。

交流团在青田期间，还参观了青田华侨历史陈列馆、侨乡进口商品城、青田石雕博物馆、洞天福地石门洞、浙南油茶博物馆、船寮台联之家、青田托尔摩卡咖啡体验馆、青田台联之家展陈馆等场所，两岸黄埔后代共同见证青田发展成就，追溯黄埔情缘，畅叙两岸一家亲。

参考资料：

1. 何智霖编《陈诚先生回忆录——六十自述》，2016年。
2. 黄济人著《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中国青年出版社，2021年。
3. 青田县台胞台属联谊会编《青田台联四十年纪事文选》，2025年。

中美传统友谊历久弥新

——一床美军军毯的故事

□ 耿嘉陵

马年新春，一封书信跨越重洋，抵达美国艾奥瓦州。2026年2月16日，习近平主席复信艾奥瓦州友人并回赠新春贺卡，致以节日祝福。习近平主席在复信中再次强调：“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基础在民间，未来在青年，活力在地方。”字里行间，饱含着对中美民间友好的深切珍视，寄托着对两国关系未来的美好期许。连续三年新春之际，习近平主席向美国友好人士传递问候、送上祝福，为中美人民友好续写新篇，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岁月流转，一段跨越两个世纪的友谊历久弥坚。2023年10月30日上午，纪念美国第14航空队援华抗战80周年活动在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隆重举行。美国飞虎队老兵莫耶、麦克马伦，飞虎队老兵后代及中美各界友好人士近百人齐聚一堂，共同回望那段中美两国并肩战斗的烽火岁月。

抗日战争时期，美国飞虎



/ 本文作者与史迪威外孙约翰·伊斯特布鲁克合影于广州。

队冒险开辟驼峰航线，为支援中国人民抗战立下不朽功勋。飞虎队员驾驶战机翱翔长空，与中国军民携手抗击日本侵略者，在中国领空上演了一场场与日军的殊死搏斗。驼峰航线途经高山雪峰、冰川峡谷、热带丛林与日军占领区，气候恶劣、险情环生，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撞山坠毁与日军袭击的威

胁。这条航线，是世界战争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牺牲最惨重的空运通道。据史料记载，抗战期间，500多架飞机在此坠毁或被击落，486个美军机组、46个中国机组壮烈牺牲，1800多名飞行机组人员失踪。时至今日，梅里雪山、高黎贡山的原始森林中，仍有飞机残骸静静沉睡，中美英烈长



/ 耿荫龙捐赠美军毛毯。

眠于世界屋脊的雪山之巅，他们用生命铸就了和平的丰碑。

我的父亲耿荫龙（中央军校16期2总队辎科），抗战时期在中缅印战区出生入死，曾三次奉命飞越驼峰航线。1942年7月，盟军为反攻缅甸，加紧对中国远征军的支援与训练，父亲被派往印度兰姆伽基地学习、受训，后负责训练坦克兵、汽车兵，组建战车营。父亲曾回忆，因日军入侵切断滇缅公路，他搭乘美军飞虎队的军用运输机前往印度，这是他第二次飞越喜马拉雅山脉。飞行员告诉他，这条航线几乎天天发生空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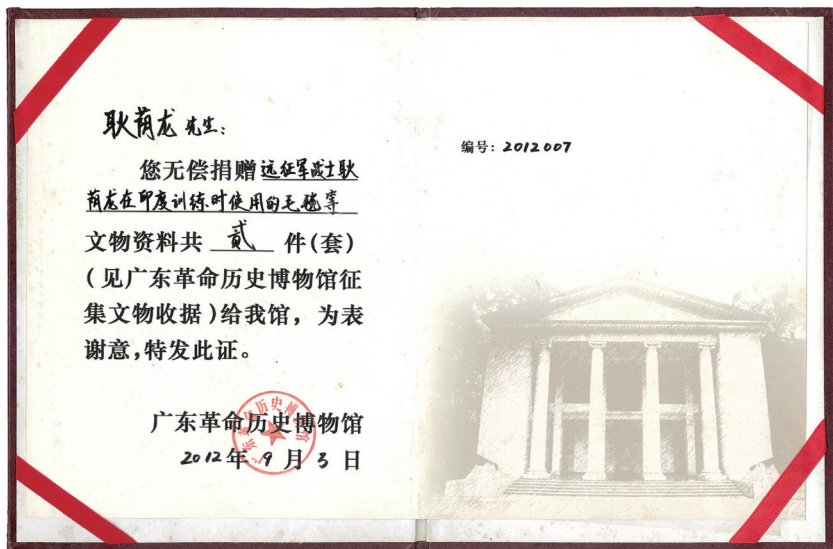
晴空之下，峡谷中坠落的飞机残骸清晰可见，而无需导航设备便能辨明方位。父亲讲，他曾先后三次飞越驼峰航线，第一次坐飞机觉得什么都新奇，不害怕。而后两次从升空开始就伴随着紧张，直到飞机落地悬着的心才放下来。父亲的话语，道尽了那段航程的惊心动魄。当时，数以万计的中国青年学生与士兵，正是通过驼峰航线被空运至印度兰姆伽基地接受训练，成为反攻缅北收复失地的中坚力量。

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作战失利后，日军侵占缅甸全境与滇西，滇缅公路中断，同盟国援华军用物资滞留印度加尔各答港，仅靠空运杯水车薪，无法

保证国内抗战急需，打通缅北中印公路刻不容缓。为此，国民政府军委会决定从中国远征军中选调一批有英语基础、且通晓汽车运输与修理的军官组成助教队，父亲便是其中一员。他们先接受美军总教官的培训，内容有坦克驾驶、射击作战、通信联络、车辆驾驶维护等技能操作，然后再去训练一批批的坦克兵、汽车兵。当时国民政府后方广泛招募青年学生入伍，借助驼峰航线货运飞机返程运力，从昆明每日空运450至600名士兵赴印，数月间便将32000余名学生兵送达印度兰姆伽基地。这批士兵受训结业后大多参加了之后的缅北战役及滇西反攻。父亲说，在兰姆



/ 耿荫龙捐赠的美军毛毯在展馆中陈列。



/ 耿荫龙的捐赠证书。

伽基地学习、受训、执教的一年多期间，中美两军教官肩并肩一起完成教、训任务，并且同吃同住享受同等待遇，发放的全是美式被服。父亲一直保留的一床印有英文字母的美军军毯，正是这段中美并肩抗战的珍贵历史见证。

这床军毯伴随父亲南征北战数十载，虽历经岁月磨损已很陈旧，但仍被父亲视若珍宝。2012年8月，98岁高龄的父亲亲手将这床美军军毯捐赠给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让这段历史永久珍藏、代代相传。

2023年9月12日，习近平主席复信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格林和飞虎队老兵莫耶、

麦克马伦时强调：“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需要新时期飞虎队员的参与和支持，希望飞虎队精神能够在两国人民之间一代一代传承下去。”80年风雨兼程，这段跨越大洋、穿越时空的“飞虎情谊”，虽历经岁月洗礼，仍历久弥新。

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复信费城交响乐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思艺，勉励费城交响乐团和包括中美在内的世界各国艺术家一道，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密切交流合作，促进艺术繁荣，为中美人文交流和各国人民友好再续新篇。1973年，费城交响乐团开启了中美文化交流的“破冰之

旅”，在音乐会上演奏了钢琴协奏曲《黄河》，奏响了中美人文交流新的乐章。50多年来，乐团作为活跃在中美两国间的文化使者，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习近平主席的复信引发中美艺术家及两国各界友好人士的热烈共鸣。大家纷纷表示，锦书云中来，尺牍传深情。复信充分体现了习近平主席对深化中美两国人文交流的高度重视，他们愿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为中美文化交流和民心相通贡献力量。

近年来，从“鼓岭之友”故地重游，到第八届中美友城大会成功举办；从美国飞虎队老兵及后代来华参访，到费城交响乐团纪念演出，一系列蓬勃开展的民间交流交往活动，为中美关系行稳致远注入持久动力，也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了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一纸书信，彰显大国领袖风范，传递民心温情；一床军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承载战争记忆。从抗战岁月的守望相助，到新时代的民间交融。这份由人民书写、由青春传承、由地方活力滋养的中美传统友谊，照亮中美关系的未来之路。这份友谊终将跨越山海，代代相传。

黄埔四期生刘志丹的传奇故事

□ 刘永昌

刘志丹，1903年10月4日出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原名刘景桂，乳名来生，字子丹，后为革命明志，取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之意，改名“志丹”。刘志丹毕业于黄埔4期步兵科、炮兵科，历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委主席、陕北特委军委书记、红26军42师师长及参谋长、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红15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28军军长、北路军总指挥等职，领导过渭华起义、陕甘三次反“围剿”、东征抗日等战役。

读书报国 投笔从戎

刘志丹小时候在爷爷和父亲的教导下熟读四书五经，在永宁山小学接触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了解到国家的贫弱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掠夺，从此他发奋读书，准备报效国家。1922年，刘志丹考入榆林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深受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潮影响，在榆林中学组织学生进行反对军阀井



册子 桂景刘
西 陕 二十二年
轉局郵縣安保西陝 信通

/ 刘志丹黄埔军校毕业照。

岳秀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游行示威活动。后来，他投笔从戎。1925年7月经党组织推荐，到广州参加黄埔军校入伍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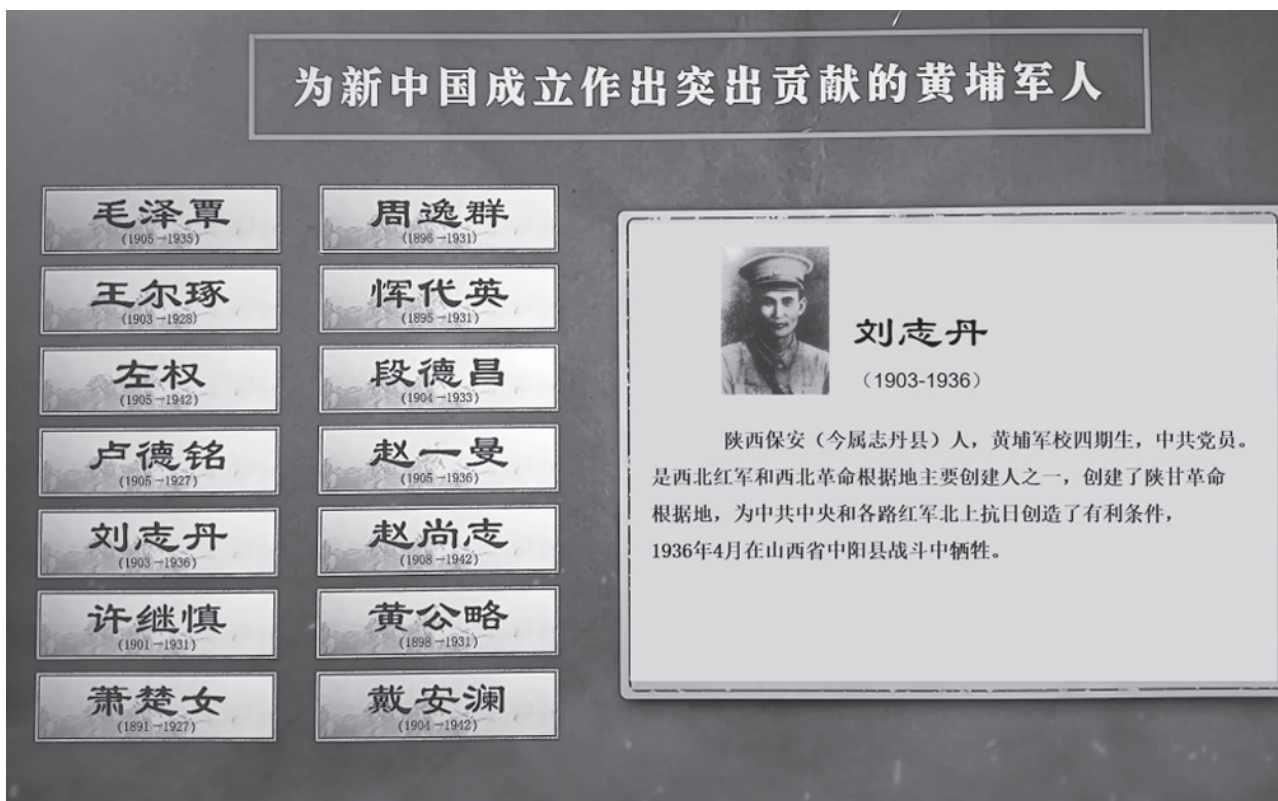
黄埔历练 北伐立功

1926年3月1日，因革命形势需要，黄埔军校由“陆军军官学校”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刘志丹被编入第4期步兵科1团2连，后又转入炮兵科学习。刘志丹非常珍惜这

次学习机会，他发奋研习现代军事和政治科目，并结识了对他有深远影响、后来成为革命同志的教官和同学，如第4期步科第1团第7连连长、黄埔1期留校生陈赓，第4期步科第2团第6连连长、第1期毕业生关麟征（陕西户县人，后来成为著名抗战将领），还有第1期毕业生唐澍（1928年5月与刘志丹、第1期毕业生王泰吉等领导了渭华起义，在战斗中牺牲）。刘志丹经常向他们请教军事和政治问题。

据陈赓回忆，刘志丹有三个特点：一是行动快，二是非常勤奋好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爱圪蹴（gejiu），就是蹲着，这是陕北人的特点。刘志丹积极与4期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林彪、伍中豪、王世英、陈毅安、霍步青、陆更夫一起参加党组织举行的各项活动，聆听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和教职员中的共产党员熊雄、恽代英、聂荣臻、王懋廷等人讲课。

1926年7月9日，刘志丹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较



/ 刘志丹在黄埔军校旧址展厅的图片。

场举行的北伐誓师大会,参加北伐。当东路军已经打到江西吉安时,他接到党组织派他和王尚德、唐澍等10多名军校师生返回广州,到冯玉祥国民联军中从事军政工作的命令。由于刘志丹在黄埔军校学习和随东路军北伐表现突出,不仅赢得了师生的赞誉,也引起了校长蒋介石的注意。临行前,蒋介石特意单独召见他,并破格发放了700块大洋作为路费。面对这笔巨额馈赠,刘志丹并未迷失方向,将其大部分转交党组织,用作

革命经费,只留下维持行程基本所需的盘缠。

刘志丹到冯玉祥国民军联军总部先任组织科长,后又被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派到第4路军马鸿逵部担任党代表兼政治处长,为该部训练整肃部队,得到了各级军官和士兵的拥戴。1926年春,军阀刘镇华率部围攻西安,冯玉祥派兵援陕,刘志丹率部从甘肃赶来解围西安。

1926年11月28日,西安解围,刘志丹被任命为国民联军总部特使和党代表,晋升少

将军衔。1927年春,他任教于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并去河南收编军阀刘镇华部,壮大了革命力量。

“三色”建军“狡兔三窟”

1928年,刘志丹在渭华发动起义,起义失败后,奉命在陕北、陕甘边开展兵运工作,组织革命武装。

在创建和壮大西北红军的过程中,刘志丹提出了红色(发动革命群众,建立党所独立领导的红军和游击队)、白色(派



/ 刘志丹的刻有“抗日救国”字样的配枪，现存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共产党员到国民党军中开展兵运工作，感化对方，使他们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成为自己的武装）、灰色（争取和改造地方民间武装，使其成为革命武装）三色建军方式，使西北红军和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

1933年11月3日，中共陕甘边特委、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在包家寨子召开联席会议。刘志丹提出了采取“狡兔三窟”的军事战略，就是在安定、南梁、照金成立第一、第二、第三路游击总指挥部，分别在陕北、陇东、关中开辟三路游击区，建立游击队、赤卫军，配合红26军主力开展游击战、运

动战，以有效打击敌军，发展壮大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后来，毛泽东十分赞赏刘志丹的这种能够在陕甘地区“创出局面”的好办法。

指挥有方 战功卓著

凭借在黄埔军校的学习经历和参加北伐的作战经验，刘志丹练就了较强的军事指挥能力，在反“围剿”战役中，刘志丹率领陕甘红军游击队以一敌十，采取围点打援、攻其不备、声东击西、各个击破等战法，最终取得了胜利。

特别是从1934年2月至5月，刘志丹率领红军和游击队

以劣势兵力取得了西华池九战九捷的战果，并粉碎了国民党陕甘当局对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的数团万余兵力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1935年5月至7月，刘志丹率西北红军主力，解放6座县城，粉碎了国民党陕甘宁晋4省对西北根据地发动的5万兵力第二次“围剿”，使陕甘边、陕北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

1935年7月—9月，蒋介石亲调中央军、东北军和陕、甘、宁、晋、绥5省共13个师5个旅10余万人对陕甘苏区开展第三次“围剿”。红25军到达陕北后与西北红军（红26军、红27军）组成红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面对十倍强敌压境，新组建的红15军团生死攸关。刘志丹凭借“活地图”的优势，结合劳山险要地形提出了“围城打援”的战术构想。徐海东对此给予毫无保留的信任与支持，两人密切配合，最终成功指挥了著名的劳山战役。此战一举全歼国民党东北军2个团及1个师直属队，毙伤敌师长以下1000余人，俘敌团长以下3700余人。这次战役是红15军团成立后的首战大捷，它



/ 刘志丹黄埔 4 期毕业时获赠的中正剑。

不仅沉重打击了敌军主力、彻底扭转了陕北苏区的危急局势，还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剿”。这场胜利极大地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为不久后经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落脚点。

东征抗日 丰碑永存

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不久，决定东征山西。1935 年 12 月，刘志丹受毛泽东、彭德怀派遣，考察黄河沿岸地形和敌情，并绘地图，为红军东征抗日作战前准备。1936 年 2 月，由红 1 军团、红 15 军团和红 28 军组成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

先锋军，分南、中、北 3 路渡河东征。北路军总指挥红 28 军军长刘志丹担任侧翼攻击任务，渡河后直插晋西北地区，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迅速打通走向抗日前线的道路创造了条件。4 月 14 日，刘志丹在山西中阳县指挥三交镇战斗中牺牲。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他领导过的红 15 军团（红 25 军、红 26 军、红 27 军组成）和红 28 军被改编为八路军主力奔赴前线，为抗战全面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刘志丹是黄埔 4 期陕西籍军官中军衔最高的中共将领，与毛泽覃、恽代英、戴安澜等被评为新中国做出突出贡献的

黄埔军人。在民间，刘志丹与陈赓、关麟征、林彪等被称为黄埔“一百零八将”。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央军委以上过知名军校、任过重要军职、指挥重要战役为评定标准，先后评出 36 位军事家。1996 年，刘志丹被中央军委正式评为军事家，2009 年被评为“双百人物”。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称赞刘志丹为“现代侠盗罗宾汉”，称他是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

（作者为陕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会员，陕西省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刘志丹研究委员会副会长，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副教授）

从黄埔讲台到雪峰山密林

——湖南共产党员谢锦涛的抗战人生

□ 姚江鸿

谢锦涛是湖南武冈本土成长的杰出革命人士、黄埔二分校优秀教官。他深受家乡崇文重教的人文底蕴与近代革命思潮熏陶，自幼心怀家国、追求进步。抗战期间，黄埔二分校迁址武冈办学，坚持战时育人、为国育才。心怀救国理想的谢锦涛顺势投身革命教育，出任黄埔二分校政治教官、副大队长。任职期间，他坚守战时育人阵地，深耕军校政治教育与学员管理，以革命思想培育爱国军政人才。同时，他积极参与抗日实践，联络军校进步师生与地方爱国力量，秘密发展抗日武装，动员进步官兵投身抗战，在烽火之中传承黄埔革命薪火，用短暂的一生为战时军政人才培养和湘西南抗日救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弃文从武，急寻救国良方

谢锦涛，字梦奇，1913年6月出生于武冈县窑背渡谢家院子（今属洞口县黄桥乡乔江村）。他从小就很聪明，悟性很高，8岁开蒙读书，11岁步行



/ 谢锦涛。

100多里到武冈县城考取联合小学，13岁前往长沙大雅中学读初中。在初级中学就读两年后，因父亲逝世而家庭经济每况愈下，只能靠母亲纺纱织布挣钱来解决学费，不久便失学回家。此时正值湖南地区大革命兴起，一路的成长经历使得谢锦涛深刻认识到：革命是改造中国的唯一手段。

1931年，18岁的谢锦涛考入了北京大学。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一切百废待举，他认为要改变中国贫弱的局面，必须大力发展经济，所以主修了经济学专业，力图发展经济，

走“实业救国”的道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谢锦涛深受“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湖湘文化影响，毅然决定弃文从武，投笔从戎，考入了当时尚在筹备中的国民党中央陆军通信兵学校，主要学习电讯通信技术，在他的志愿书上写着：“学习军事，毕生服务军界”。在军校期间，谢锦涛学习认真，努力掌握各种专业知识，成绩优异，尤其擅长于军事通讯技术，军校对他考核的评语为“娴熟通讯技术”。

1934年9月，从通信兵学校毕业后，谢锦涛被分配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担任报务员。抗战爆发后不久，国民党主要机关迁至武汉，谢锦涛任职于军委会政治部。武汉会战前，国民党部分党政机关相继后撤，一些军事机关撤至邵阳，谢锦涛也随之被分配到邵阳师管区政治部，任科长，授少校衔。

1935年，谢锦涛同妻子孙美芳去桂林旅行结婚。两人在逛书店时，偶然看到了埃德

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精读之后，谢锦涛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向往。正如美国记者白修德评价《西行漫记》说：“斯诺对中国共产党的发现和描述，与哥伦布对美洲大陆的发现一样，是震撼世界的成就。”与当时中国许多知识青年一样，《西行漫记》也在谢锦涛心中播下了革命以及共产主义的种子。

心怀天下，积极投身抗战

武汉会战后，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以及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迁至邵阳，地下党员们积极开展活动，并组织了“战地文工团”，动员民众一起抗日。谢锦涛觉得中共的“文化抗战”主张很有成效，于是便出力促成了一些抗日团体的联合演出。翌年，谢锦涛四处奔走，筹办了难民纺织厂，解决了由武汉、长沙流亡至邵阳的难民们的生计。当《观察日报》在邵阳组织抗敌献金活动时，他还捐献了自己珍藏的总理遗墨和一只玉器杯子，并动员妻子将祖母赠送的一对汉白玉手镯和耳环献出。

谢锦涛的这些“亲共”举动，招致邵阳师管区政治部主任的猜忌，因而被迫辞职。后

经人介绍，谢锦涛前往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学习。中央训练团是战时国民党最高干部训练机构，由蒋介石亲自兼任团长，陈诚实际负责，后由陈果夫总其事。谢锦涛在此学习了一个多月，学校对他所提交论文的评语是“议论透彻，认识精到”，由此可见，谢锦涛虽然出身技术兵种，但在军事思想上有独到的见解。对于他的性格，学校的评语是“坦白真挚、爽直有热情，思想纯粹，忠于负责，为一年少有为青年”。

1940年在重庆经历短暂的培训后，谢锦涛被分配至湖南省军管区政治部担任指导员。8月，调任至黄埔军校第二分校担任政治教官，教“总理遗教”。在当时国民党军人须集体入党的政策下，谢锦涛加入了国民党。

几经周折，作为一名军事技术兵出身的军人，谢锦涛并没有发挥自己的专业所长，而是做起了二分校的政治工作。但面对当时整个战局的发展，他与其他军人不同的是，虽然身在边陲，却仍“心怀天下”，时常对国内、国际战局以及战争武器、技术等一系列军事问题发表看法，并付诸文字刊载在报刊上。如对于当时华北地

区的抗战，他认为应充分重视中共的游击战。苏德战争爆发后，国内对于德军的“闪击战”曾有过相关报道，他也相继发表多篇文章讨论德国的闪击战以及苏军的反“闪击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面对日本在太平洋的争夺，他认为“现代海军作战的三个条件是要有强大的海军吨位、优势的空军、良好的军港”，综合各种资源的竞争，日本绝不是同盟国的对手，主张盟军应即时发起反攻。作为一名技术出身的政治教官，谢锦涛对军事技术在战场中的作用有着敏锐的嗅觉，这一点很符合中训团对他的评价——“议论透彻，认识精到”。

执教于武冈二分校后，谢锦涛不仅重视军事教育，而且充分利用自身的身份地位来发动宗族，兴办文化教育机构以及发展经济的组织。到武冈工作后，谢锦涛以军校教官的身份出面，与家乡谢氏族长商议，用谢氏宗祠公产创办“民化小学”，并创办武冈信托合作社、新生炼铁厂等一批物资生产机构，谢锦涛兼任合作社经理，兼职但不取分文报酬。1942年，他还担任湖南武冈简易师范学校教导主任。

弃暗投明，领导抗日武装

平江惨案发生后，国民党在湖南地区的反共势力抬头，一些共产党员转入地下工作，潜入了国民党各种团体机构。因武冈距离桂林不远，而桂林是当时中共在南方的重要联络中心，因此谢锦涛得以接触到更多的共产党员。在这些共产党员中，最重要的一位就是刘布谷。刘布谷是中共武冈特支书记刘云龙的胞弟，因工作机缘结识了田汉、夏衍、欧阳予倩、寇瑜等进步人士，深受马列主义思想的熏陶，随后创办了《文学评论》，秘密翻印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开展革命宣传。

刘布谷得知谢锦涛在邵阳、武冈的情况后，找机会与谢锦涛接触。二人皆是早期有理想的知识青年，还同为青年军人，都曾为国民党工作过，对国民党的腐败有亲身体会。两人都认为，国民革命完成后，国民党已经退化成一个保守、没有进取心的政党，只有中国共产党还保留革命的进取心，也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相同的思想倾向和经历使二人一见如故。

两人也多次谈到《西行漫记》对自己的影响，彼此透露对

革命浪漫主义的想象以及对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向往，为不能随部队长征去延安而感到遗憾。在刘布谷的影响和劝说下，谢锦涛明确表示希望加入共产党走上革命的道路。于是刘布谷返回桂林将这一情况上报，经组织同意，谢锦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4年4月，日军为打通大陆交通线，挽救太平洋战场的危机，以及为摧毁美军在华空军基地以解除其对日本本土的威胁，发起了代号为“一号作战”的作战计划，国内一般称豫湘桂战役。自6月打通平汉铁路后，日军开始进攻长沙、衡阳，并沿湘桂路南下，邵阳部分地区相继沦陷。当时，中共桂林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指派刘布谷在湘桂边区组织抗日游击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刘布谷于是找到了谢锦涛，两人同往新宁、东安交界处李子山，以开纸坊作掩护，秘密发展抗日武装，并利用谢锦涛曾在黄埔军校二分校任政治教官的身份，组织收拢了一批游击人员与枪支弹药，并以开设造纸厂为掩护吸收了一些工人与青年，形成了一股抗日武装力量。

这时，中共桂林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金阳，授命谢锦涛、

刘布谷组织成立湘桂边区人民抗日游击队，指定谢锦涛为司令员，刘布谷为政治部主任。于是，谢锦涛以原有的游击骨干为基础，正式组建部队。最初部队只有100多人，编为3个大队。后来发展到1000余人，300多支长短枪，编为3个支队，在东安、新宁、武冈、全州等湘桂边境活动，打击敌人。谢锦涛领导的湘桂边区抗日游击纵队充分利用雪峰山等有利地形以及良好的群众基础频繁出击，采取以逸待劳、诱敌深入等战术，不断给日寇以重创。

1944年10月，谢锦涛获悉，有100多名中国民工被日军关押在东安县城附近的日军后方医院里。谢锦涛派遣侦察员摸清情况后，与刘布谷商议决定立刻营救民工。于是当夜派出两个中队，分头前往东安县城郊区，在通往日军后方医院的几条主要通道上分兵埋伏。当天，谢锦涛化装成一位日军中佐，带着“翻译”与“护兵”赶到日军后方医院，命院长将民工全数交给他。医院见来者是“日本军官”，于是命人将民工带出。民工获救后，在谢锦涛带领下迅速分散逃往新宁方向的接应地点。日军发现后，立即追击。早已埋伏等候的游击纵队对日军

进行猛烈攻击，击毙日本士兵十余名，缴获长短枪械 80 余支。而后游击纵队又相继在紫溪孔明台、大庙口、井山边等地与日军展开周旋，进行了 10 多次战斗，击毙日军中佐小谷吉田、中尉吉田龙炎以及日伪军数十名，缴获大量枪支弹药，游击队伍迅速扩大，威震湘桂边区。

1945 年 4 月，日军集结 8 万兵力进犯湘西，国民党组织湘西会战。谢锦涛得知后立即返回武冈再次组建抗日武装部队，建立武冈东乡抗日联防自卫指挥部，配合湘西会战，打击日寇。5 月，日军在雪峰山东麓的武冈境内被击溃后，谢锦涛率队乘机追击，再次取得胜利。为继续扩大抗日游击队伍，他决意乘机追击日寇，准备去绥宁迎回迁往那里的第二分校练习营，以便在武冈、新宁山区，与徐君虎共同组建抗日武装，直至把日寇赶出县境。当他整装待发时，传来了日寇投降的消息。

嫉恶如仇，除强惩暴遭算计

由于游击队伍规模不断扩大，谢锦涛声名鹊起的同时，也招致了地方豪强劣绅的忌惮，更引起了当时在湘桂一带作战

的国民党军的不满。长年与国民党军政势力打交道，谢锦涛亲眼见证了国民党地方部队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的种种乱象，生性耿直的他对此深恶痛绝。

谢锦涛对国民党的腐朽本质，并非后期才有所认知，早在 1942 年便因反抗不公，与国民党当局产生激烈冲突。抗战时期由于当地粮食供应紧张，二分校颁布了一项“分校小职员及武冈籍军官的眷属不发口粮”的政策，这引起许多军校师生的极大愤慨。于是，谢锦涛领头发出通电，迫使二分校当局收回原政策，由此，二分校政治部对谢锦涛极为不满，以调出相威胁逼迫其辞职。这场遭遇，让谢锦涛与国民党当局的矛盾彻底激化。亲身领教其腐朽霸道的作风后，他愈发坚定了抗争到底的立场，后续面对国民党军队祸乱地方的违纪劣行，不再只是愤慨隐忍，而是选择主动出手整治。

1945 年 2 月，第 100 军军长李天霞率部调防至湖南武冈一带布防，因部队纪律松弛，一些军官勾结地方政府贩卖私盐。一日，谢锦涛得知第 100 军某部派人携款去购买食盐回武冈私卖，当部队路过广益乡地境时，谢锦涛带领游击队，缴

了这个买盐部队的枪支，并没收买盐的银圆作为游击队的发展经费。为此，当地驻守部队联合国民党政府，派出重兵围剿谢锦涛的游击纵队。武冈县长容生以谢锦涛抢夺公款为由，扣押谢锦涛母亲和妻儿。第 100 军则把一门大炮安在乔江山上，要炮轰谢家祖坟，谢家族人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后由族上卖掉 40 亩田，将钱送给这些军政官僚才得以纾困。经此事件后，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威胁，谢锦涛和刘布谷被通缉，游击队内部也开始分裂。

1946 年春，中共桂林党组织指示谢锦涛回到武冈发展武装力量，谢锦涛召回旧部，组织起一支队伍，在武冈东乡一带开展武装斗争，同时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行，提出“建设农村新经济”“各党派政治地位平等”“建立联合政府”等主张，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谢锦涛的革命行动，使当地国民党政府异常害怕，于是电告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诬陷谢锦涛是土匪，并将其共产党员的身份暴露出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即电复第六专员公署，要求地方政府捉拿谢锦涛。

是年 4 月，武冈县长张绍

吴主持召开“清剿会”，收买了当地有名的土匪头子张云卿，指使张云卿的部下孙忠诚、龙正卿携带轻机枪一挺，假意向谢锦涛投诚。谢锦涛因为发展武装需要，也想收编张部，因此误中敌人奸计。1946年4月30日，谢锦涛前往约定地点紫阳乡观音岭预备收编土匪张云卿部，但刚到不久就遭遇埋伏在路边的匪徒袭击，由于事先准备不足，在战斗中牺牲，年仅32岁。

谢锦涛为人耿直，充满正气，一生追求进步，不畏强权，

率领家乡人民英勇斗争，奋力杀敌，挫日寇而卫桑梓，兴教育而启乡智，抗强权而扶正义。他的名字和事迹，应该被永远铭记。

（作者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 1.《谢锦涛个人档案》，台北“国史馆”藏。
- 2.尹均生、安危：《中外名记者丛书：埃德加·斯诺》，《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
- 3.何智霖编辑：《陈诚先生回

忆录——抗日战争》（下），台北“国史馆”，2004年。

4.谢锦涛：《太行山下的战局观》，载《中央日报》（湖南）1940年5月18日。

5.谢锦涛：《德国的闪击战与苏联的反“闪击”战》，载《革命与战争》1941年第1卷第12期。

6.谢锦涛：《太平洋的战略形势》，载《武冈》1942年第10期。

7.中国共产党东安历史编纂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东安历史》1921—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我的黄埔前辈”主题征文启事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黄埔军校是一个传奇，黄埔同学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如今，广州长洲岛上的黄埔军校旧址早已没有了往昔金戈铁马、沙场点兵的情景，我们的视野中也越来越难寻觅到黄埔师生龙腾虎跃的身影。但是，这些黄埔前辈叱咤风云的威武雄姿，充满传奇的人生经历，救国救民的爱国情怀，却从来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为了永远铭记黄埔师生对国家和民族的贡献，激励后人在新时期继续发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推动祖国统一，致力民族复兴，我刊特开展“我的黄埔前辈”征文活动。

征文主题：记忆中的父辈印象（包括您所了解的父辈的主要经历和贡献，最难忘、最感动的故事），父辈身上体现出的好思想、好传统、好作风、好品德等，结合父辈的人生经历谈对黄埔精神

的思考、感悟和传承等。

征文对象：海内外黄埔亲友后代。

征文要求：文章字数不限，要求内容真实、生动、具体，情感真挚，可读性强。来稿时请提供父辈历史照片1至3张，家庭照1至2张，作者本人照片1至2张，父辈和作者的个人简历以及作者联系电话、地址、邮编、银行账号、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请有条件的作者尽量提供电子版稿件，并在邮件主题中注明“我的黄埔前辈”。手写稿件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三环中路赵公口20号《黄埔》杂志社 邮政编码：100075

电话：010-58336325

联系人：刘燕

电子邮箱：hpzzs88@sina.com

父辈的抗战

□ 乐策、乐鼎、乐正

我的父亲乐典（1907—1991），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县长林村人，黄埔军校第6期毕业生。曾任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学员总队副总队长、学生大队长、航空机械学校学员大队长；抗战期间任战干4团军事总教官、少将教育长，后任第1军第78师少将参谋长、副师长、西安公署少将高参、第47师师长、第5训练处副参谋长等职；1949年12月，父亲在四川参与武装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投身于新中国的军事教育事业，工作期间多次立功受奖。1958年，父亲转业至江西省政府，担任参事，曾当选为江西省政协第三、第四、第五届常委，兼任江西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民革江西省委会顾问、全国及江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江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首任会长等职。2015年，父亲被追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经



/ 乐典 1943 年任 78 师少将参谋长时留影。

历了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32年，父亲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1942至1945年参加了扼守潼关等地的战斗。

血战庙行终获大捷

“九一八事变”后，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同时压迫南京国民政府屈服，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初在上海不断寻衅滋事，挑起事端。1月28日晚，日军突

然向闸北的第19路军发起攻击，随后又进攻江湾和吴淞。19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抵抗。2月14日，蒋介石将前首都警卫军87、88师和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组成第5军，任命张治中为军长，并命令他们前去增援19路军。其间，第5军第87师（张治中兼师长，副师长王敬九）下辖孙元良的259旅、宋希濂的261旅，负责胡家庄沿蕴藻浜北岸经曹家桥至吴淞以西之线的警戒；第88师（师长俞济时，副师长李延年）下辖钱伦体的262旅、杨步飞的264旅，负责由江湾北端经庙行镇、周巷至蕴藻浜南岸之线的警戒，教导总队（总队长唐光霁）之一部担任狮子林南北闸汊、川沙口、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沿江一线警戒。当时父亲任教导总队第3营副营长兼9连连长（时年25岁），率部参战。

张治中率部抵上海后，1932年2月17日，奉19路军总指挥之命，担任中国守军左翼总指挥，接续警戒从江湾北端经庙行至吴淞西端的防线。2月

18日，日军总指挥植田谦吉发出最后通牒，要挟中国守军于20日17时前撤退20公里，被蔡廷锴严词拒绝。日军两次增兵后，决定对中国守军发动第二次总攻，其作战计划就是攻占庙行，切断第5军和第19路军之间的联系，然后各个击破，从而达到占领上海、威胁南京的目的。

2月20日，庙行战役打响。植田谦吉命令日军全线总攻，采取中央突破，两翼卷击的战法，以第9师团主攻江湾与庙行的结合部，试图北与久留米旅（侵华日军第18师团）围攻吴淞，南与陆战队合围闸北。日军飞机结队成群地向中方阵地及阵地后方投掷炸弹，以重炮及舰炮集中射击吴淞、庙行一带阵地，日军步兵则借飞机炮火掩护不断向前进行攻击。

一场恶战开始了。中国守军第19路军与第5军将士们并肩作战，密切配合，利用长江三角洲水网地带和工事顽强抗击，并组织战斗力强的部队夹击刚进犯江湾、庙行结合部之日军。2月21日，夜幕降下后，军长张治中命令部队向日方前沿阵地袭击，父亲身先士卒率领9连士兵对日军进行夜袭战斗，枪声、冲杀声、搏斗声不绝于



1973年，乐典在韶山留影。



1979年国庆节，乐典在北京颐和园留影。

耳，最终给日军以重创。恼羞成怒的植田谦吉调集第9师团和第24混战旅约2万人，于2月22日凌晨1时突袭庙行。

一场恶战在庙行展开。由于中国守军坚决反击，日军的反扑遭到压制。从凌晨3时起，日军集中优势炮火对庙行各线阵地进行猛烈轰击，企图摧毁我方工事和有生力量。在敌军炮火的猛烈轰击下，官兵伤亡不断增加。拂晓后，大批飞机加入作战，战斗更加激烈。下午，庙行激战的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军队的方向发展，逐步形成了三面夹击日军的战局，迫使日军停止进攻。傍晚，日军飞机停止活动，各线部队向日军展开全线反击，日军节节败退。至晚10时，日军大部向淞沪以东溃退，剩下的麦家宅残军亦被彻底消灭。父亲参加的这场

庙行战斗，中国军队歼灭日军3000余人，史称“庙行大捷”。

庙行大捷使日本侵略军遭到自甲午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惨败，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扼守潼关保卫大西北

1942年2月，父亲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78师少将参谋长，部队先是驻扎在陕西华县赤水镇附近，强化对日作战战备训练，修筑工事。当时的总参谋长何应钦通知长江以北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派出参观团到78师参观学习，各军师长率领的参观团络绎不绝。外交部为彰显中国的军事力量，谋求美、英两国的援助，邀请英国议会代表团访华，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到78师参观。



/ 江西省黄埔军校同学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合影。前排左六为乐典。

1944年4月，日军突然调集五、六万侵略军对平汉铁路郑州至信阳段发动猛烈进攻。不久，郑州失陷，许昌失陷，驻马店失陷，5月25日洛阳失陷。日军占领洛阳后，继续向西进攻，很快攻入陕西灵宝县，78师受命急速开赴潼关增援，以防日军突袭潼关。78师到达指定地点后，立即构筑工事，严阵以待。潼关位于晋豫陕三省的交界，是从山西通往陕西的唯一重要战略通道，四周崇山峻岭，交通环境十分险恶。日军为了攻入中国西北地区，多次派骑兵冲入潼关，均被78师顽

强击退，在中国军队坚强守卫下，日军想攻入中国西北的战争计划一直未能得逞。后78师又推进驻守河南盘豆镇，与日军隔河对峙。

到1945年3月间，78师奉命撤回潼关，接替第1师的防守任务。由于中国军队士气高涨，同仇敌忾，防守严密，日军一直没有攻破潼关防线，保卫了大西北的安全。1945年6月份，美国派遣的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为了准备向侵华日军发动反攻，来西安视察战地情况，到潼关考察了78师，对78师的战备情况

表示了赞许。1945年8月抗战胜利，78师即在潼关居民的鞭炮欢送中离开了潼关，徒步行军，开赴郑州，接受日军的投降，父亲时任郑州警备司令部参谋长。

几十年光阴荏苒，父亲于1991年永远离开了我们，但他那一代人抵御外侮的铮铮铁骨，早已融入民族血脉。值此和平年代，回望父辈在庙行、潼关浴血奋战的岁月，更感和平来之不易。我们当以史为鉴，珍惜当下安宁，继承先辈遗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

天津籍烈士于方舟推荐的黄埔一期学员

□ 王伟凯

于方舟，原名于兰渚，又名于芳洲，天津市宁河区俵口村人，生于1900年9月，是天津党团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被誉为“津门之光”。

“五四”运动爆发后，于方舟积极投身反帝爱国斗争，组织“学生救国团”，与周恩来等人在天津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27年9月以中共顺直省委常委、组织部长的身份领导冀东农民武装暴动，在突围时不幸被俘牺牲。

黄埔军校第1期招生时，需有人推荐方可报名。上世纪20年代初，国民党直隶省及天津市党部机关设在天津，有着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国民党省市党部负责人、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人等多重身份的于方舟，积极参与了黄埔军校在河北、天津的招生推荐工作。据《黄埔一期学员入学背景情况》显示，由他参与推荐的学员共有7名：第1队2号

学员何盼、3号学员杨其纲，第2队4号学员江震寰、118号学员白海风、122号学员张隐韬，第4队20号学员宋文彬、94号学员荣耀先。这7名学员在后来的革命生涯中用行动诠释了黄埔精神，留下了可圈可点甚至说是可歌可泣的人生篇章。

不知所踪的何盼

何盼，字祺臣，河北省定州市人，生于1902年，家庭富裕，有田地500余亩。直隶第九中学毕业，北京平民大学、北京人艺戏剧专门学校、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肄业。1924年3月，由于树德、陈弈涛介绍加入国民党。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学习。7月13日在校期间出走，后不归失联。据同时入学的河北同乡张隐韬日记记载：“昨天星期，本校跑走了4人，内有何盼、江震寰。江之目的，是欲去俄留学，托张薄泉请求退校，校长未允，故有此举。何则为其爱者陈奕涛，谅无他因。”何盼入学的推荐人之

一是其妻子陈弈涛，陈时为中共北京党组织秘密成员，北京绒线胡同京师公立第七小学教员，所以推测何盼很大程度上也是参加了革命工作。

革命英烈江震寰

江震寰，又名赵尊三，河北省玉田县刘家桥村人，生于1904年。毕业于河北省第三（滦县）师范学校，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江浩之子，中共党员，曾在天津扶轮小学以普通教员的身份作掩护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3月，由李永生、王法勤介绍加入国民党。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7月离开黄埔军校，9月被党中央派送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

1925年10月，江震寰回国后任共产主义青年团天津地委组织部长，兼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常委。当时机关设在天津市英租界义庆里40号（今属和平区），与于方舟、安幸生和邓颖超等一起领导天津各界运动，并率先在天津纺织工人中建立

了中共党组织、天津纺织工会以及工人俱乐部和学校。1926年，张作霖的奉军占领天津后，天津警察厅与英租界工部局查封义庆里40号，逮捕了正在机关办公的江震寰等6名共产党员和9位国民党员。

在狱中，江震寰备受酷刑，但没有泄露丝毫机密。他在留给新婚妻子的告别信中写道：“虽然敌人把我们打得皮开肉绽，但是他们得不到任何东西。我们把牺牲作为个人革命的成功。”“抚孤之承我志……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为期。”他鼓励妻子要“坚强地、堂堂正正地活下去”。并给未出生的孩子取名“赤星”。尤其是信中写下的“大好头颅待价估……愿卿莫作无谓哭”之句，让无数人感动落泪。遗腹子江宏烈成年后，到冀东抗日前线参加革命，并参加了平津战役，其表妹张世莹曾回忆说：“天津解放时，我们一家都在天津城里，表哥（江宏烈）是穿着军装骑马进城的。”

1927年4月18日，张作霖下令将江震寰等人处决，临刑前江震寰拒绝跪伏受刑，在天津南市上权仙影院（今南市食品街）对面的空场上身中数弹而亡，年仅23岁，当时的《大公



/ 江震寰。



/ 杨其纲。

报》载：“本市同志设秘密党部于英租界义庆里，为逆侦知，凭借外力于（1926年）十一月二十日，将王纯善、品三、郇集中、许凤山、徐建中、马增玉、孙宝山、江振寰、王鹤洲、孙一山、倪家志、韩玉亭、王建文、马自芳、王益三等十五人同时攫去，引度入狱，极刑严讯，惨酷备至，五阅月未尝稍屈，遂于翌年四月十八日在上权仙枪决，临刑犹高呼口号，面无惧色，古所谓视死如归者非欤！”如今，他们的纪念碑屹立在天津市河北区的中山公园内。

执教黄埔的杨其纲

杨其纲，又名杨振纲，河北省衡水县西杨家庄人，生于1903年。1919年入保定育德中

学学习，在校期间，曾受教于革命先驱邓中夏烈士。1922年5月，由邓中夏介绍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7月，杨其纲从育德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开始在李大钊领导下从事党的工作。同年12月，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此成为衡水籍人中最早的共产党员。1924年5月经李大钊、于方舟等人推荐，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

中共黄埔军校第一届党支部成立后，杨其纲任组织干事，不久又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任中共黄埔军校特别党支部书记，后相继担任军校政治部编纂股主任、宣传科员、政治教官等职务，参与军校的政治教育工作，编印《革命军事政治月刊》《革命军》《黄埔潮》等刊

物。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后，杨其纲在爱人掩护下，连夜离开黄埔军校到乡下躲藏，后辗转回到家乡衡水等待中央指示。

1928年夏天，杨其纲在家乡开展工作，他以国民党党员身份找到刚刚建立不久的国民党衡水县党部，针对衡水情况，制订了“共办教育，发展组织，宣传民众”的工作计划，正当筹建学校顺利进行之时，杨其纲肺病复发，经医治无效病逝，年仅27岁。

历经百战的白海风

白海风，又名雁秋、都楞仓，热河（今辽宁）建平县业柏寿北三家村人，生于1902年。早年毕业于热河师范学校。1923年，由于方舟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北方局发展最早的一批蒙古族共产党员。1924年5月，成为黄埔军校第1期学员。黄埔军校毕业后，白海风参加了第一次东征，之后根据组织安排回到北方。1926年，中共北方区派他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后经组织允许又成为联共（布）党员。1928年7月，他作为正式代表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



/ 白海风。

1933年，经党组织同意，白海风到南京黄埔军校毕业生登记处登记，被分配到北平军分会工作，任军分会上校参事，自此以该身份继续从事地下工作。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任命白海风为蒙旗保安总队少将总队长，收容、整顿和重组蒙旗保安总队，将其重组为900余人的以蒙古族青年为主体的部队。乌兰夫、纪松龄等一大批大革命时期入党的中共党员以及抗战初期入党的赵俊臣、克力更、纪明德、云蔚、云飞杨等人活跃在这支部队中，使得共产党组织在这支队伍中发挥了重要影响。

1937年9月，蒙旗保安总队被改编为蒙古独立混成旅，白海风担任旅长。此后，蒙旗

独立旅参加了归绥（今呼和浩特）保卫战，在呼和浩特城南大黑河一带阻击日本黑石旅团。1939年夏，蒙旗独立旅被扩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3师，白海风任中将师长。新3师在伊盟多次抗击日伪军进犯，军队风纪严明，深受当地蒙汉民众好评。1943年和1944年，新3师又被改编为骑7师、骑9师，白海风继续担任师长。1947年，骑2旅被命令配合进攻陇东解放区，白海风以旧疾复发为由未去前线，并设法保护了交战中被俘的数十名解放军官兵，将他们安全送回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白海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西北民族学院副院长等职。1954年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1956年9月在北京病逝。

东征英雄张隐韬

张隐韬，原名张宝驹，又名张仁超，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城东郝家马村人，生于1902年。高小毕业后到天津工作，参与了声势浩大的五四爱国运动。1922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经于方舟等人推荐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1925年2月，被编入黄埔军校学生军军



/ 张隐韬烈士雕像。

官教导团。在校期间，参加了平定陈廉伯、陈恭受商团叛乱和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的战斗。在东征东江、重占汕头、围攻淡水、激战海丰等战斗中，张隐韬作为“奋勇队”一员，不怕牺牲，冲锋在前，受到了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召见和鼓励。

1925年从黄埔军校毕业后，受党组织派遣，张隐韬以左派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到驻河南开封的国民军第2军中

搞兵运工作，并担任第2军第2师第4旅副旅长。在开封，张隐韬遇到由天津党组织派来的刘格平，二人对中国革命和战争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这年秋，国民军第1军、第2军一部和第3军决定联合攻打盘踞在天津的奉军李景林部，张隐韬认为创建革命武装的时机成熟了，于是请示当时郑州的地下党组织。党组织决定由张隐韬去天津南部农村，建立农民武装，刘格平去天津组织工人

武装，两支部队在津南会师，开辟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张隐韬先后参加了攻打河北南皮、盐山、庆云等地奉系军阀战斗，11月任津南农民自卫军司令。1926年2月，在带领农民自卫军由南皮挥师北上途中，遭遇反动军阀的截击，张隐韬不幸被俘，英勇就义，时年24岁。如今，张隐韬的雕像矗立在南皮县烈士陵园内，供后人瞻仰。

平津战役将领宋文彬

宋文彬，河北遵化人，生于1902年，北京公立第三高等小学毕业，曾任北京政府内务部录事，京汉铁路印刷所职员，组织印刷所工会理事。1922年进入北京大学旁听。1923年12月加入国民党。1924年5月，经于方舟、于树德（天津市静海区人）等推荐考入黄埔军校，编入第1期第4队学习，其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参加第一、二次东征和北伐战争。

宋文彬先后任黄埔军校教导第2团第3营排、连长，国民革命军第20师团长。1926年夏在南昌战役中负重伤，后任国民革命军军参谋处长、总队长、政训处处长等职。1943年1月，国民政府授予其陆军步兵上校军衔。1947年，任北平警备司令部少将高参。1949年1月，和其他诸多将领联名通电主张和平，参加北平和平解放工作，后任解放军第六高级步兵学校研究员。1961年病逝。

英勇善战的荣耀先

荣耀先，号一介，内蒙古土默特旗（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西园村）人，生于1896年，祖辈经商，家境富裕，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优秀党员。



/ 荣耀先。

1911年，考入归化城土默特高等学堂（原名启运书院）。1917年夏，由土默特总管辖保送到北京蒙藏学校学习。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是蒙藏学校学生爱国示威游行的组织者之一，并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学习马克思主义。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最早的蒙古族共产党员之一。1924年5月，经于方舟等人推荐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学习。

1925年初，荣耀先参加了平定广东军阀陈炯明叛乱的第一次东征。战斗中由于表现突出，先后任连长、营长，并获得通令嘉奖。《黄埔战报》《民国日报》等刊登文章介绍荣耀先的英雄事迹，称赞他是“英勇善战的蒙古族营长”。6月初，滇

系军阀杨希闵和桂系军阀刘震寰又发动叛乱，荣耀先随东征部队回师广州，经过几天的激战，叛乱平定。

1925年8月，荣耀先随鄧子举（河南省鲁山县人，曾任黄埔军校第1期区队长、少校战术教官，第2期步兵科第2队队长，黄埔军校教导第1团连长）返回北京，为军校招收第4期学员。返回广州后，任黄埔军校第4期入伍生总队区队长，入伍生第1团第3营中校营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3师第7团连长，后晋升营长、突击团团长。1927年2月，升任北伐军第6军突击团团长。1927年春参加二次北伐，在徐州茅村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32岁，国民政府追赠其为陆军少将。

如今，黄埔军校已走过百年历史，这些与天津颇有渊源的黄埔师生，在峥嵘岁月中为自己的人生增添了诸多色彩，他们的故事激励黄埔后人不忘先辈遗志，团结奋进，永往直前，为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继续弘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在新征程上用行动续写黄埔荣光。



（作者为天津市黄埔军校同学会会长、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黄埔师生(上)

□ 李务起

1924年1月，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此后，为帮助中国革命事业培养政治骨干和军事人才，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了两所学府：一所是1924年创办的黄埔军校，一所是1925年在莫斯科成立、以孙中山先生名字命名的莫斯科中山大学。

2025年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建校百年，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所百年前成立于中国境外的大学，在1925年至1930年间，共招收了4期学生计1200余人，这些学生绝大多数来自国内，也有从法国、德国、比利时等西欧国家转入的勤工俭学的学生。截至目前，根据搜集到的档案资料，共有58位黄埔师生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或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后进入黄埔军校两部分。这些相继在黄埔军校、莫斯科中山大学接受培养的学生，回国后不仅对中国革命产生了积极和重要的影响，更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产生密切



/ 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

关联。

大革命洪流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创办的背景

20世纪20年代，共产国际先后成立了数所专门训练苏联境内少数民族与各国共产党员的学校，大力宣传马列主义，以便学员回国投身革命，莫斯科中山大学即为其中之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所专门为中国人创办的学校。当时的苏联认为，中国必

须先经过类似俄国的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产生社会主义革命，进而使中国也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所以该校的成立，在名义上是训练国民党员成为政工人员，以协助民族（国民）革命运动的开展，实际上是要培养一批职业革命家，使他们回到中国后制造出另一个布尔什维克革命。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在北京逝世。为了纪念这位为联俄联共作出突出贡



校址最初拟设立在西伯利亚，预计招收留学生 500 人。经过多次讨论，联共（布）中央

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在现在的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4号、16号以及18号建筑的部分区域。而当年的沃尔洪卡大街16号，曾经是莫斯科最古老的一所中学——莫斯科省立第一文科中学的所在地。

招考、报考及选派情况

莫斯科中山大学宣布建校正值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中央组成了由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选拔委员会，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考留学生。消息一经传开，迅速得到广大爱国青年的积极响应，尽管家庭出身、阶级身份、社会理想等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期望借此机会为自己的人生寻求新的定位。

莫斯科中山大学首次招生时的情形可谓盛况空前。当时招生考试分别在广东、江苏、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北京、河北、山东、河南、陕西等地进行。选派工作分别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进行。一时应者云集，上万名青年踊跃报考。广东省作为当时革命的大本营，前往报考者最多，达到1030人。广东的选拔考试在广东大学举行，考试后选派了147人远赴苏联，其中多数为国民党员。

招生要求极其严格，以广东为例，考生需要通过三关筛选，包括目测甄别、笔试和口试。首先，应试者要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填写一张报名表，然后由招生委员会成员进行目测甄别，形象不佳者不得过关。然后是笔试，在广东大学礼堂

举行，考题为“什么叫做国民革命”“什么叫做反革命”“什么叫做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国民革命与民众运动”“试述中国动乱之原因”等，至少要答3条。最后还要口试，仍由招生委员会成员担任主考，题目侧重时局政治。当时的《广州民国日报》曾刊登《投考孙文大学口试情形》一文，其中写道：

投考莫斯科孙文大学学生，经政治委员会定于廿八日举行口试，是日早九时前，第一次考试及格学生百余人，已集合中央党部听候试验，至九时半开始试验，由农民部长陈公博、组织部长谭平山、商民部长甘乃光、宣传部长毛泽东等四人，分堂主试，直至十二时半始试毕云。

考试淘汰率很高。当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在1925年12月13日《政治周报》第2期中，以“子任”名义撰文《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对广东考生录取情况进行专门统计：

至孙文大学学生人数，闻第一次定额500名，在广东方面招150名。现在业由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考取147名，从1030人中

选出，其方法分笔试口试两种，必两种成绩均优者方能及格。当时考取的学生姓名，共140名学生，尚有7人姓名待查。至学生性别籍贯年龄等项，政治委员会已制有统计表，录之于下：

（一）性别：男139人，女8人。

（二）省别：广东71人，湖南28人，江西10人，云南7人，四川7人，江西5人，湖北5人，浙江3人，贵州3人，福建2人，江苏1人，山东1人，山西1人，未详3人。

（三）年龄：20岁以内者36人，25岁以内者86人，30岁以内者20人，未详5人。

（四）婚嫁：已婚嫁者45人，未婚嫁者96人，未详6人。

（五）职业：学界55人，教育界7人，报界2人，农界1人，其他7人，未详10人。

在该文中，毛泽东还提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设立的原因、宗旨、目的以及课程、教授方法：

莫斯科孙文大学之设，乃苏俄民众景仰孙先生革命精神，设此大学以容纳中国信仰孙先生主义的革命青年使为深切之研究，以养成国民革命之领导人才。”“校长拉突曾对人言，该大

学宗旨在培养社会领袖人才，课程主要科为《近代经济思潮》《近代世界史》《苏俄革命之经过及其意义》，而《中国之国民革命运动》则更列成专科，各科教授大概取研究方式，鼓励学生关于政治经济及各种社会问题独立之研究，及创造的著作。

莫斯科中山大学虽以招收国民党籍学生为主，然而，由于当时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政策，故跨党情况普遍，共产党籍学生为数甚多。一般认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第1期正式招生数为310人，但据台湾“中研院”余敏玲引用俄国学者潘佐夫的估计，第1期学生为281人，其中共产党籍约占68%。若结合地域情况来看，从广东赴校的90%是国民党员，而从上海、北京、天津赴校的，多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但实际上，从广东赴校的国民党员中，也有跨党身份者。当时的苏联政府驻广州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又特别推荐了30名国民党要人的子女免试入学，分散在第一批、二批学员中。除广州外，其他城市选派的留苏人员，包括张闻天、伍修权、屈武、张锡瑗等，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

当时，新学生社、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及其他团体，均连日开会欢送。国民政府亦对莫斯科中山大学寄予厚望，邀集学生聚会。在此次叙会中，鲍罗廷有一长篇演说，其中说道：

科学在帝国主义手里，用为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若在弱小民族的手里，则可用为解放自己的工具。美国及英德诸帝国主义国家的大学，乃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关，孙文大学的目的，则在使一般学生了解中山先生的主义以完成中国国民革命。

1925年12月，学员在邵力子、杨明斋和俞秀松等的带领下顺利抵达莫斯科。12月14日，莫斯科中山大学正式开课。

教学的设置和办学的终结

莫斯科中山大学以“为中国革命培养骨干力量”为创办宗旨，显示出该校与中国革命的密切关系。该校设置的班次共分四类：一是正规班，大部分学生是知识分子，其中又分俄文班、英文班等；二是特别班，也称“老头子班”，大部分学生是大革命失败后到校就学的级别较高、年龄较大的党政领导干部；三是工人预备班，学生

主要是从欧洲过去的华工和从国内去的工人；四是速成班，学生经过短期培训就回国参加革命工作。1928年，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中国学生并入该校，加上各种培训班所培养的学员，该校为国共两党及民主革命阵营先后培训了3000余名干部，其中包括很多国共两党未来的风云人物。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教学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求学生不仅要学习知识，还要深入社会考察民众生活。

最初该校所设课程以介绍西方革命经验为主，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列宁主义、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和俄语等。自1928年秋以后，才有一些关于中国革命的课程。综合来看，该校所设课程包括俄文、社会形成进化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唯物论、经济地理学、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宋庆龄、冯玉祥、胡汉民等国民党要人，以及斯大林、托洛茨基等知名政治人物都曾到校授课演讲。

尽管苏联当时经济情况很差，但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苏联政府为中国留学生提供了充足的教学

资源和优厚的生活条件，显示了学校对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视与支持，以及对前来就读学生的关怀，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背景下能得到这些待遇是非常特殊的。

对于当时的中国政府来说，莫斯科中山大学地位特殊。莫斯科中山大学由苏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共同管理，国民党中央对该校为中国培养高素质干部寄予厚望，同时又怕学生受到“赤化”。代表国民党参与管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邵力子曾建议，“中山大学应该置于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双重领导下”。毛泽东在《中国国民党选派学生赴莫斯科孙文大学》一文中，还记载了汪精卫在欢送聚会中曾与赴苏学生约定三事：

（一）关于广州政治情形，政府方面，必一周或两周报告留俄各位，希望各位亦必时将其近况报告回来。（二）孙文大学之中国学生，须团结起来，始终誓为孙文主义奋斗。（三）关于赴俄各种预备，请各生举出干事数人，专向政府接洽，俾将所得消息，随时向各人报告。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



/ 莫斯科中山大学旧照。

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发动政变，捕杀中国共产党员。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也宣布进行“清党”，国共合作正式破裂。随后，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的关系也日趋冷淡，中苏关系由此陷入紧张状态。7月2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声明，“取缔”莫斯科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8月5日，宣布召回在苏联留学的国民党学员。于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决定将国民党籍学生全部遣返中国。9月，国民政府颁布命令，禁止国民党各级组织向莫斯科派遣留学生，这直接导致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期生源不足。与此同时，苏联国内也开始了严酷的政治斗争，由于大量“托派”分子的涌现，斯大林的权威受

到挑战，为统一国内思想，苏联政府决定停办莫斯科中山大学。10月，大部分国民党学员被遣送回国，没有回国的也加入了共青团和共产党。中苏两国也于12月14日宣布断交。

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中山大学转变为培训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干部的高级政训学院。1928年，随着东方大学中国班并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该校学员完全由中国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9月，中山大学更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30年夏，在一系列政治事件综合作用下，共产国际决定关闭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所在留苏教育史、中苏关系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学校宣布解散。

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黄埔师生

黄埔军校虽然当时已是培养军事干部的重要学府和新型军事政治学校，但莫斯科中山大学在中国的招生却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青睐，就连黄埔军校还未毕业的学生也有不少人到国民党中央执委申请报考莫斯科中山大学。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非常反对学生报考莫斯科中山大学，因为若同意报考，他苦心

经营的一大批少壮军官就会脱离他的掌控，还会被苏联和共产党施加政治影响。于是，蒋介石明令严禁黄埔生报考莫斯科中山大学。尽管如此，一些黄埔师生还是报了名。据现有档案资料记载，从黄埔军校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黄埔师生有邵力子、叶剑英、卜道明、周保中、贺衷寒、梁干乔、赖芳麋、左权、刘咏尧、萧赞育、邓文仪、温忠、陈启科、吕震洲、廖闯、聂绀弩、郑介民、骆德荣、周咏南、胡铭勋、康泽、杨振西、徐君虎、蒋先启、唐有章、张元良、唐玉琨、贺元、陈幸西、罗瑞卿等。其详细情况如下：

邵力子（1882—1967），初名景奎，后改名师泰，字仲辉、凤寿。1882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898年起，相继进入求志学堂、广方学馆、苏州中西大学堂、上海南洋公学、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学习。1925年5月后，相继担任黄埔军校秘书处处长、校史编纂会主席、特别党部执行委员、政治部主任。后被国民党中央委派为常驻共产国际代表，并代表国民党负责莫斯科中山大学事宜。抵达莫斯科后，代表国民党参与该校管理工作，并旁听课程，被授予荣誉学生称号。早年曾任《民国日报》总

编辑，后历任黄埔军校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驻苏联大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研究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务院劳动就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委员、中苏友好协会总会负责人，曾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法学会、中国出版协会、中国文学改革协会任职，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常务董事，以及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常务委员等职。

叶剑英（1897—1986），原名叶宜伟，字沧白，广东梅县人。1924年2月，经廖仲恺举荐，以粤军第2师代表身份参与黄埔军校筹备工作，是黄埔军校最早的筹备人员之一。5月，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少校副主任，兼任军事教官。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广州起义。1928年，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

军参谋长、中央军委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兼北平市长、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持解放华南及地方建政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78年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曾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

卜道明（1901—？），字士畸，湖南益阳人。1921年入读莫斯科东方大学远东科及军事训练团第1期。1924年4月，任黄埔军校俄文翻译兼教官。1925年春，代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7年，入读莫斯科中山大学高级班第1期。1929年，入莫斯科世界经济学院东方科学习。学成后主要在国民政府军事、外交及研究机构任职。1924年，曾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参议。后历任中央经济计划委员会专门委员、军事委员会第六部设计委员、航空

委员会秘书，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顾问事务处科长、处长。曾在外交部亚洲司任职。抗战期间任军事委员会外事局第二处少将处长。1949年赴台后，主要从事战略研究、国际关系教学与学术团体工作，也曾参与联合国大会相关事务工作。

周保中（1902—1964），原名奚李元，白族，云南大理人。1923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1924年任黄埔军校军事教官、第5期第6区队区队长。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11月，受党组织派遣，进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后，被派往东北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历任救国军总参议、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1935年后，历任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军长、东北抗日联军第2路军总指挥兼中共吉东省委书记、东北抗联教导旅（国际旅）旅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任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西南军政委员会（后西南行政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主任、民政部部长。曾任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第一、第

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

贺衷寒（1900—1972），原名贺忠汉，号君山，湖南岳阳人。1921年，由中国共产党派遣赴莫斯科，后因与团长张国焘发生冲突被开除团籍。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步兵科第1队。1925年参与发起成立“孙文主义学会”，并任黄埔同学会干部委员兼秘书长。1926年赴苏联考察，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因组织孙文主义学会分会被校方处理，转至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1年回国后，历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政治宣传处处长，训练总监部军事教育处处长，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处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军队党务处处长，南昌行营、武汉行营政训处处长，复兴社常务干事、书记，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一厅厅长、秘书长，新闻检查局局长，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常务干事、组织处书记长，社会部劳动局局长，行政院社会部政务次长等职。1949年赴台后，继续在行政、党务系统担任要职，是国民党在台初期体制内重要代表之一。

梁干乔（1903—1946），广东梅县人。1924年4月，由邹鲁、

梁龙保荐考入黄埔军校第1期第3队，其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冬，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加入中国国民党。曾任职的单位和部门有：“宪兵司令部”政训处、步兵专校、军事委员会、第十战区特别党部、第十战区政治部、第八战区政治部、青年团中央干事会、陕西邠洛区动员指挥部、陕西省第二区行政督察公署等，曾任“国民大会”代表。1946年病逝。

赖芳赓（1904—？），湖南醴陵人。1924年1月进入广州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步科1期学习。1924年春，中央陆军教导团正式并入讲武学校。9月，学校第3、4队学生参加北伐，留校的1、2两队被编入黄埔军校第1期第5、6队。赖芳赓作为第6队学员，被视为黄埔1期生。1925年7月，经潘培敏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经济系第2期学习。曾任第4路军政训处科长、第10师政训处科长，历任军事委员会特务团政训员、南昌行营调查课经济调查课员、禁烟督察处缉私室会计课员、黄埔军校特训处政治教官。后转入后勤系统，任陆军辎重兵学校会计主任、军政部学兵总队上校会计主任等职。

1926年7月24日,《黄埔潮》周刊创刊号发行

□ 李岚

1926年7月24日,由黄埔同学会主办的《黄埔潮》周刊出版发行。刊物为32开本,封面底色为金黄色,绘着日出海面、孤舟鼓帆的场景,船身上书写着“同舟共济”四个大字,突出黄埔同学会创立初衷,也是黄埔军校师生试图消除思想分歧,团结一致推进国民革命的直观注脚。《黄埔潮》周刊前身为1925年9月底黄埔军校政治部创办的同名三日刊(亦称半周刊)。该刊以刊载政治论文与时评为核心,设有特载、评论、大事述评、短兵等栏目,作者主要为杨其纲、恽代英等黄埔军校政治部的教官。因其鲜明的革命导向,一度是黄埔师生宣传革命思想、发表政治言论、鼓舞革命斗志的思想舆论阵地。1926年6月下旬,蒋介石以维护军校团结为由,解散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孙文主义学会,成立了黄埔同学会,担任会长,黄埔学生皆为会员。黄埔同学会成立之后,主要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是在各地设立支会、分会、小组等组织,进行会员登记;二是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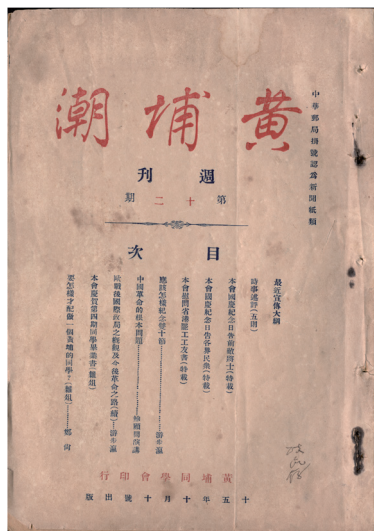


/《黄埔潮》周刊创刊号。

力宣传,立即着手筹备刊物发行工作。此时恰逢原《黄埔潮》出版安排调整,拟并入《军人日报》副刊。黄埔同学会认为该名称能体现“黄埔数千同学之喉舌,革命策源地思想之枢纽”的寓意,遂“借用‘黄埔潮’这个名词来作这个周刊的名号”。

编辑出版情况

黄埔同学会甫一成立即将刊务列为重点工作,认为“要把本会组织的意义及其使命,完全跻于实现,第一重要的工作,自然是赖于宣传”。会长



/《黄埔潮》周刊第12期目录。

蒋介石亲自拟定了征稿的主题,“投稿诸君注意,前日校长建议于《黄埔潮》文字应注意以下几点,惠稿诸君日后发表宏文巨著,务希留意及此:1. 关于国际革命新闻者;2. 对帝国主义者时事之攻击和批评但以经济学识和政治学识为根据;3. 注意农工利益及组织;4. 发表同学会及本党政治主张;5. 研究三民主义之真谛;6. 讨论土地问题之解决及平均地权之研究。”1926年8月17日,蒋介石曾专函讨论《黄埔潮》的体裁、风格等问题:“黄埔潮创刊号尚

嫌其字数太多，以后不求其多而求其精，能令人动目之文字有一二篇，即能使杂志提高价值，亦能为黄埔潮生色也。自创刊号起，国民革命军各军各师各团营须寄一份，第1军则各连寄一份，各县农民协会各省总部参谋处……”要求体裁“要仿人民周刊”，字数不必设限，求其精而不求其多，并要求给军队、农民协会、党政机关等，以此来宣传黄埔同学会的主张。

作为黄埔同学会会刊，《黄埔潮》由黄埔同学会宣传科下设的编辑股负责编辑，发行股负责发行，游步瀛、余洒度、饶荣春等中共党员都参与了《黄埔潮》的出版编辑工作。或许因筹备时间短的缘故，《黄埔潮》周刊创办后封面、栏目、内容一直在频繁调整中。饶荣春《半年来编辑股的工作纪略》一文就此专门做了解释：“因为开始没有一定的计划，所以在这十期中，曾经几次变革，现在形式的规定，及内容的方针，略有规划；此后当不至于杂乱，以负阅者诸同志的企望。自第一至第十期本刊，因大小方式不同，不便检阅，拟择优汇为汇刊，下月当可出版。”刊物创刊时并未设栏目，第2期时始分设插图、时评、特载、论文、短剑、杂俎、通信、会务

报告等栏目。第6期封面改版，在图的下方增加目录，简洁明晰。第9期时封面再改版，封面增加“亲爱精诚”的校训，封面图简化成一个竖长条作为装饰，下方有期别、编者和出版时间等信息，刊物尺寸、内容亦有调整。该期的《编者报告》说明从这一期起，把版面改大了一些。第10期时，封面不再有装饰图，只有文字，包括刊名、期别、目次、编者、出版时间等信息。1927年1月7日，《黄埔潮》周刊第24、25期合刊（新年号）出版发行，本期文章为蜡刻板印刷。1月16日，《黄埔潮》周刊第26期出版发行，为铅印竖排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黄埔同学会广州支会接续出版的《黄埔潮》除内容有大幅更动外，版式方面也有很大调整，新出版的《黄埔潮》为16开本，除期号外还增加了卷号，排列方式也由以前的竖排改为横排。

《黄埔潮》的发行方式灵活多样，有订阅、赠阅、零售和代售等。发行工作由黄埔同学会宣传科发行股负责，在云南、海南、北京、上海、河南、江苏等15个省市建立了28个分售处，销售网络极为庞大。《黄埔潮》订阅的价格最初为每元订阅25期，到第10期以后变成

每元订阅50期。零售的价格最初是每册大洋5分（1分等于0.01元），10份以上7折。到第10期后，每册4仙（“仙”同“分”），10份以上可以7折。代售《黄埔潮》10份以上可以6折，100份以上可以5折。赠阅的对象包括投稿作者，黄埔同学会会员，军队人员及学校各机关等。据王学韬《半年来发行股工作纪略》一文中的统计，《黄埔潮》共印刷325000册，发放288070册，寄售15820册。这一数据与同时期的《黄埔日刊》基本持平，其传播的广度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因印刷费用和出版时间的影响，后期赠阅数量有所减少，《黄埔潮》第26期专门刊登启事解释：“本会因印刷费浩繁，且感觉《黄埔潮》周刊因数量过多，出版延迟，拟即酌量将本刊数量减少，以便如期出版。此后，除分发各机关《黄埔潮》数量一律酌减外，凡本会未毕业会员，每二人共发一份，统希鉴谅。”

根据封底版权页显示的信息，《黄埔潮》编辑部设于广州市大东路中央党部内，即现广州市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内，承接印刷工作的是广州永汉北路培英图书印务公司，后期为广州市惠爱东路人民印务局。随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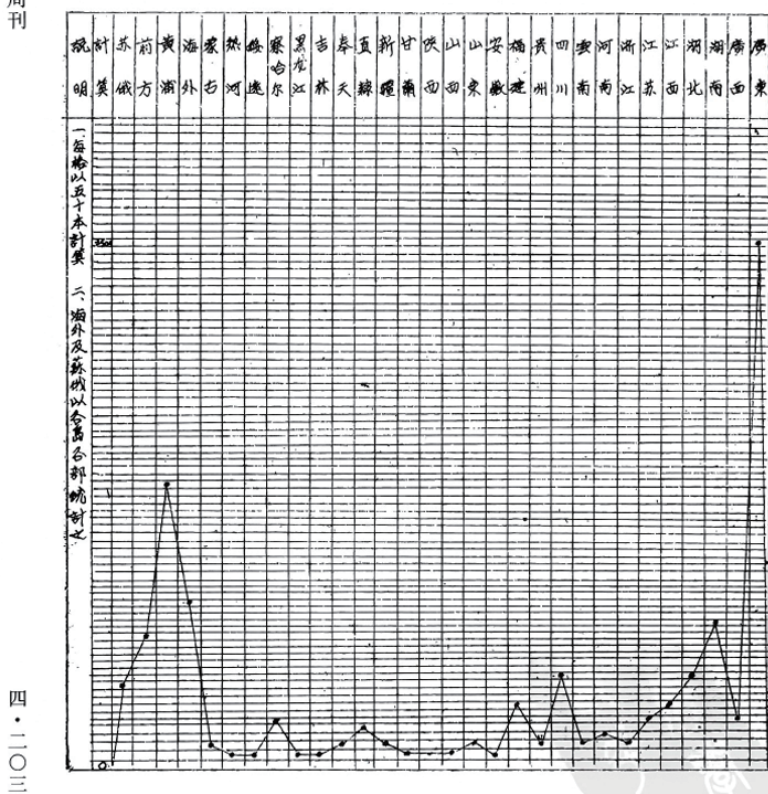
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1926年12月,黄埔同学会奉命迁往前线,《黄埔潮》自第27期开始改在汉口出版。为此,《黄埔潮》第26期特别发表紧要启事:“此次黄埔同学会迁往前方,同时奉本会长命在汉口设立《黄埔潮》周刊社,将本刊规模扩大。自27期起由汉口《黄埔潮》周刊社继续出版,特此通告。”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黄埔同学会进行了改组和“清党”。1927年6月,广东黄埔同学会组织又以《黄埔潮》的名义出版了新的会刊,由黄埔同学会广州支会宣传科编辑,地址仍在广州市大东路省党部内(现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内)。

作者群体

《黄埔潮》创刊号封底印有《本刊投稿条例》,称:本刊为黄埔同学会言论及代表黄埔学生革命行动之机关。无论是否黄埔同学均可投稿,凡与本会宗旨相合之言论一律欢迎,稿酬包括现金、书报、本刊等。然而,据目前看到的《黄埔潮》上发表的文章来看,作者主要为黄埔军校的师生,黄埔同学会的机关工作人员很多成为《黄埔潮》的主笔。据不完全统计,在《黄埔潮》上发表过文章的

黄埔潮周刊

表較成績成部各外海內國發分潮埔黃度年五十



/ 1926年度《黄埔潮》分发国内外各部处成绩比较表。

黄埔同学会工作人员有:游步瀛(总务科文书股长,后改任宣传科长)、余洒度(宣传科长,笔名洒度)、杨引之(组织科长)、饶荣春(宣传科指导股长,后改任编辑股长,笔名荣春)、郑峻生(宣传科编辑股长,笔名郑峻生、峻生)、周复(宣传科编辑股股员,笔名周复、周旭人、旭人)、葛武荣(宣传科指导股长)、卢碧湖(宣传科社会运动股长,笔名碧湖)、关巩(宣传科艺术股长)等。

游步瀛(1903—1927),又名步仁,湖南宝庆人,黄埔1期生。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毕业后留校任政治部干事、区队长等职。1925年2月参加第一次东征,在淡水战役中率部攻克城池,后进入叶挺独立团。1926年随军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相关职务。游步瀛一直负责《黄埔潮》的编撰工作,是《黄埔潮》的灵魂人物,几乎每期《黄埔潮》都有他署名的文章。

余洒度(1904—1934)，又名洒渡，湖南平江人。黄埔2期步科生。1924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历任黄埔军校第2期中共支部组织干事，血花剧社及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骨干成员，黄埔军校政治部科员。1927年6月起任武昌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部警卫团中校团附兼第1营营长、代理团长，江西省防军暂编第1师师长。他在《黄埔潮》上先后发表了《这次战争的胜利》《纪念廖党代表与北伐》《黄埔同学会目前重要的工作》等文章。

饶荣春，江西九江人，黄埔3期入伍生4连2班学生，中共党员。1926年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政治部宣传科科员。他在《黄埔潮》上发表了《中英谈判停顿后的省港罢工问题》《唐继尧发起组党救国》《纪念廖党代表与援助省港罢工》等文章。

周复(1901—1943)，别字旭人，江西抚川(今临川)人。黄埔军校第3期步科毕业。在校期间参加第二次东征，曾任孙文主义学会秘书。毕业后留校，曾任入伍生部政治部秘书兼《三民周报》编辑、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等职。他在《黄埔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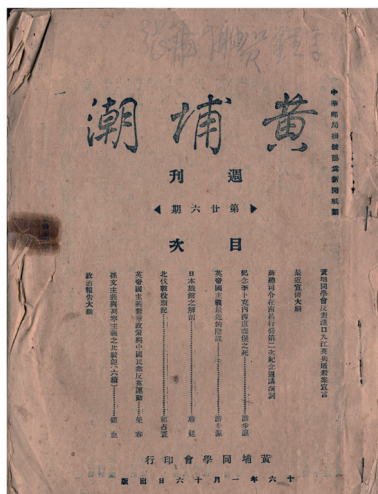
上发表了《廖党代表周年纪念的回顾》《会长的训条——我们的口号释义》《庆祝国民政府二周年应有的认识》等文章。

黄埔师生也踊跃向《黄埔潮》投稿。编辑股曾多次在刊物上就刊登稿件不及时公开致歉，实在应接不暇时只好推荐给其他校刊：“近来受到来稿很多，应及时发表，只因篇幅有限，未能按期披露。此后当陆续付印。惠稿诸君幸勿见责为苛。”“连日接到投来短篇稿件过多，因旬刊暂时停版，除酌量设法在上发表外，余悉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入伍生部政治部出版的《武力与民众》周刊上面发表，希投稿同志注意。”在《黄埔潮》上刊发文章较多的黄埔军校师生有熊雄、毛杜、葛武荣、刘伯龙、吴善珍等，戴安澜也曾任在《黄埔潮》上发表过文章。

熊雄(1892—1927)，原名祖福，别号中和，别字黑士、披素，江西宜丰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2年在法国留学期间加入法国共产党，后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9月回国到广州，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参加第二次东征，任东征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秘书。1926年1月任

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兼任黄埔军校改组筹备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黄埔军校特别党部筹备委员、监察委员，国民党黄埔军校校本部党部执行委员，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负责人，中共黄埔军校党团领导小组书记，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委员。他在《黄埔潮》上发表了《国家主义派与西山会议派之过去及现在》《孙文主义与列宁主义的比较观》等长文，分多期连载。

《黄埔潮》定位为黄埔同学的言论机关，从其作者群体来看，既有以熊雄、游步瀛、余洒度、饶荣春为代表的共产党员，也有以周复、葛武荣、刘伯龙为骨干的原孙文主义学会成员。为避免纷争，《黄埔潮》上刊发的文章以宣传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割据等国民革命思想，拥护北伐为主，在强调共性的前提下宣传各自的主张和政治立场。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共双方开始争夺《黄埔潮》的舆论领导权，共产党人逐步概括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旗帜鲜明地反对原孙文主义学会、西山会议派等新旧右派分子的主张，原本刻意回避的意识形态分歧变得日益尖锐。



/《黄埔潮》周刊第26期目录。

内容特点

游步瀛在《黄埔同学会十五年度的宣传工作》中曾将《黄埔潮》的内容归纳为八个方面：“一、关于国际的革命新闻。二、关于对帝国主义及一切敌人之攻击和批评。三、关于农工民众之利益及其组织。四、关于本党的政治主张。五、关于三民主义之研究。六、关于黄埔精神之发扬。七、关于土地问题及平均地权之讨论与研究。八、其他对于政局之分析和批评。”然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黄埔潮》的舆论导向也完全改变，积极宣传反苏、反共、反工农运动等，维护蒋介石的个人权威和地位，诋毁当时依然坚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

总的来说，“四一二”之前《黄埔潮》的内容主要有如下特点：

一是支持北伐战争，为北伐呐喊。《黄埔潮》周刊创办时正值北伐开始，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黄埔军校师生是北伐的骨干军事力量。《黄埔潮》上刊载了《总司令就职宣言》《总司令复孙传芳电》《这次战争的胜利》《论此次北伐》《北伐的时机到了》《本会为广东各界祝捷大会敬告民众》《怎样慰劳北伐将士》《蒋总司令再发出师宣言》等大量拥护蒋介石、拥护北伐的文章，论证出师北伐的必要性、意义，实时报道北伐前方战况等。如《这次战争的胜利》一文阐述了北伐战争的性质，即“是工农商学兵大联合的普遍国民革命和军阀帝国主义的反国民革命的战争，不是什么南与北的局部战争”。作为会刊，《黄埔潮》上刊登的文章更注重阐明北伐与黄埔学生、黄埔同学会之间的紧密联系，如《北伐问题与黄埔同学》一文就将北伐成功与否与黄埔同学会直接挂钩，指出要想北伐胜利，必须要团结“党中同志”和黄埔同学。黄埔同学服从黄埔同学会的决议、遵守同学会的会规、参与同学会的会务等就是努力北伐；

不努力北伐、不尽力于黄埔同学会就是反革命等。此外，刊物亦希望通过在前线征战的黄埔师生，获取北伐战事的第一手情况或独特视角，“凡关于前敌一切状况及人民对于我军之情形极盼随时通信见告”，刊载了《前方消息：湖南农民实际参战的情形》《前方通信》《行军杂记》等文章。

二是报道黄埔同学会会务。

作为会刊，黄埔同学会的会务工作、章程制度、文件宣言公告一直是《黄埔潮》刊载的主要内容。在《黄埔潮》创刊号上比较重要的就有林春华笔记，郑峻生《会长训话——6月27日在广东大学礼堂为黄埔同学第一次恳亲大会及成立同学会中宣布开会及训词》，关巩的《会务报告》、《黄埔同学会简章》等。此后，基本每期都有黄埔同学会相关内容。1926年10月，黄埔同学会宣传科编印《黄埔旬刊》，原《黄埔潮》周刊的会务报道内容转由《黄埔旬刊》承接。“专靠《黄埔潮》周刊来当传通信使，对于本会会务进行的状况，是不会明了的；而且每感觉到我们的生活太单调，太枯燥，急应鼓舞我们的呼声，用各种方法来安慰安慰我们的人生，促成我们所要实现的合

理的大同社会。这个小旬刊，便是想把本会会务进行的概况，以及可以慰藉我们人生于万一的事件，诚恳直率地介绍诸位亲爱的同学的面前。”然后，创办不久的《黄埔旬刊》因故于11月停刊，会务报道功能再次由《黄埔潮》周刊承担。

三是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革命政策，助推“三大政策”这一概念的形成和传播。1926年3月12日，施存统在《中山先生的三大革命政策》一文中首次提出“三大革命政策”一词。施存统1926年秋到黄埔军校任教，而“总理的联俄联共政策”作为口号，最晚到1926年9月在黄埔同学中已被广泛使用。1926年10月3日出版的《黄埔潮》第11期就刊登了3篇提倡“三大政策”的文章。黄埔4期经理第1队的学生吴善珍发表《我们对总理的联俄联共政策怀疑吗？》一文，表示黄埔学生要拥护“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将其作为评判革命和反革命的根据。余洒度在同期的《黄埔同学会目前重要的工作》一文中，将“确遵总理对革命的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拥护农工利益”，作为革命的方法。游步瀛在《孙文主义与列宁主义之比较观》

一文提出，为了扩大反帝战线，完成国民革命运动，必须接受“孙文主义和孙中山先生所手定的‘联俄’‘联共’‘农工’三政策”。文章所署日期为1926年8月20日。此后，在《黄埔潮》第12期、13期、14期、第15、16期合刊、18期上，接连有《欧战后国际政局的概观及今后革命之路》《十月革命的苏联各阶级，世界与中国革命运动》等多篇文章，都提到了“联俄”“联共”“农工”“三大政策”等词，清晰反映出这一提法从最初“三政策”“三个政策”“三个伟大政策”等统称，最终稳定为“三个政策”一语的发展过程。

三大政策作为在革命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历史性名词，其提出、流传及被认可有一个过程。《黄埔潮》是最早公开传播这一提法的媒体。同时《黄埔潮》的影响力，客观上也助推了这一概念更广泛、更深入的传播。1926年11月4日，陈独秀在中共中央会议的报告中就提到黄埔军校左派学生的政纲是“迎汪复职，继续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特别会议，通过《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的决议案》，“三个政策”这一概念正式进入中共中央决议，

作为区分国民党左右派的标准，后逐渐被“三大政策”这一概念所替代。

四是宣传报道时政，唤起民众。《黄埔潮》设有时事栏目，对国内外新闻进行报道。《黄埔潮》第9期的编者报告指出，刊物内容注重有系统的论述与一贯的主张，不断的改进，“以三民主义为中心，以现世界的实际问题为对象与论证的根据”。《黄埔潮》上经常刊登国内政局和世界政局的时评文章，如《中英谈判》《大可注意之新加坡筑港问题》等，省港罢工、中央及各省执行委员联席会议、潮安事件、迎汪倒蒋等当时重要的历史事件在刊物内都有所反映。《黄埔潮》还就重大事件、革命纪念日进行专题策划，向社会各界和黄埔师生约写、征集纪念文章，出版特刊，目前所见出版有“廖党代表逝世周年纪念特刊号”“国庆纪念号”“苏联革命九周年纪念号”“庆祝北伐胜利号”“新年号”等特刊。

《黄埔潮》周刊作为黄埔同学会的会刊，发行时间长，发行区域广，发行量高，是同时期黄埔军校报刊中比较有影响力的刊物，对研究北伐战争、黄埔同学会史具有积极的史料价值。



从翠亨村到大湾区：中山的传承与发展

□ 陈希

160年前，珠江口西岸的翠亨村诞生了一位改变中国命运的伟人——孙中山先生。他像一颗划破黑暗夜空的流星，用短暂而辉煌的一生，点燃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之火。今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回望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岁月，再看今日中山这片热土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心中百感交集。先生当年“振兴中华”的呐喊犹在耳畔，“天下为公”的理想正在一步步变为现实。本文将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与黄埔情怀说起，带您走进这座以伟人名命名的城市，感受它深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秀美的自然风光、鲜活的非遗传承和蓬勃的发展活力。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与黄埔情怀

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一生。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少年时远赴海外求学，亲眼目睹了西方列强的强盛和祖国的积贫积弱，从此立下了“振兴中华”的远大志向。他不是坐在书斋里空谈理论的学者，而是一位脚踏实地的革命实践者。从1894年在

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喊出“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到1905年组建中国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从领导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到国共两党合作，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孙中山先生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定而执着。

创立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1924年6月16日，黄埔



/ 孙文纪念公园中的孙中山先生铜像。

军校在广州黄埔长洲岛正式成立。孙中山先生亲自担任军校总理。黄埔军校的诞生，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杰出的军事政治人才，其中既有国共两党的著名将领，也有无数为民族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在东征、北伐和抗日战争中，黄埔师生前赴后继，浴血奋战，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这种精神，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一脉相承，其核心就是爱国主义，其最终目标就是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今天，虽然海峡两岸尚未统一，但“天下黄埔是一家”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两岸黄埔

同学及其亲属，始终牢记孙中山先生的遗训，积极推动两岸交流合作，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我们坚信，在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下，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能够实现，孙中山先生的夙愿一定能够达成。

中山市：一座承载着伟人梦想的历史文化名城

中山，古称香山，因“地多神仙花卉”而得名。这座有着870多年建城史的城市，不仅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也是近代中国思想解放与启蒙的摇篮。在这里，诞生了以孙中山、郑观应、杨殷、萧友梅、吕文成、阮玲玉等为代表的大批历史文

化名人，他们像一颗颗璀璨的明星，照亮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天空。2011年，中山市被国务院授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称号，这是对这座城市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最高肯定。

中山的历史文化具有近代性、侨乡性、包容性三大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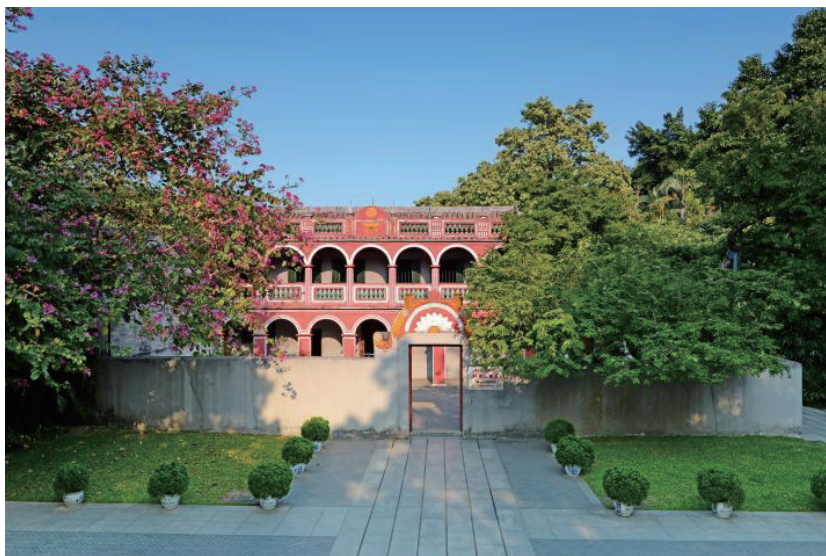
近代性。作为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地区之一，中山在近代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提出了“商战”思想，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对后来的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孙中山先生更是将西方的民主共和思想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

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山是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策源地之一，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浸润着革命的气息。

侨乡性。中山有旅居世界五大洲 9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 80 多万人。这些海外乡亲，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但始终心系祖国和家乡。他们不仅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也将西方的先进文化和技术带回了家乡，促进了中山的现代化进程。

包容性。作为一座移民城市，中山自古以来就有着开放包容的传统。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不排外，不保守，善于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正是这种包容性，使得中山能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山更是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和投资者，成为了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中山市高度重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提出了“文化兴城”的战略目标。2022 年以来，中山高标准启动了香山古城保护活化工作，将历史城区打造为文化、旅游、商业、休闲等多功能复合的城市空间。2025 年 10 月，香山古城活化的



/ 翠亨村孙中山故居。

核心区域——孙文西路历史文化街区焕新开放，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参观游览。这条有着百年历史的骑楼街，如今既保留了原有的历史风貌，又融入了现代的商业元素，成为中山城市文化的新地标。除了香山古城，中山还拥有众多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每年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数百万人次。此外，中山还有黄圃镇、南朗镇两个历史文化名镇，以及翠亨村、茶东村、古鹤村等 7 个中国传统村落。这些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像一颗颗珍珠散落在中山大地上，共同构成了中山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画卷。2025 年，中

山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4260.6 亿元，增长 3.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5.4%，居全省第 4 位；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3.5%，居珠三角第 3 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3.4%，居全省第 3 位。这些数据是中山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体现。如今的中山，已经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县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城市和大湾区西岸枢纽城市与创新高地。

山水相依：文化与自然生态保护的锦绣画卷

中山是一座山水相依的城市，五桂山雄踞中部，珠江口环绕东部，西江、北江支流穿城而过，形成了“山、水、城、

田、海”融为一体的独特城市格局。这里气候宜人，四季如春，森林覆盖率高，生态环境优美，先后荣获联合国“人居奖”“国家森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等荣誉称号。中山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大力加强文化生态保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五桂山是中山的“市肺”，也是中山文化生态保护的核心区域。这里山峦起伏，林木葱郁，空气清新，是天然的氧吧。五桂山不仅自然风光秀丽，而且文化底蕴深厚。山上有古香林寺、逍遥谷、长江水库等著名景点，还有丰富的沉香资源。中山是“中国沉香之乡”，“中山五桂山沉香”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已于2021年成功注册。五桂山成为了集生态保护、休闲度假、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旅游胜地。

香山湾是中山文化生态保护的又一张亮丽名片。这里拥有珠江口面积最大的连片红树林湿地，是国际候鸟迁徙关键驿站与中华白海豚重要活动区。针对过去红树林萎缩的困境，中山市坚持“本土优先、自然恢复”的原则，实施了8大生态修复工程，累计新营造红树林35.05公顷，修复120.99公顷。如今，香山湾红树林面积已达



/ 中山市南朗崖口飘色。

3400亩，较2015年增长16倍。恢复自然岸线3.5公里，累计放流种苗超5.2亿尾，构建起“红树林—滩涂—浅海”生态廊道。现在的香山湾，“鱼鸥翔集、豚跃湾蓝”的生态盛景已成为常态。根据监测数据，香山湾共记录鸟类235种，含黑脸琵鹭、东方白鹳等10余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黑脸琵鹭观测数量较2020年翻倍，中华白海豚聚群活动频次提升300%，鱼塘水鸟种类从47种增至60种。2026年3月，中山香山湾成功入选第二批广东省美丽海湾，成为珠江口生态保护的典范。

崖口湿地公园是香山湾生态保护的核心区域。这里不仅有丰富的红树林资源，还有2000多亩连片稻田、超万亩围

垦和8.5公里“中山最美海岸线”。为了更好保护和利用这些资源，崖口湿地公园打造了两个红树林科普馆，15亩农耕乐园、50亩水稻田体验区，设置了长1.5公里的零碳科普小径，配套建设了两层自然教育教室。这些设施的建成，不仅为开展红树林自然教育活动提供了良好基础，也让游客能够近距离感受大自然的魅力。

中山还有许多美丽的风景名胜。金钟水库是中山市民休闲健身的好去处，这里有一条长达12公里的绿道。紫马岭公园是中山市最大的城市公园，是市民和游客休闲娱乐的好地方。还有中山温泉、泉林山庄、卓旗山公园、烟墩山古塔、西山禅寺等众多景点，每一处都有

其独特的魅力。

薪火相传：非遗的活态传承与美食盛宴

中山是一座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这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独具特色。中山市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6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3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100余项。中山市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让这些古老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中山的非遗，涵盖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多个门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小榄菊花会、醉龙舞、咸水歌、崖口飘色、长洲醉龙、沙溪鹤舞等。这些非遗项目，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也反映了中山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精神风貌。

小榄菊花会是中山最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有着800多年的历史。每年秋季，小榄镇都会举办盛大的菊花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观赏。菊花会上，各种造型奇特的菊花盆景争奇斗艳。除了观赏菊



/ 中山市小榄菊花会。

花，游客还可以品尝到各种菊花美食，如菊花饼、菊花酒、菊花糕等。小榄菊花饼制作技艺是市级非遗，它以本地鲜菊花做成的菊花糠为特色原料，经开酥皮、拌馅、包制饼坯、烘烤等工序制成，成品口感酥沙，菊韵悠长，深受民众喜爱。

醉龙舞是中山特有的一种民间舞蹈，起源于明代，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醉龙舞融合了武术、舞蹈、杂技等多种艺术形式，表演者手持木龙，边舞边饮酒，动作粗犷豪放，充满了阳刚之气。每年农历四月初八，中山的许多乡村都会举行醉龙舞表演，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还有许多精湛的传统技艺，如：大涌红木家具雕刻技艺、小榄菊花雕刻技艺、沙溪凉茶制作技艺、黄圃腊味制作技艺等。这些传统技艺，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和发展，已经成为中山的特色产业，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

说到中山的非遗，就不得不提中山的传统美食。中山是全国首个“中国粤菜名城”，这里的美食种类繁多，口味独特，深受人们的喜爱。石岐乳鸽、东升脆肉鲩、三乡茶果、神湾菠萝、沙溪扣肉、南朗横门水蟹、神湾禾虫等，都是中山的特色美食。这些美食，不仅是中山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 醉龙舞。



/ 中山市三乡茶果传统饮食习俗：三乡濑粉制作。



/ 岭南传统宴席中山市沙溪九大簋。

一部分，也是中山文化的重要载体。石岐乳鸽是中山最著名的美食之一，被誉为“天下第一鸽”。它以皮脆肉嫩、汁多味美闻名于世。石岐乳鸽的制作工艺非常讲究，选用生长期为13—15天的乳鸽，经过宰杀、清洗、腌制、风干、油炸等多道工序制成。刚出锅的石岐乳鸽，色泽金黄，香气扑鼻，咬一口，鲜嫩多汁，让人回味无穷。

中山市积极推动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打造了一批非遗旅游精品线路和非遗体验基地。如沙溪镇的“非遗旅游文化周”，不仅有民间艺术巡游、非遗集市、武术文化交流会等活动，还推出了“九大簋”非遗宴，

让游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感受中山非遗文化的魅力。此外，中山还举办了非遗文创设计大赛、非遗新青年创新人才选拔大赛等活动，鼓励年轻人参与非遗传承和创新，为非遗保护注入了新的活力。

活力迸发：城市与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

走进今日的中山，你会感受到一股蓬勃向上的发展活力。这里既有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有古色古香的历史街区；既有繁华的商业中心，也有宁静的乡村田园。随着深中通道的开通，中山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新业

态、新活力不断涌现。

中山的城市风貌，既保留了历史文化名城的底蕴，又展现了现代化城市的风采。孙文西路步行街是中山最具代表性的历史文化街区，这里的骑楼建筑风格独特，充满了南洋风情。经过改造提升后，孙文西路步行街不仅保留了原有的历史风貌，还引入了许多时尚的商业业态，成为了集购物、餐饮、休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商业街区。2026年春节期间，孙文西历史文化街区累计客流量超150万人次，成为中山最热门的旅游打卡地之一。

除了商业中心，中山的公共文化设施也非常完善。孙中山纪念图书馆、中山市博物馆、中山市文化馆、中山市文化艺术中心、中山美术馆等大型公共文化设施齐全，拥有国家部颁一级馆3个。中山成功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 金钟湖香山书房。

大力推进“香山书房”建设，这些香山书房如雨后春笋般遍布镇街，不仅为市民提供了便捷的阅读场所，有的还入选全国乡村公共文化空间案例，成为中山市公共文化服务的亮丽名片。

崖口村是中山乡村振兴的典型代表。这个位于南朗街道的小村庄，坐拥2000多亩连片稻田、超万亩围垦、8.5公里“中山最美海岸线”和中山唯一保存的70亩原生红树林自然景观。近年来，崖口村依托丰富的生态资源和文化资源，大力发展农文旅融合产业，打造了“稻田+咖啡”“稻田+露营”“稻田+民宿”等多种新业态。截至2025年年底，崖口村有170余名青年返乡创办“村咖”等业态，68名外来创客引入咖啡文化、露营经济等都市元素。崖口村还有12间海鲜酒楼、6间煲仔饭店、13间民宿、18间集装箱店、35家观光自行车店，容纳300多人创业就业。2025年，

崖口村游客到访量达到637.7万人次，旅游收入大幅增长。

“乡村咖啡”是中山农文旅融合的标志性IP。2026年元旦，中山首届乡村咖啡节成功举办，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前来体验。2026年3月，中山又举办了“百千万工程·百村咖啡香”春季乡村咖啡节，延续“咖啡+乡村”的爆款模式，在春分时节打造兼具田园诗意与潮流气息的乡村文旅盛宴。神湾镇立足菠萝特色产业与西江生态风光，在大果园推出“菠萝采摘+咖啡”体验，搭配凤梨酥DIY；初见炸喜营地、慕野星空营地打造田园露营咖啡，提供音乐驻场、围炉煮茶服务；竹排湿地公园将湿地白鹭、乡野绿意与咖啡相融，游客可漫步绿道、赏西江日落，在“菠萝的海”与江畔风光里品味春日咖啡香。

中山还注重发挥文化的引领作用。截至2025年底，全市

“文化村长”队伍已扩至167名，覆盖154个村（社区），全年开展文艺活动640余场，惠及群众超20万人次。在“文化村长”的带领下，不少乡村走出了文旅融合的新路径。冲口村以“文学+咖啡+文创”模式，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南区曹边村“文化村长”肖伟携手北溪社区第一书记王轩打造烟火集市、“曹边夜宴”，单日交易额突破32万元。

今日的中山，历史与现代交相辉映，自然与人文和谐共生，传统与时尚完美融合。这里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有秀美的自然风光，有鲜活的非遗传承，有蓬勃的发展活力。这里的人民，勤劳智慧，热情好客，正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和进取精神，传承和弘扬“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积极推动两岸交流融合，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我们坚信，在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努力下，孙中山先生的夙愿一定能够实现，中山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祖国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